

# 炎黄春秋

第 **1** 期  
2010年

**高放：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  
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

**公安工作“大跃进”**

**共产党员雇工问题的三次讨论**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 目 录

### 新年献词

- 1 新年的期待：推进良政与善治……………周瑞金  
2 向民间借力……………吴 思

### 沉思录

- 3 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高 放  
10 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何 方

### 亲历记

- 17 公安工作“大跃进”……………尹曙生  
24 中国核武器基地揭密……………王菁珩

### 口述史

- 30 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罗舜初口述 罗小明整理  
36 两次不准革命的经历……………高 扬

### 一家言

- 42 “以人为本”与“唯人主义”……………黄宗江

### 春秋笔

- 44 共产党员雇工问题的三次讨论……………张厚义  
50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帅 好

### 怀人篇

- 54 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金 凤  
58 彭德怀二三事——兼怀王焰同志……………宋 群

### 忏悔录

- 60 一个母亲的忏悔……………沙 漠

### 往事录

- 66 东南野战军和粟裕的战略决战建议……………庄 重  
69 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张家康

- 74 1978年上访记……………冯冠扬

### 求实篇

- 78 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黄家生  
80 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李 超

### 海外事

- 82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黄 钟

### 编读窗

- 87 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聂元梓

###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杨继绳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 社 长：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郎福呈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cqfxb01@126.com](mailto: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010—68525374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告别了2009年,我们迎来了充满新挑战、新期待、新希望的2010年。

新的一年,我们期待什么?

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我们期待进一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巩固经济回升的基础,切实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平稳较快地发展。

早在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中央就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三个五年计划实施过去,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至今乏善可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使一些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以追求经济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于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其结果必定大大削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放松致力于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益的努力,造成煤电油运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进一步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首先要求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实现政府的转型。只有转变政府的行政职能,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加强社会自治,转化行政权力,才能形成一个稳定而完善的政府权力作用的制度框架,尽量减少对经济的不当干预,让经济主体在市场的的作用下,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新的一年,我们正是期待政府对经济的良政与善治,把功夫切实用在调结构、提效益、促转型上来。

2010年,是落实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一年。四中全会坦承党内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如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腐败,基层党组织脱离群众、弄虚作假、奢靡享乐等。中央也一再告诫全党:“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期待,新的一年能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突出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尽快改变一些地方“政怠宦成”的局面。

实践表明,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框架下,网络民主能起到制度补充

和制度修复的重要作用。信息时代就是网络民主的时代。通过互联网,帮助政府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还原社会真实的矛盾构成,帮助中央制衡地方,揭露和切割基层无良官员。古人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广大

领导干部的言行处在公众的视野之内,并随时可能通过互联网公诸于众。互联网真正实现了让公民能够对公共领域中的所有人物、关键领域、重点部位进行“全天候”监督。3.38亿网民用鼠标“投票”正是未来全民普选的先期尝试。

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新的一年我们期待在全党提倡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精神,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营造一种包容和宽松的环境。各级领导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能够包容不同观点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这对发扬党内民主至关重要。开放,是网络社会的生命所在。对待网络民主,不能采用封闭的视野、僵化的思维和单纯强制的管理方式,一定要有全球的视野,开放兼容的思想观念,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只有善于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近年,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带头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带动了各级政府和官员大兴网络问政之风。安徽省委书记深有体会地说,领导干部上网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微服私访”,网民所提个人意见,不管是粗言、苦药,还是牢骚、怪话,都能为决策提供有益参考。这话说得好啊!我们期待,这种网络问政不要停留在简单呼应网友的某些利益诉求上,而要真正从网络问政中认识到公共利益所在,政府如何对待不同利益的诉求,从而做出正确的公共决策。这样,才能把网络的参与与民主同协商民主、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把党内民主同社会民主结合起来,开拓出民主政治生活春色满园的新局面。

总之,良政与善治,就是执政党、政府与广大公民协调合作、同心协力,对社会公共生活实施科学、依法、民主的管理,以保证公民获取公共利益最大化。这是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突出社会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跨进2010年,推进良政与善治,正是我们最大的期望所在!

# 新年的期待： 推进良政与善治

• 周瑞金



去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共中央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如果今年能推出落实的硬措施,中国的改革事业能有新进展,自然是顺天应人的大好事,我们翘首以盼。

执政党推进党内民主,动力来自哪里?一般说来,执政集团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层次较高,利益越大。我们相信高层领导的善良意愿和改革承诺,但唯物史观要求我们重视利益格局所决定的基本态势。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分布的基本态势是:民间大于党内,基层大于高层,弱势集团大于强势集团。从改革动力较弱的层面入手,稳健自有保障,动力却不能不求助于民间和基层。

那么,如何借助基层和民间的改革力量,稳妥而又积极地推进党内民主呢?

首先要拓宽基层、民间和弱势群体的表达通道。网络和各种媒体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满载人民群众的声音。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强调,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媒体管理改革的方向。近几年,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与政治有关的各种媒体,却是越来越成为体现领导意图和下达上级指令的单声道。舆论营造至此,真正想推进党内民主的领导人,恐怕也会产生孤立无援之感。当然,发表言论也要有规范,但规范必须有法,法律必须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新闻出版法已经酝酿多年,若能早日推出,必将有助于推进党内民主。

其次是放宽对民间组织的限制。一盘散沙固然不能成事,但也难以进行低成本的有效自治,难以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难以抵抗腐败。一旦有事,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容易过激,变本加厉地破坏秩序和稳定。

再次是扩大基层选举。村级选举已经推行十多年,乡镇和县级也该开始试点了。如果进展顺利,可以继续推进。如果进展受挫,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想像起来,局部基层的试点无关大局稳定,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比较有限,应该是碎步前进的理想起点。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属于历史上的新事物。无论从哪里起步,无论党内党外,高层基层,总要先议论起来,拿出新想法和新办法来。温家宝总理号召政府参事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说真话,讲实情,其实这也是改革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媒人的要求。我们将坚持努力,为新思想和实情真话提供交流平台,在社会实践之前,做好思想上的研究、探索、争论和试验。

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每个王朝都不会死于前朝致命之病。周亡于封建,秦废封建立郡县。秦亡于横征暴敛,汉轻徭薄赋。魏晋亡于门阀贵族,隋唐科举取士。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宋重文轻武,强干弱枝。不过,防范是有代价的,过度防范代价更大。北宋官军无尾大不掉之虞,但战斗力低下,北宋亡于外敌入侵。

根据上述规律,真正能够威胁当代稳定的,并不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倒台的异己党派及其报刊,也不是让国民党头痛的工会农会和各种民间力量。威胁当代稳定的,是防范过度造成的问题,民弱官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反弹尤其是高层反弹。回顾新中国的灾难性事件,也几乎都能看到对民意表达的过度限制。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报刊没有批评大跃进,反而推波助澜。大跃进的灾难引出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直至文革的内部反弹和分裂。这段历史表明,过度防范所造成的危险同样可以致命。

中国人善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卷入世界潮流之后,总结经验还应该加上世界性眼光。俄国共产党人认为,苏共亡于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我以为三大危机尚存其二,殷鉴不远,不可不察。

对于党内民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我们有理由抱乐观态度。在千年的尺度上看问题,我们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新知识,知道民主法治可以打破兴衰循环。在百年的尺度上看问题,当代与辛亥革命之前的最大差别,就是推翻了帝制,改革不再受制于皇家和贵族的永久利益;同时,农业社会也转变为工商社会,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民间崛起。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关键在于:向民间借力。

# 向民间借力

· 吴思

# 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

· 高放

## 一、苏联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下党内民主制度初步建立

苏联共产党最早建立于1898年,这一年3月1日,在明斯克市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选举产生了党中央委员会,宣告了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正式建立。但是在沙皇专制政府严酷统治下,新当选的三个中央委员在大会闭幕后旋即被捕,党的各地方组织也大多被取缔。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逃到西欧后,只好重新筹备建党。1903年7月17日(公历30日),党的二大在布鲁塞尔举行,后来又转到伦敦续开。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重新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革命活动。以后即以1903年7月30日作为党的诞生日。1917年该党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1918年改名俄共(布),1925年又改名联共(布),1952年才改名苏共。苏共执政74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可是这个曾经领导人民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强大的共产党,却于1991年悄然自行解散,被广大苏联人民彻底抛弃了,没有多少人要出面保卫它。

当今在总结苏共灭亡这个重大课题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苏共从列宁建党时就是一个个人专制政党。其实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实际。这里只要列举最简要的事实就可以澄清是非,辩明真相。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完全是民主政党。民主制组织原则主要体现为这样五点:党的各级领导人均是民主选举产生;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其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要向各下级组织报告一次工作,每年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定于每年8月召开。恩格斯说:“这个‘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列宁在沙皇专制政府严密统治和严厉镇压的条件下建党,不可能民主选举产生各级领导人,党代表大会甚至不得不在国外召开,因此列宁强调“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到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民主革命、人民争得一些民主自由后,列宁就改变提法,主张党要实行“民主制”的原则,首先民主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人。1905年党的三大还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中央全会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然而这在党未执掌全国政权前,显然难以做到。1905年革命失败后党又处于逆境。1906年列宁同意党的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1917年2月俄国第二次民主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紧接着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而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共成为执政党。1908—1920年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激烈的内战与外战。1921年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由上可见,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列宁与时俱进,先后有过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四种提法。应该说,工人民主制的提法最规范。没有不集中的民主,所以没有必要在“民主”之后再加上“集中”二字,却有非民主的集中,后来民主集中制在长期的实践中经常是集中压倒了民主,民主成为过度集中的装饰品,

甚至民主被破坏殆尽。

1917年—1923年，这头六年在列宁领导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初步创立了党内民主制，主要内容是：坚持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中央全会由双月会制变为每月召开两次；坚持党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党内政治思想反对派，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允许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做不同意中央观点的副报告，同时严禁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党中央不设主席，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各司其职；在各级党委民主决策中坚持每人一票，平等表决；设立党的监察机关，加强对各级党委的监督。不幸列宁于1924年才54岁英年早逝！尽管他有很多新建树，然而对党内民主问题，在理论上论述不够充分，在制度上建设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由于这四个“方面”都“不够”（后面将详加说明），这就使得在列宁之后初具雏形的党内民主容易遭到破坏。

当今在总结苏共灭亡这个重大课题时，在我国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在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时期，由于是处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之中一国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国内又有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不得不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不可能充分；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民主化”，允许党内派别林立，并转去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才把苏共搞垮了。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在列宁领导那6年，更是多半处于内战外战交融的腥风血雨中，更是与资本主义列强和国内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依然能够依靠党内民主克制制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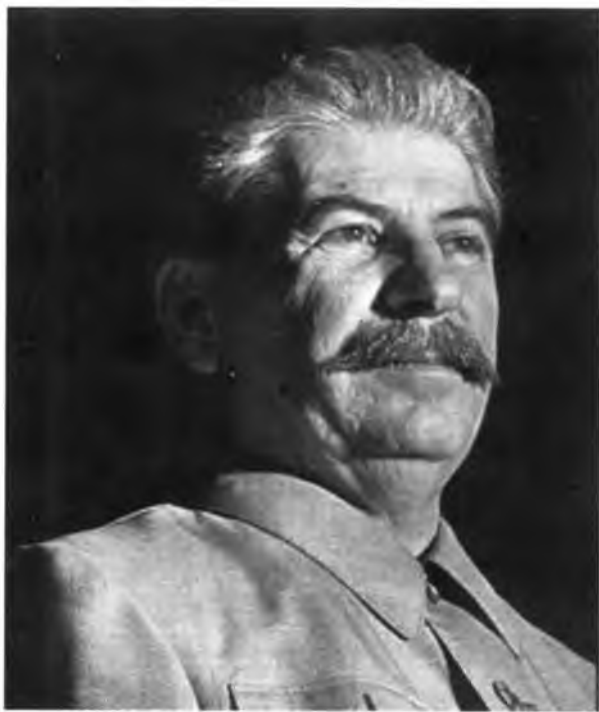
## 二、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如何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执政长达约30年之久。在他任期内苏共由民主政党逐步演变成为个人集权制政党。这里从六个方面扼要分述列宁开创的党内民主制是如何被斯大林破坏殆尽的。

第一，清洗并且彻底消灭任何政治反对派。从1924年到1929年，短短6年之中先后开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和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在1936年前后的大清洗中进一步破坏法治，用逼供信、诱供的手段诬陷他们是“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杀人犯”予以处决，连1929年已经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斯大林也要亲自指挥苏联情报机关派人于1940年在墨西哥把他暗杀掉。昔日亲密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友凡敢于与斯大林持不同政见者无不成为阶下囚和枪下鬼。斯大林对党、政、军、共青团、工会、科技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以至平民百姓中凡是反对他的思想观点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甚至以“人民公敌”定罪。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起草的有总检察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共同签名的统计报告，从1921年至1954年，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共有3770380人，其中死刑642984人，25年以下劳改与监禁2369220人，流放和驱逐出境765180人。苏联在1918年、1924年制定过两部宪法，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时又通过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宪法。可是实际上有宪法却没有法治，有宪法却缺少宪政。一个民主政党，党中央内部在决策中见仁见智难免会有意见分歧。凡是在党代表大会上经过民主讨论表决，拒不服从多数人通过的决议者，顶多开除党籍。可是斯大林却网罗罪名，把他们作为敌我矛盾加以消灭，其结果只能把党变成一言堂、一人专政。

第二，破坏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年会制以及中央全会定期会议制。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领导下遵照党章，每年都召开党代表大会。可是从1925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党代表大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从相隔2年、3年、4年、5年，甚至到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斯大林于1927年党的十五大修改党章，把党代会年会制改为每隔2年召开一次，1934年党的十七大又改为每隔3年召开一次，1952年党的十九大再改为每隔4年召开一次（到1971年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改为每隔5年召开一次）。即便不断修改党章，把年会制改为每隔2年、3年、4年召开一次，依然不断违背党章。至于党代表会议本来也是实行年会制，它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召开，其权





斯大林(1879—1953)

力小于党代会,大于中央全会,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党代表会议的召开甚至相隔时间更长,如1941年举行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到1988年才揭幕,相隔几乎近半个世纪。还有中央全会相隔的时间也愈益增长。从党章规定来看,1922年定为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全会并向各省委分发一次关于自己活动的书面报告;1934年就改为每4个月召开一次全会,而提供书面报告则从1925年就改为模糊的说法,“定期把自己的工作通告党的各级组织”。到1952年,中央全会又改为每6个月召开一次。实际上中央全会经常延期召开。例如1940年7月之后相隔3年半之久才于1944年1月召开;1947年2月之后,相隔5年半之久才于1952年8月召开。更为严重的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自从清除了反对派之后越来越变成“一言堂”,越来越变成对斯大林言听计从、歌功颂德的会议。

第三,在政治局实行个人专断。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被破坏,这表明党的权力中心、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已经转移到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又一再被延期,甚至相隔3年、5年之久才召开一次,这表明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权力中心,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按党

章规定,政治局本来是与组织局、书记处并行、并列、并重的党中央3个常设机构之一。可是斯大林时常撇开组织局,实际上由政治局包揽、包办一切,把政治局变成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国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1925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上公然这样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全会以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而最高机关是全会”,“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这种说法是违背党章的。苏共党章历来明文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只是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所以只能说党代表大会决定一切,而并非中央全会决定一切。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实际上变成政治局决定一切,难怪斯大林敢于直言不讳地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如果在政治局内部还实行集体领导、每人一票平等表决,那还算是寡头专断。可是斯大林违背党章,在政治局内部又搞了5人小组。早在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做出决定,并且就自己两周内的全部工作情况,向中央委员会定期全体会议做报告”。后来在党章中从未规定政治局的人数和会期。从1925年十五大至1939年十八大,政治局委员一直是9—10人。1952年十九大政治局改称主席团,委员增至25人,享有最高权力。沿用了33年之久的政治局为什么要改称主席团呢?在大会作修改党章报告的赫鲁晓夫一语道破真相。他说:这是“因为‘主席团’这个名称更符合于现在的政治局实际上行使的职权”。即是说从今以后公开废弃早已名存实亡的组织局,使党中央主席团成为名实相符的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然而不论是政治局或主席团,都极少开会。实际上斯大林大都是召集其中的几个人,向他们宣布重要决策,要他们分头去办理。1971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透露了真情。他说:“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斯大林一般是每隔二三天或者更多天,就召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

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

第四,改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使党中央委员会和总书记没有机构能对之实行监督。1920年建立的中监委,本来是与中央委员会并行、并列、并重的,同样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一个中央监督机关,其任务和职责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的谣言和流言蜚语现象作斗争;要“使对党员的罪行和过失提出的一切控诉和申诉都得到适当的处理和解决”;“要加强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监察”。

斯大林先后迈出四步来改变中央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一步是监督监委。本来列宁是要中监委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以监督其工作。然而1924年5月(列宁刚过世四个月)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竟倒转过来,决定“党委员会必须派代表参加监察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和它们的全部工作”。第二步是1934年2月召开党的十七大,进而决定取消中监委,改变为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从此党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受任何机构监督了。第三步是到1939年党的十八大又把党监委改为设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监委成员。第四步是在1952年党的十九大上,干脆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即直接隶属于党中央的一个部门机构,其任务是监督党中央决议的执行和检查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这样,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就完全改变了。总书记的个人集权制还拥有了一个监督全党 and 地方贯彻执行其个人意志的机构。这样,党中央委员只由总书记个人对之实行监督,总书记则无人能对之实行监督了。

第五,斯大林把列宁开创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之后,进一步加强以党代政制和个人集权制。本来在列宁领导执政时期,列宁只以党的政

治局委员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担任(苏共中央从未设立军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充任。可见当时党、政、军三大权是分归3个人掌管,在政治局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这犹如三驾马车,由3位能人各自驾辕,虽有龃龉,尚能协调,力求齐心协力,齐头并进。到斯大林彻底斩尽杀绝党内各个反对派、独占鳌头之后,他的权力欲进一步膨胀,还要进而独揽党政军三大权。1941年5月他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1934年苏联废除共和国军委,1941年6月新设国防委员会)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这样他就把列宁当年确立的党政军三权分立的民主分权体制改变为党政军三大权统一于一身的个人集权体制。同时他从20年代末起就别具匠心,逐步独自掌管国家安全部门(从“格别乌”到“克格勃”),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实则用以作为严密监控党政军民思想、剪除异己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斯大林在独揽大权之后,还要独领风骚,在文化思想界大兴个人崇拜之风。党内、国内盛行吹捧领袖之风,谁颂扬得多、颂扬得高,谁就越能得到提拔重用。斯大林用文化部门的“个人崇拜”和安全部门的“个人忠诚”这一文一武两手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根本维护并巩固其个人集权制。

第六,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还率先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他实现这“两制”未必是早有预谋、事先设计的,而是个人权力欲不断膨胀,又渡过权力危机的必然结果。苏共党章和苏联宪法从未明文规定党政领导人的终身制和任期制,这样就给领导人可以不断连选连任留下法定的广阔空间。斯大林自1922年4月就任总书记后,当年末翌年初就遇到了列宁要调离他这一要职的第一次权力危机。经他在党中央赢得了多数人支持,终于留任。他进而清除了党内的各种反对派,1929年提前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造成重大损失,这引起党内不少人对他的领导不满。于是在1934年初举行的党的十七大上他遇到了第二次权力危机。表现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



林少得 270 多票，列当选中央委员名单末位，而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只以 3 票之差居于首位。只因中央委员是等额选举，斯大林才得以当选。与会代表 1225 人，可见约有五分之一代表反对他当中央委员，更遑论当总书记了。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急忙出面，暗箱操作，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最后在大会上宣布的选举结果是反对斯大林的和反对基洛夫的都是 3 票，才使他进而在中央委员会上又当选总书记。渡过第二次权力危机之后，他通过大清洗彻底消灭威胁他权力的所有的人，到 1941 年 5 月又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国家政权机关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把政府首脑大权攫取到手。6 月法西斯德国入侵后，他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集中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统一领导战时党、政、军、工、团的活动。他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战后又较快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样他的威望登峰造极，他自己也更加自信自负，更没有要急流勇退之意。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久人世，所以从未明确对人谈过他的接班人问题。但是 1952 年 10 月举行党的十九大时，他要马林科夫取代他作中央工作报告（从 1924 年党的十三大起一直都是他自己作中央工作报告），在他提出的十九大后中央领导人名单中马林科夫名列首位，人们都认为马林科夫显然是他意中的接班人。后来他嫌马林科夫过于软弱，尚未确定何人接班，天有不测风云，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突然中风猝死。他担任总书记 31 年之久，担任政府总理和全军最高统帅也有 12 年，实际上是领导职务终身制。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明显带有君主专制色彩，这“三制”正是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体制的三点根本区别（民主共和制是实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制约制、权力限任制与权力选举制）。

斯大林实行的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仅破坏了共产党党内民主，而且也破坏了苏联的苏维埃民主。党权高于民权，以党代政的体制使作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成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以及以党代政制、一党专政制、高干特权制、监控干群制等等，在苏联代代相传，有的甚

至愈演愈烈。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的种种体制长期无法进行体制内改革，到 80 年代后期苏联国内涌现了众多政治派别和政党，纷纷要求民主化，个人专制或者寡头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等等还推广到其他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也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其后果是严重的，切不可等闲视之。

### 三、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为何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

苏共为何会形成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呢？为何会由民主政党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呢？这也是有历史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群体与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列宁遗留下来的党内民主的遗产不够丰厚，容易被暴风骤雨吹散冲掉。如前所述，关于党内民主问题列宁在理论上论述还不够充分，在制度上建设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这样不免留下了不少漏洞。

第二，沙俄君主专制和对外扩张的政治文化传统是苏共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更深远的原因。俄国自 1497 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起，俄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和对外军事扩张长达 420 年之久。俄国于 1861 年从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之后，现代资本主义才发展较为迅速，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长期依附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民族政治文化遗传基因、民族负面政治文化传统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长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第三，历史遗留与现实存在的经济结构更是苏联形成并且长期延续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沙皇俄国尽管已经发展了一批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经济（1913 年现代工业约占国民经济 42%），然而依然给苏维埃俄国留下了大量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苏联共产党长期不认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经济，实际上苏联确立的是依靠行政法律手段构建的、带有半自然经济色彩的统

制经济。这种条条块块分割、自我封闭、缺少竞争的统制经济,不但使苏联经济缺少活力,农业长期上不来,而且正好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苏联领导人长期以来把商品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坚决反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也是因为害怕商品市场经济的竞争张力势必动摇、冲垮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特殊培植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和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1871年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采取两个办法、确立两种制度以保证官员是社会公仆而不会变为社会主人(老爷),即实行官员选举与罢免制、官员与熟练工人同等工资制(官员之间、工人之间工资差别只有5倍),这也是防止社会公仆变质的两项重要保证。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列宁非常重视贯彻实行巴黎公社的这两条宝贵历史经验。可是后来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步背离了这两大原则。选举限于苏维埃代表、党代表和党政主要领导人,但是苏联采取等额选举,没有差额,没有竞选,而且候选人的产生还要由上级党委严加控制,这种选举徒具投票形式,实际上是变相的任命。苏联没有发扬巴黎公社开创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优秀民主传统,却继承了沙皇专制制度官僚层层任命制、权贵等级制和高薪特权的衣钵。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实行任命制、等级授职制,于是逐步形成了依权仗势、等级森严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它成为个人专制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而且党政军官僚的最高工资待遇与熟练工人工资的差别由20世纪20年代的几倍扩展到30年代的30多倍,50年代的50多倍,80年代的100多倍,越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住房、汽车、物品供应等方面享有的特权就越多。总之,苏联从30年代起形成了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政治体制中分享到不等的特权。

第五,苏联共产党特别营造的由党严密控制的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文化基础和思想

基础。基于旧俄国文化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他着重批评了当时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左思潮。这些人否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外国一切文明成果,认为在“特殊的人工实验室”里,就可以制造出“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主张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充分发挥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对他们要采取耐心谨慎的态度;对艺术创作部门不能作“繁琐的管束”,要允许他们有相对的自主权,使其“保持自治”。可是到30年代,随着在经济、政治领域转向“左”的路线,文化领域也越来越“左”。党的领导人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研究加以严密控制,对各种不同风格和学派乱贴阶级标签,乱扣政治帽子,对被批判者采取各种行政和法律惩罚、惩治措施,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在繁荣文化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直接包办文化的权力急剧膨胀。连苏联历史教科书也要由斯大林等领导人来拟定提纲,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是非也要由党中央领导人来做结论。这样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就进一步发展为以党代文的文化体制。结果是营造出了党文化:一方面文化必须按照党领导人的观点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只能是歌颂党及其领袖的伟大,其核心是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党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显然是为维护个人专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奠定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六,斯大林个人的特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从民主政党变为专制政党起了关键性的催化作用。列宁曾经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流亡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从事革命活动达15年之久,有民主素养。与列宁的经历很不一样,斯大林是土生土长的职业革命家。他于187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鞋匠之家,在东正教教会中学读书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在地下斗争中曾经七次被捕,六次被流放。他勤奋自学,思维敏捷,对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观察问题尖锐深刻,口头与文字表述都简洁明快,意志坚强,办事果断,然而思想方法主观片面,思想认识狭隘固执,思想作风孤傲粗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自由观以及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与自由的实践了解不多。他从亲身经历的10多年的地下斗争



和监狱、流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的都是统一集中、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嫉恶如仇、坚持抗争、决不妥协等感悟和经验，却很少受到集思广益、尊重少数、宽待反对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等现代民主与自由社会生活准则的教育与熏陶。所以，一旦他掌握党和国家大权之后，很容易习惯性地按照自身的历史经验待人接物、处世办事。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大，他的急躁、粗暴、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等毛病暴露得更充分，使列宁感到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感到“没有把握”。

苏共由民主政党蜕变为专制政党，当然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过错，而且是整个俄国富有专制主义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多方面历史遗产的产物，又是苏联各级领导协同促成的结果。后来几任领导人的改革措施不得力，最终导致改革方向有错误，这固然对苏共的灭亡要负直接的责任，但是其根源在于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积重难返，盘根错节，涉及众多官僚特权集团的权益，遇到重重阻力，难以寻求、开拓一条从发展党内民主着手，进而发展人民民主，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之路。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

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失望，于是社会上要求体制外改革的声浪越来越强大。结果到1989年—1992年间终于使苏联和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专制型的共产党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了，全军覆没了，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鉴于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2002年十六大第一次明确、响亮地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这是我们党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决心重新振兴的重要论断。然而党内民主并非空泛的理论和空洞的口号，而是包含许多具体的内容和举措。只要细心考察列宁初创的党内民主制后来怎样被破坏殆尽，就不难领悟到应该如何结合我国实际既坚持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和实践，又向前去发展并完善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

（本文资料来源原来有21个注解，如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作者高放为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

（责任编辑 吴思）

## 新书介绍



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作者包括李雪峰（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前北京市委书记）、萧克（上将）、李新（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慎之（原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室副主任）、韦君宜（著名作家）、于光远（著名学者）、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李昌（原中纪委副书记）等。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那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定价28元，邮资7元，汇款地址见本刊址）

1980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

邓小平1980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制建设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党的十五大已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摒弃一切沾染着封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定价28元，邮资7元，汇款地址见本刊址）

# 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

· 何方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分为前后各 30 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虽也取得一定成就,但还是犯有严重错误和得到沉痛教训的 30 年。后一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达到初步小康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 30 年。造成两个阶段不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及其特征的判断不同:前者认定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后者认定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不同的判断导致不同的结果。

## 对时代的理解与划分

为了便于讨论在时代问题上两次不同判断和应该汲取的教训,先简单谈一下什么是时代和时代的划分。

我们这里谈的时代,为列宁首创,是国际共运的传统提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始终被置于第一位的重要观念。各国共产党在制定战略方针时都以对时代的判断为出发点和基础。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确定其国家战略特别是对外方针时,首先考虑的也是总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不管是不是用时代这个名词。

由此看来,时代就是指对一个历史时期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趋势的判断。因此,第一,它是国际性的,涵盖全世界,而不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第二,它具有全面性,是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总趋势,而不是某个方面的发展阶段,如信息时代。第三,它具有决定性。世界上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倾向和事态经常都在发生和发展,包括战略格局和国际秩序,但都不可能扭转和改变时代的基本特征,而只能受它的制约。第四,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是说时代和体现它的基本特征存在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不会轻易改变。基于以上各点,可见对时代的判断是着眼于长期战略的根本性判断,因此不能碰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动摇以至改变对时代的认识,否则必定会犯大错误。

当然,时代的核心问题还是人类诞生以来一直最为关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只是这里所谈的战争是指世界大战,不包括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小的冲突,否则就永无和平可言了。所以邓小平说,“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根据同一理由,世界和平也就是指不打世界大战。所以,还在冷战结束前,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二战后人类一直过着历史上少有的和平生活,有时人们感到世界更不安全,是由于信息的发达,使一个不大的地方冲突,甚至一次爆炸都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忧虑。

至于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则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并且较快的发展,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改良、技术革新、文化进步等各方面。社会发展与社会革命不同。革命是推翻旧统治,建立新制度,虽然也有通过和平改良的,但以使用暴力手段为多。所以,革命往往和战争相联系,不但战争引起革命,而且革命本身多是战争。发展则必须以和平为条件,因为即使革命战争也会带来破坏和停滞。这就使在时代的划分上,战争与革命搭配,和平与发展结合。

根据以上这些理由,人们把过去的 20 世纪分为两个时代。前半期被称为



战争与革命时代。因为在此期间,发生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并引起了两次世界革命高潮,而且社会经济发展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还爆发了30年代的大萧条。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就代替了战争与革命。这时不但大战已经停止,而且交战国也多已先后医好战争创伤。同时战争引起的世界性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也随着殖民主义体系走向崩溃而衰落。这期间,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时代特征的替代,世界才能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根据

时代特征的转换交替,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对时代特征作出正确判断和适应,而不能随意创造或改变它们。邓小平也只是说,我们要抓住机遇,他并没有说我们可以创造机遇。但是有不少学者在谈到时代和时代的特征时,却不是这样看问题,反而认为时代和时代特征是由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因而把战争与革命时代跟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交接定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在这之前,毛主席和党中央都肯定我们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直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才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随后由党中央定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还有人更进一步,不但认为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决定客观存在的时代特征,而且形势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得服从于领导人确定的国内中心任务。这就是最近有人说的,“国内中心任务的重新确定,反过来决定了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因此,“‘和平与发展’不是对前30年外交思想的全面否定,而是立足于新世纪国内中心任务而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表述,一个期待,一个宣示。”“当我们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一个‘科学判断’的时候,并不需要多少学术论证,因为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决定的。”这些说法,不但实质上,而且表述上都把时代特征的交替和国际

形势的变化完全弄成了领导人意志的产物。实际上,不论叫时代特征还是叫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都是由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人的意志,即使是主要大国领导人决定的“中心任务”,也只能对它产生某些影响,绝不能改变它的发展方向。所以说,新的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替代旧的时代特征“战争与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世界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判断。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客观历史根据。

先谈和平。世界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今后长时期能够维持和平、避免大战,是由于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人类,特别是世界大国人民的觉悟和进步有了空前提高,成了维护和平的主要因素。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历史毕竟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的觉醒变成了巨大的和平力量。即使对大国来说,人也不单指人民群众,连领导人和统治集团都再没有打世界大战的主观意愿。在冷战时期,被邓小平说成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一直避免迎头相撞。二是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资本主义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自我调节能力,能够缓和以至解决各国自己以及相互间的一些矛盾,而无须诉诸战争。这说明资本主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没有走向死亡(垂死),也否定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三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得到不断改进并渐趋合理,使各国的利益互相渗透、日益融合,因而列强已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争夺地盘和市场而互相厮杀。四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和不断更新,以及其他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都成了制止大国之间战争的手段。所有这些,就使人类已经过了近70年的和平生活,看来今后也不大可能再爆发世界大战。

再说发展。发展之所以代替革命成为新时代的特征,首先是由于和平的国际环境。本来和平与发展两个特征就是不可分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维护。其次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战后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对社会生活产生

巨大影响,是人们都体会到了的。第三是经济市场化。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二战后一个大的世界潮流。凡是顺应潮流、实行市场化的国家,经济必然发展得快;凡是反其道而行的,发展就一定慢甚至倒退。二战后头30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都吃了没有市场化的亏。直到1980年后,市场化才在全世界迅速展开,卷进的人口从这以前的6亿增加到20世纪末的60亿,只剩下极少数几个国家排斥对内对外的市场化而自甘落后。第四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二战后又一大世界潮流,成为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战前只有美英法等少数几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且民主内涵还很不完备,单以选举论,就有财产、性别、种族等的歧视和限制。战后,从70年代起,民主化才得到迅速扩展。仍以选举制为例,1975年全世界民选政府只有30个国家,到2005年已增加到119个。民主化的潮流不但波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多数国家在1980年代就由文人政权替代了军人政权;1989年53个非洲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3国,1994年已有48国。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化潮流中也有很大进步。例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40多年前在《我有一个梦想》的讲演中所提要求,现在就已基本实现。黑人奥巴马当选总统,更是明证。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国际化和全球化。它们既是维护和平的支柱,又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这是无须多说的。这里只附带谈一下个人对两者不同含义的理解。所谓国际化,是指国际交往的行为主体基本上是民族国家,所以长期以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都是这样称呼的。而所谓全球化,则是指行为主体除了民族国家外,还增加了各种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一体化的地区组织、区域合作机制等,特别是发展迅速和作用越来越大的跨国公司,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反而不断受到削弱。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全球化的提法也是名实相符的,国际化称谓从此就逐渐用得少了。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而从这些因素的性质和趋势看,和平与发展时代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 我们头30年对时代的判断犯了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经过延安整风,正式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和绝对权威。从此,他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成了党中央和全党的观点和看法,及至取得全国政权后,又成为国家和政府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毛主席对时代和时代特征的判断,自然就成了党和政府制定国家战略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基础。可惜他并没有看出时代特征的交替,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和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以后,他还始终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由此出发制定的建国后一系列重大政策,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是位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因此他坚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亦即“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论断。前面说过,这一判断只适用于20世纪上半期,到下半期就不再适用了。正是在上半期,毛泽东掌握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制定了基本上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即使在那个时期,他对形势的估计也往往偏“左”,更没有预计到时代特征的交替,因而对形势发展远景的看法就很不准确了。例如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肯定当时已经处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而且断定二战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胜利后也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后来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世界发展的预期都过分乐观了。特别是二战结束后,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更加脱离实际。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他曾断言,“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在我们方面,不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这些判断当然又落空了。坚持“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判断的斯大林,自



然也没有看清不同时代特征的交替。他在195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就仍然断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但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倒还能听信斯大林的估计,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帝国主义看重的是争夺中间地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也还能迁就苏共为适应“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战略而改提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有他签字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就正式肯定了这一提法,承认“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但是进入1960年代,随着他发动的反修斗争日趋激烈,他对时代的提法调子越来越高,最后定位为写进中共九大报告中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与此同时,他对革命力量也估计过高,1957年提出“东风压倒西风”,1958年又进一步断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由于坚信“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所以不但不怕战争,似乎还有点欢迎战争的味道。例如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就用他内部讲话的语言,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大声宣告:“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白了。”毛泽东和陈毅等领导人的这种主观因素,自然影响到他们对战争威胁的估计。所以才先有“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后来又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论断,从“战争不可避免”上升到“战争威胁迫在眉睫”,好像世界大战,特别是美国或苏联(甚至认为它们会一起来,因为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马上就要到来了,神经紧张得不得了。西德前总理施密特在他的《伟人与中国》一书中叙述他1975年10月访华时同毛泽东的会见,就提到毛曾开门见山地说,“请相

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问及“如何看美中苏关系的发展”,回答也是“要打仗”。“他(指毛)简直被这个思想迷住了。”判断既然如此,所以采取的对策就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立即转变到全国动手,全面备战,而且“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直到设想用“农村(亚非拉)包围城市(欧美苏)”和持久战的办法,一举消灭“帝修反”。这一错误的主观判断,曾使全国在很长时间处于临战状态,连我们在偏远的江西农村的“五七干校”也挖起了战壕。

## 对时代错误判断的沉痛教训

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不管主观上是否认识到二战后世界已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但凡是按照这一时代特征制定国策的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以至创造出奇迹。与此相反,凡是仍然坚信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的,无论叫什么主义都肯定落后。这已是经世界各国实践检验过的普遍规律,不但完全适用于上世纪后半期,还会继续适用于已经开始的21世纪。只要回顾一下世界各国过去60年的发展情况,就不会对此有所怀疑。

经过二次大战,战场所在各国经济都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可说都成一片废墟。但由于西德执行了艾哈德以发展为重点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日本坚持和平发展的吉田茂路线,很快“奇迹”就出现了。到1970年,日本的经济地位已跃居世界第二,西德也超过英法而升为第三。不但西德和日本,就是许多小国和地区如欧洲的芬兰、挪威、爱尔兰等,亚洲的“四小龙”,也都创造了“奇迹”。只有错误认识时代、违背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一定吃亏、落后。所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莫不如此。我们中国就有沉痛的教训。

由于对时代特征判断错误,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和那些抓住机遇的国家背道而驰。人家着眼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重视继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和发动各种运动。人家千方百计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我们为反

对“西化”和防止和平演变,坚持闭关自守。人家要搞缓和,我们强调备战。其结果是:人家迅速发展,进入新的文明阶段,我们落后倒退,丧失了一次最有利的发展机遇期。时间虽然只有30年,但要弥补起来,恐怕就得百十年。因为正像邓小平说的,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还和我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更不用说韩国、新加坡等中小国家了);但他们利用了那难得的二三十年机会,很快变成了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在竭力追赶,但邓小平却说,到国庆一百周年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见建国后30年的错误,弥补起来多么不容易。下面我们单就经济发展做点简单的国际比较。

据世界银行资料,1955年我国GNP占世界比重4.7%,人均GNP相当于美国的3.2%;1980年,总量占世界比重降为2.5%(另据2008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份额1978年只有1.8%,为2165亿美元;2007年才提高到6%),人均降为美国的2.5%。反观日本,1955年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2.4%,约为我国的一半;1980年所占份额上升到9.5%,已为我国的4倍。据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测算,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26年里(1953—1978),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学习时报》2008年8月25日载周天勇的文章中也提出以下数据:“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在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人均GDP反而排到了倒数第二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公斤和0.2公斤。”“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邓小平也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按:我认为,头7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闭关自守,以及“三反”、“五反”等也是“左”的、错误的。否则,无法解释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执行的政策和当前的现实以及自己制定的今后发展方针。)这20年,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这里还应补充上这句过去常说的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被推到崩溃的边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可以说是从上到下绝大多数都觉悟到,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必须改弦更张、拨乱反正,另谋出路。这样才“摸着石头过河”,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因而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后30年。

### 对时代特征判断的拨乱反正

新中国成立以来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后30年,是对前30年进行拨乱反正、破旧立新、另谋出路的结果,是一次带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变化,但却是在和平和有序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因为,前30年的穷折腾已使全国人民普遍产生了思变怕乱的思想,同时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领导和主持这次转变并开辟后30年发展道路的都是前30年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这就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中央领导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上认为正确并决心要做的事,都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和实现,人心比较顺。二是维护了原有的政治体制,拨乱反正进行得不够彻底。这也表现在对时代特征认识的不够彻底上。

在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知识界,认识上很快就取得了一致。但作为这一决策的认识上的基础,即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却并没有适时转变过来。这就不免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产生重大矛盾,影响是明显的。

一些领导同志,在国内问题上,文革前和文革中,就和毛主席有些不同意见,偏重抓经济;文革后更看到世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所以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当年积极参加反修的重要领导人,因此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就一时转不过弯来,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和“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观点。1979年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就仍然强调,“战争威胁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我们的对外宣传口径还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这样就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上都产生了无法调



和的矛盾。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哪还有心思去集中力量搞建设呢?

因此,要转变国家建设方针,破前30年的“旧”,立以后发展的“新”,就必须首先解决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和判断,因为这是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和基础。正是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才终于基本上解决了这个矛盾。这集中地表现在邓小平同志1984年11月1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他说,“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第二年3月,在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问题。不久,在军委扩大会上,他就正式宣布了我们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外交政策。”“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问题,就为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市场化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进而把两千年停滞的中国经济一下推上一个高速发展轨道,使我们竟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来了个大翻身,创造出一个独步世纪之交、得到公认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奇迹”。也许再过一两年,我们国家就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是,我们也有对时代认识不够彻底的一面,例如一开始没有把和平与发展同时代相联系,还把和平只限于东西问题、发展只限于南北问题,并且认为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也没解决。那么,战争与革命,哪个算解决了?如果和平只是

东西问题,那苏联解体后可否算解决了?这些认识,当然会影响到包括政改等全面改革的实践。但这并没有降低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且有关时代本身阐述的不足,也已得到历次党代会的完善和发展。如中共十三大就把和平与发展定为世界两大主题,十四大和十五大又进一步提为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现在,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不但早已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还被定为国策,成为国家前进的路线和方向。其实,就是世界各国,不管是否承认时代学说,也已经没有一个公然反对和平与发展的了。因此,应该认为,时代问题实际上已经基本解决,也没有什么可以再争论的了。

## 在时代特征判断上的反复值得重视

既然已经基本解决,为什么又要旧话重提,还谈什么现实意义呢?这是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对于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基础的时代问题,至今还有不少模糊认识。如前面引证的,似乎是由领导意志决定时代特征和客观形势的发展,就是证明。更为重要的还是,这类认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汲取。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某些舆论上的回潮和倒退,其根子就在于不承认新中国前30年在时代判断上所犯的錯誤。因而就要设法掩盖、淡化以至否认那个时期所犯的其他严重错误。这些都明显地反映在纪念国庆60周年的言论上。

纪念国庆60周年期间,看到一些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文章,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60年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30年。正像有的文章所说,对后30年争议不大,焦点是如何看待前30年。对两个30年及其相互关系,按我看到的材料,大体上有两类说法。一类说法认为,前30年固然取得很大成绩,如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恢复了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在苏联援助下建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发射了两弹一星等等;但是整个说来,我们的“纲”抓错了。毛主席经常讲“纲举目张”,抓错“纲”就必然导致一系列严重错误,使前30年得到的反而主要是沉痛的教训。所以,谈到前后两个30年的关系时,有人就说,“辉煌的成

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的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欢庆共和国60周年伟大胜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冤魂,还有更多的遭受残酷整肃的优秀人才和普通公民。”

可是,像这种要人们汲取沉痛教训、提倡“勿忘历史教训,方能继往开来”的文章,在报刊上看到的很少。看得比较多的则是劝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忘记历史教训和对过去错误设法掩盖、淡化以至否认的文章。他们批评那种要人们记住沉痛教训的言论为历史虚无主义,只务虚不务实,夸大头30年的错误,看不到那个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例如就有人说,后30年是站在前30年的基础上的。不过他所谓的“基础”并不是指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更不是工业化,而是共和国的成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这不是等于说,为了充实建国后头30年的成就,也可以把建国前属于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时期应该和已基本上完成的任务借来顶替吗?既然后30年是从前30年的基础上“一级一级地”走过来的,两个30年衔接的又是那么稳妥,哪为什么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叫做“伟大的历史转折”,还要搞长时间的拨乱反正呢?我们前30年不是在为后30年的发展打“基础”吗,邓小平怎么能说成是我们犯了20年“左”的错误呢?平反冤假错案,转变对战争的看法和转变国内外战略,不都成了多余?还有人甚至要为大跃进“平反”,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不同,大跃进是由量变到质变,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说明不能由一个人负责,应当是人人有责。但却有点忽视1959年庐山会议从反“左”一夜之间变成反右,随之在全国掀起一年多近两年的继续跃进和反右倾的大风暴,导致在和平时期静悄悄地饿死了三四千万人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悲剧。逝者已矣,至今他们竟然仍旧是被有意忘记的冤魂!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总会涌起一阵难言的悲痛。这倒不是由于自己当时下放安徽,几乎饿死,主要还是有一年时间亲自经历和目睹了那种饿殍遍野又沉寂如水的农村景象,印象太深刻了,一直忘不了。

回避头30年的沉痛教训和教人们忘记,如果只是一些学者个人的想法和意见,那当然无关

大体,他们完全可以坚持下去,发表出来,进行争鸣,互相评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得出,这类意见处于主流地位,可能属于舆论导向。而且对于我们这种极其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舆论导向是和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动向完全保持一致的。所以上面提到的舆论上的回潮,就表现在社会各个层面上了。以人们所能看到的一些现象而论,就可以随手举出不少例子。比如,过去党中央曾一再提出的禁止搞个人崇拜,现在不但已经有些恢复,而且还以不断创新的形式大搞起来了;“五四”后长期批判的儒学,现在得到大力提倡,孔夫子也已“公费旅游”去了全世界(要知道,他生前只“周游”过山东河南。而且我们过去一直批判列强在中国办学,现在的孔子学院却已在海外办了四五百所);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加强国家垄断(通过国企和行政手段),都严重影响到市场的健康成长和完善,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警告和呼吁。其他更明显的例证就无须再列举了。

现在,党中央正号召全国人民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而回避历史教训、着意弄虚作假,却是科学的大敌。用来教育青年,著书立说,还会贻误后代。所以舆论上的这种回潮,实在值得人们重视!

(2009年10月29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 启 事

2008年精装合订本 85元,简装 80元  
2009年精装合订本 100元,简装 95元  
2009年简装合订本(上、下册)105元  
以上均免费挂号邮寄

# 公安工作“大跃进”

● 尹曙生

笔者生来有幸,赶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能够亲身体会到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明白很多道理。尽管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我也曾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比起那些遭到灭顶之灾的无辜的同时代人,我是很幸运的。

1952年暑假,我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少年,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安徽省在芜湖市举办的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任务是帮助老师交代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为期三个月。因为我政治觉悟太低,什么也不懂,对老师毕恭毕敬,说话有时还脸红,帮助老师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当上了义务勤杂工,打扫室内外卫生。不过开批判斗争大会时,我们学生代表都参加,看到尊敬的老师被人指着鼻子羞辱、谩骂,真不是滋味,既同情又无奈,害怕出什么问题。

把全省一千多名“有问题”的老师,集中到今天的安徽师范大学改造思想,是安徽教育界解放后的一件大事。大学建筑物围绕褚山,风景十分优美,站在山上,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淌。只要有空,还是孩子的我们,到山上尽情地玩乐。可是,自从有几个老师过不了关,吊死在褚山的树林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上山了。

思想运动改造结束后,一些老师神秘失踪了,后来听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了。

1955年、1956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母校舒城中学最好的语文、数学和历史老师,两个自杀,一个被逮捕判刑,死在劳改农场(1978年后都平反了),又一次震动了我。余悸未消,1957年秋,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正赶上反右派斗争,入校不久的一天,亲眼目睹院长钱端



公安部长罗瑞卿作镇压反革命动员报告

升从印度访问归来,学校从机场将他直接送到礼堂进行批斗。他在整风运动初期给院党委提了几条意见,一点也不尖锐,却在他出国后将他划为右派。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中央派他代表中国法学家出国访问,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局。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亲笔写信给他,聘任他为宪法总顾问,毛的亲笔信学校还作为校史展览过,说明他在法学界的地位是很高的。钱端升和学校很多老师、同学被打成右派的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祸从口出”的道理,从此小心翼翼,不敢胡言乱语,安然度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

1958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提出短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国)、赶美(国),十几年内甚至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我们学校也建了十几座小高炉,用木材和煤炭炼铁,我也积极参加了,炼了几个月,一块合格的铁也没炼出来。1959年春天,饥



饿在全国逐步蔓延起来，到了1960年，由于饥饿，营养不良，我也得了肝炎病、浮肿病，三个多月不能上课，住院治疗（那时医院人满为患，住不上医院，学校腾出十几间房子，安置病人，医院定期派医生来看看）。所谓治疗，就是不上课（那时北京的学校体育课一律停止，有的学校上半天课），卧床休息，减少热量消耗，增加点营养品。三个月我得到2斤鸡蛋、1斤猪肉的营养品补助。到了这年年底，全国先后有几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在农村的叔伯堂兄和我的亲姐夫。可是就在1958年，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国家领导人还为粮食吃不完发愁呢！

1961年秋，我大学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当教师。可是公安部到学校挑学生，偏偏把我挑去，不去还不行。北京政法学院三个应届毕业生直接进了公安部大门。去报到后才知道，中央已经把公安部副部长王昭调到青海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王昭去了以后，发现那里的公、检、法机关在“大跃进”运动中，违法乱纪十分严重，需要彻底整顿，需要充实力量，于是他向公安部要人，我们三个进入公安部的大学生和部机关几十名干部调到青海省，充实政法部门，主要是公安部门。我到了青海省公安厅，分配的工作是接待上访群众、处理申诉案件，配合省委复查案件办公室，调查、处理重大冤假错案，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公安机关为了配合“大跃进”运动，自己也搞起“大跃进”，运用专政工具，制压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悲剧。

那么，公安工作“大跃进”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要求“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

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的“大跃进”的方向

和目标。“要点”明确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努力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的‘四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无破坏事故、无百元以上盗窃案、无10元以上火灾的机关、企业、学校”。

这个计划要点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认可下发的。同经济建设“大跃进”一样，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空想的计划。同时，“要点”并没有提出达到这一计划目标的具体有效的办法，而是笼统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什么叫“应该逮捕”？什么叫“应该管制”？“依法”，依什么法？没有可操作性，各人有各人的解释，怎么解释都有道理。这就给滥施刑罚的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这一段话也明确无误地告诉各级公安机关，要动用专政工具，来保卫、促进“大跃进”运动政治任务的完成。

贵州省公安厅积极响应，于1958年2月率先提出在全省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土匪、无盗窃、无骚乱、无烟毒流行、无赌博活动”的“七无”运动。公安部立即发文，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贵州省的做法。于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积极响应，在“七无”的基础上，有些省开展“十无”、“几十无”、“百无”运动。有些地方感到这些“无”都不能反映公安工作“大跃进”的现实，于是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设想，就是把整个社会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样干净、明亮，没有一丝尘埃，不要说没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会有。这些提法受到了当时中央主管政法工作领导的赞扬。

公安工作“大跃进”的口号有了，目标有了，如何实现呢？办法就是动用专政工具，把社会上那些被认为是坏人和可能成为坏人的人，有可能犯罪、潜在犯罪的人，统统抓起来，关进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监狱，让他们没有办法搞破坏活动。1958年4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

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1957年的总和。安徽省1957年逮捕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达的捕人指标是4.5万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10.1万多人;到1960年,3年共逮捕17.3万多人。被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偷盗生产队的粮食,或哄抢生产队、生产大队仓库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被拘捕的人中约有1/3左右死在关押场所,造成了巨大的人间惨案。安徽省3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罪嫌疑人、劳教人员5万多人,占这些人员总数31%。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304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

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独断专行,盲目蛮干,全省哀鸿遍野、饿殍载道,4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就这样,老百姓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因为稍有反抗,就得坐监狱,就得被整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那么一个人忍不住了,于1959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发泄心中的愤懑情绪。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1.8万人,笔迹鉴定3000人,秘密搜查4000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梢、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在受审查的人员中,有厅级干部6人,逮捕、拘留、停职反省“犯罪嫌疑人”各1人。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

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公安机关成了曾希圣的私人侦探社。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包括基层领导,公社、大队领导)对谁不满,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关进监狱。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应该逮捕”的人。

青海省1958—1960年,3年中就逮捕了63064人,约占这3年全省平均人口244万的2.6%,等于1949—1957年逮捕人数总和19077人的3.3倍多。其中,1958年为了推动“大跃进”,镇压反对派,逮捕了40602人。随着“大跃进”运动乱象的不断发生,毛泽东于1958年底、1959年春,在郑州两次召开会议,主动纠左,公安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公安机关执行“三少”政策,即“杀人要少,捕人要少,管制也要比过去少”。所以1959年全国捕人、拘留人大幅度减少。安徽省逮捕人数由1958年的10万多人一下子降到8115人。青海省1959年逮捕4345人,只有1958年的1/9。1960年全国公安机关为了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反富裕中农,层层揪“小彭德怀”,又大规模捕人、拘留人,青海省全年又逮捕了18177人,安徽又逮捕了5万多人。拘捕人数这样大起大落,不是由社会治安状况决定的,完全是根据领导人的指示,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逮捕、拘留人。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的做法。

逮捕、拘留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青海省的浩门农场,就有800多个黑人黑户劳改犯,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些人由东南沿海地区送来劳改,不知道每个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们统统成了无期徒刑犯人,死了也无法通知家属。王昭到青海主政后,全省有3000多名“黑人黑户劳改犯”侥幸没死被释放回家。

下面用青海省几个县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跃进”是怎么操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县委给省委写



镇压反革命斗争大会

了一个报告,叫做《打击敌人防止叛乱的报告》,向省委邀功。互助县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叛乱。报告称:“1958年6月,互助县公安局抽调52名干部,组成12个工作组,分别到各乡,于24日一个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会上1075名,机关77名。”

一个不到10万人口的小县,一个晚上逮捕这么多人,会是什么情景?简直无法想象。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这个县还在捕人;不仅逮捕普通老百姓,还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层干部也逮捕起来。1960年4月,该县红崖子沟公社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农民马贤珍当生产队长,可全队150多人已经有40多人饿死。他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他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在母亲的启发下,他冒着瞒产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他知道就这点粮食、蔬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主动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关,使生产队饿死人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可是生产队已经没有粮食。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

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没有磨成粉,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天还没亮,被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安局,公安干警来抓他,没有饿死还能动弹的社员为他送行,其中一位60多岁的农民对执行民警说:我们生产队100多人,现在只剩下50来人,要不是戚队长给我们分点粮食,恐怕都饿死了。公安同志,我们只要求一件事,你们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们还等他回来救我们呢。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将戚元法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民和县是青海省的东大门,自然条件较好,适合种植小麦、青稞、土豆和多种水果,湟水流经该县,经兰州入黄河,两岸景色秀丽,是青海省的粮仓和水果大县。王昭到青海主政后,派省委工作组(我有幸参加)深入调查发现,由于人祸而非天灾,该县1958—1960年饿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面的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实际死在外面)7925人,全县净减少人口25%。死亡最严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产大队,原有1318人,饿死601人,占总人口46%。全县死绝的有492户、1623人,被收容的孤儿867名。就是这个县,发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尸体38具,杀死自己或别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该县领导人不顾人民死活,搞“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反“瞒产私分”,用专政手段残酷对待稍有微词的人民群众。3年间逮捕2680人,管制1091人,劳教、集训1915人,被判刑罚的2966人。

被关押的人,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威胁,造成大量死亡,而当政者却无动于衷。3年中死在这个县看守所、拘留所的就729人。1960年8月,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已经一年的谢富治,到县公安局视察,亲眼目睹干警从看守所将死人往外抬,经询问,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对公安局长说:“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里鬼来找你麻烦吗?!”在公安工作上竭力执行左倾路线的谢富治忽然良心发现,说明问题有多严重!他对陪同视察的公安厅厅长杨树芳说:今年青海省计划捕人指标要和



去年(1959年)大体持平,不得超过。然后他到新疆视察,回北京路过兰州,又把杨树芳叫去,对他说,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标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达的5000人之内,要超过,必须报中央批准。杨树芳立即向省委书记高峰汇报谢富治的意见,高峰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捕人指标,并在会上说:“今年是誓死保卫大跃进,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关键年,捕人不能少。”于是省委向中央报告,全年捕人指标15000人。报告上去后,中央和谢富治都没有表态,实际是同意省委意见,结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是青海省的粮仓,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县。可是群众不敢反抗。因为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他在全县搞捕人比赛,哪个派出所捕人多,他就奖励、插红旗;哪个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评,领导人受处分,给派出所插白旗。1958年6月,他根据省里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由于凑不够捕人数字,将群众反映有通奸行为的270人也逮捕了,占总数32%。该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只能吃2两(16两1斤)粮食,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人,饿死7人,无奈之下,他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杀死煮吃,维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队食堂打饭,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汤,在回家路上,他喝了两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气之下,将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将饿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镰刀,带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跑回家中。饲养员回饲养场发现驴耳朵被割,报告生产大队干部。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占祥家,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还搜查到两张羔羊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他捆上,把他的耳朵穿个洞挂着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安有芳的表扬,并以“杀害牲畜罪”将李占祥逮捕,法院判处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组到湟中县检查公安局自查自纠情况,问新来的公安局长,为什么李占祥还不释放,局长说,李占祥偷

大队羊羔、割驴耳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拿不准,所以没放。王昭听汇报后说:李占祥家11口人饿死7口,他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按法律规定也不应该逮捕呀!这样,李占祥才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饿死了。他带着几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庄公社检查工作,决定逮捕几十人,当派出所长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时,他睡着了,又不敢叫醒他,继续念材料,等他醒了,所长问:以上的人怎么处理?他迷迷糊糊,连声说“捕、捕、捕”,就这样,一晚他就决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乐都县委向各乡、镇下达了一个详细的捕人计划指标,通过这个计划指标,让大家看看有多荒唐!

下面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县各类敌人的打击指标总捕人数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员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坏分子95至100名,敌伪军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敌人(恶霸、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敌伪军政警宪人员——笔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劳改释放犯、反革命家属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贯道徒、巫神30至36名,开除机关、学校交社(会)管制监督生产的反坏分子7至10名。按乡镇分:碾伯镇捕28至30名,老鸦镇捕15至17名,瞿昙乡捕27至29名,岗沟乡捕26至28名,洪水乡捕12至14名,高店乡捕11至13名,峰堆乡捕14至16名,马营乡捕16至17名,李家乡捕19至20名,寿乐乡捕11至13名,共和乡捕13至15名,水磨乡捕13至14名,高庙镇捕20至28名,雨润乡捕13至14名,新仁乡捕16至18名,蒲台乡捕19至21名,中巴乡捕16至18名,城台乡捕17至19名,马场乡捕18至19名,芦花乡捕15至17名,中岭乡捕12至13名,引胜乡捕18至20名,达拉乡捕15至17名,双堡乡捕9至10名,宗教寺庙捕7至10名。时间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至七月十五日结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后于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对象全部捕捉起来。”

这么详尽周密的捕人计划,堪称“一绝”。今

天的人们会问,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不会吧!我要郑重告诉他们,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们的共和国确实发生过。而且还不不是一个地方发生过。

当时政法部门为了“大跃进”提出一句口号,作为公、检、法三家的行动准则:叫做“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一员顶三员(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在这个口号指导下,公、检、法三机关等于一个机关,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党、政领导,三家干警,带上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所谓回来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1959年12月,西宁市公安局抽调15名干警到湟中县三合公社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副市长惠普对他们说:“你们下去是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任务很艰巨。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必须逮捕一些人,在需要时,你们可以先捕人,然后到局里办手续。”结果,工作组到公社不久,就决定逮捕58个人。惠普自己下乡,总是带着空白逮捕证,走到哪里捕到哪里,他说这样做“要捕即用,手续简便”。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树州法院有一张判决书竟判了183人。判决书这样写他们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这莫须有的罪名,更看不懂这判决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这183人中有11个妇女,172个男人,把他们通奸(包括男女),强奸、鸡奸、互相鸡奸累计统计起来,得出那个总数,而不分每个人有多少这样的行为,可是从文字上看,似乎这183人每人都强奸了607个人,包括11个妇女也犯了强奸、鸡奸罪。这张判决书,是省委工作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树州检查时发现的。以后我随领导到玉树,亲眼看到了这张判决书。

这张判决书可以作为文物珍藏起来,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什么叫草菅人命。

“大跃进”时期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

种种荒谬透顶的违法乱纪行为,事情发生在下面、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没有中央的路线错误,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了,范围也不会大,也容易得到纠正。在极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就很荒唐,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精神?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给中央写了一个《1958年至1961年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报告说:“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错捕了少数不应当捕、不应当判的人。少数基层公安机关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用拘留、劳动教养和集训等办法,变相地捕押了一些人。还有一些无权捕押人犯的机关单位(如公社、大队、工地、企业、学校),甚至个别党委机关、个别负责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权力。或者滥用拘留、劳教、集训等手段,变相捕人、押人。尤其严重的是,极少数地方负责干部采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们违背中央路线、方针的错误政策……”

1958年公安工作要点明确提出“把应该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依法管制起来”。什么是“应该”、依什么“法”?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把法律放在眼里。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当时这三个法律草案已经起草完毕,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于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作怪,一直没有经全国人大通过,现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干脆说这三部法律没有必要制定,政法部门机关怎么执法?只能依据党的决议、领导人的指示办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自己不按法办事,把错误全部推给下面,是不公平的。

刘少奇看了这个总结报告有个批语,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刘少奇对政法工作错误性质的批语一针见血。但是他没有明确指出错误发生在地方,根子在中央;没有明确指出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按法律办事,是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不过也不奇怪。在“大跃进”时期,刘少奇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实践者,也是法律虚无主义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也说过:“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做办事参考。党的决议就是法。”有了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所以在“大跃进”时期,各级党委的决议都成了法,领导人的话也是法,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斗争刘少奇时,一次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受宪法保护,你们斗争我是违法的。可是在宪法和法律被践踏殆尽的情况下,宪法和法律已经不能保护他了,被残酷迫害致死,令人无限同情和哀伤。他说过“党的决议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样一个违法宪法的党的决议,送了刘少奇的命。

不尊重宪法和法律,就得不到宪法和法律保护。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笔者在公安机关工作了一辈子,对公安工作很有感情。写这篇文章心情很沉重。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历史错误。公安工作的基本经验就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依法办事。但是,对党的领导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那就是严格按照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任何人、任何一级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都不能把自己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不能把公安、政法部门变成自己的附庸,来推行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格依法办事就是最好的

接受党的领导,因为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代表了党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时期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努力奋斗,顽强拼搏,勇往直前,不怕牺牲,为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人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改革开放30年来,公安工作没有犯大的、方向性的错误,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现在还有极少数地方领导人,为了推行自己错误的政策,往往动用专政工具压制人民群众,造成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本文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本刊2009年第10期发表的《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一文中误将作者写成王昭秘书,实际上他当时是青海公安厅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乐龄时尚》改版了 《生活杂志》更精彩

用新闻拉动生活,  
精品呈现生活的行家里手,  
传播积极、健康、高尚、进取的生活理念。

全年定价:120元

订阅方式:1、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2、致电本刊杂志社联系订阅

订阅电话:010-68325510转801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车公庄大街

乙5号B座408 100044

收款单位:《生活杂志》杂志社

邮发代号  
80-546



# 中国核武器基地揭密

● 王菁珩

从青海省西宁市往北 102 公里，是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金银滩草原西海镇。这里曾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二二一基地。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纪念馆。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上铭刻着：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爆炸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研制出厂；

——1966 年 10 月 27 日，我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成功的原子弹在这里研制出厂；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爆炸成功的第一颗氢弹在这里研制出厂；

——我国第一代核武器主要在这里研制，并实现武器化批量生产，装备部队；

——我国第一个型号核武器在这里退役处理；

——为新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输送了人材、科技和管理；

——这里是“两弹一星”精神孕育、形成基地之一。

## （一）事业创建

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西方大国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同志指出：“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在 1955 年 1 月 15 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创建原子能工业和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

1955 年 11 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 年 2 月，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后为核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宋任穷任部长，刘

杰、钱三强为副部长。

根据 1957 年 10 月 15 日中国与苏联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中规定，“为培养设计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干部和生产原子核武器的专家，苏联政府保证供给中国生产原子弹的全部技术资料，带有训练使用和战斗用的成品样品……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设研究原子弹结构的设计院（代号二二一）”，1958 年 1 月，成立三机部九局（核武器局），负责基地建设、核武器研制和生产。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李觉将军任局长，吴际霖、郭英会任副局长。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 221 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选址报告。

金银滩草原海拔 3000 多米，高寒缺氧，紫外线强，年平均气温零下 0.4 摄氏度。自然条件恶劣，

8 月，李觉将军带领 20 多人、三顶帐篷、四辆解放牌卡车和四辆嘎斯 69 吉普车，开始了头顶青天，脚踏草原的艰难创业。1715 户牧民迁往他乡。从兰州建筑工程局选调 1200 多名职工和 2000 名解放军指战员，6400 多名河南支边青年，组建了二机部 104 建筑工程公司和 103 安装工程公司四处，开始了基地建设。

10 月 28 日，成立北京第九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李觉、吴际霖和郭英会兼任正、副所长。

1959 年元月，二二一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老家、后来的核工业部二二一厂）成立了第二机械实验厂筹备处（即后来的青海省综合机械厂，掩护名称“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青海省委常委、九局局长李觉兼任筹建处临时党委书记。

核工业创业初期，苏联的援助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959 年 6 月 20 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



终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婉言拒绝提供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撤走核工业系统的 233 名苏联专家。周恩来总理指出：“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二机部确立“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工作方针。刘杰部长提出以“596”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激励大家造出中国的“争气弹”。

1962 年 9 月，二机部提出“两年规划”，表示争取 1964 年，最迟在 1965 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同意“两年规划”，并要求中央成立一个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和组织协调。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写报告，力争 1964 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提议成立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专委会先后召开九次会议，解决了 100 多项重大问题。组织 26 个部（委）、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900 多家工厂、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围绕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协作攻关。

中央调派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几位科学家参加核武器研究和领导工作。刘杰部长约见刚回国的著名科学家王淦昌时，传达周总理指示，请他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工作。刘部长给他三天时间考虑，王老当即果断地说：“刘部长，没什么考虑的，我愿以身许国。”从此，王淦昌改名王京。隐姓埋名 17 年，1978 年国务院任命王淦昌为二机部副部长时，人们才重新看到王淦昌的名字。

1960 和 1962 年，从中科院、各部委和全国各地抽调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 105 名专家，及张兴铃、方正知教授、黄国光工程师等 126 人充实设计、试验、制造队伍。

探索原子弹内爆规律的爆轰试验在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科学家领导下进行。1960 年 4 月，

九所二室副主任孙维昌带领 10 多人，在北京长城脚下，工程兵试验场搭建的帐篷里，利用一台普通锅炉，从部队借来几只熔药桶，焊接一把双层结构的铝壶，外层通上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马粪纸做模具，浇铸出炸药部件。打响了爆轰试验的第一炮。

1960 年冬天，饥饿和严寒袭击银滩草原。干部粮食定量每月 24 斤，吃的是青裸面、谷子面，每月 2 钱油，副食仅有一点咸菜、白菜汤，90% 的职工得了浮肿病。筹建处党委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下马”的指示精神，一手抓科研，一手抓生活。组建了农、林、渔专业队，垦荒种地，购置机帆船到青海湖捕鱼。

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副总理，得知西北几个基地的困难后，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亲自到军委会议上，筹措数百万斤大豆、罐头、酱菜，支援几个基地。省政府也拨来 2 万多头牛羊，组建了牧场。基地建成几栋单身职工宿舍，李觉、赵敬璞、吴际霖等领导住进了帐篷，把楼房让给工程技术人员住。

1962 年底，中央专委从建工部、铁道部、工程兵等 13 个部门抽调了 15 000 人的施工队伍，与二机部建筑、安装队伍汇合，组建了“221 基本建设联合指挥部”，李觉任总指挥。“221”工程全面展开，银滩上建起了壮观的青海原子城。

1963 年初，九局机关和北京九所（除理论部外），包括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等大批科研人员，以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的气概奔赴青海高原。

1964 年 2 月，局、所、厂合并成立第九研究设计院，李觉任院长，下设二二一研究设计分院（1965 年 9 月 18 日改为二二一厂，吴际霖副院长任书记兼厂长）。分院下设第一、二、三生产部，设

计部及实验部、理论部留在北京。1964年6月,在方圆1167平方公里的禁区,建成了18个厂区,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铁路专线38.9公里,沥青标准公路75公里。形成了院、厂、政合一的核武器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基地。

### (二)596工程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宏大科学研究工程。而最重要的是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和核材料的生产。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及基本结构模型的研究,在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领导下,从1960年4月开始,邓稼先带领十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从最基本的三本书学起,他亲自授课,立题进行研究。凭借四台手摇计算机,一天三班倒,运用特征线方法计算内爆型原子弹的物理过程。共进行了九次,历时一年。终于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又从理论与爆轰试验的结合上,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1963年3月,提交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1962年下半年,二二一基地512车间接受聚焦组件的研制任务。聚焦组件是形状特殊的薄壁零件,形位、尺寸精度要求高,铸造、加工、测量十分复杂和困难。机械二厂宋光洲副厂长组织两个车间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展开联合攻关。511车间经过数十次工艺改进,铸造出合格的毛坯零件。512车间在分厂检查科配合下,对工艺装置、测量工具和方法进行了不断探索,1963年6月,第一个核武器关键部件——聚焦组件在基地研制成功。

201车间,用块装法生产出第一块炸药部件,1962年12月,打响了草原爆轰试验的第一炮。在爆轰试验中,采用陈能宽的坐标一号聚焦元件方案和王淦昌提出的“综合颗粒法”等方法,在爆轰驱动和特态方程的爆轰试验上取得了技术突破,掌握了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

1964年初,北京九所四室科研人员,迁入基地102车间。继续原子弹从中心到惰层裂变材料部件的研究。裂变材料从铀地质勘探、矿石开采、到提纯为60%~90%的化学浓缩物(重铀酸铵或重铀酸钠,俗称黄饼)经过二氧化铀、四氟化铀,

1964年1月,兰州铀浓缩厂分离出武器级的六氟化铀。5月,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从浓缩的六氟化铀,经还原、精炼、铸造、加工出第一套合格的铀-235部件。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提供铀-238半成品,102车间工人像精工雕刻一件艺术品一样,进行精加工。每测量一个数据,工人、检验员、跟班技术人员进行复核。最后一刀加工,需经车间领导同意,并在现场共同完成。中科院原子能所王方定小组,自己动手建工棚,在废弃的手套箱内,经过几个月200多次化学试验,终于研制出中子源材料,102车间生产出点火中子源部件,最后完成了内组件的装配任务。

第二生产部副主任孙维昌精心组织,201车间用四台带有蒸汽夹层的球形底不锈钢药炉,制成悬浮体进行炸药的浇注。1964年3月,通过了主药球的成型工艺定型。202车间工人远距离电视精心操作,生产出合格的炸药部件。在郭永怀副所长和设计部龙文光主任指导下,提前完成了原子弹总体结构设计、力学、环境试验和引爆控制系统设计和试制。实验部科研人员在中子物理和放射性化学大厅,经过上千次安全试验,取得铀-235的临界、次临界实验数据,保证了核装置在加工、装配、运输、贮存过程的临界安全。

6月6日在六厂区610工号,进行了全尺寸爆轰模拟出中子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奠定了基础。

九院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科学、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严格执行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试验的要求。圆满完成原子弹装置的预演产品、备品、正式产品总装联试,产品从221基地启运。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震撼了全世界。

### (三)氢弹计划

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能在瞬时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

1960年,原子能所所长黄祖洽、于敏为正、副组长的“轻核反应装置理论探索组”,开始了热核反



应机理研究。1965年,该小组科研人员调入九院,黄祖洽、于敏任理论部副主任,与理论部邓稼先、周光召正、副主任领导的氢弹原理探索科研人员汇合。理论部决定分兵作战,多路探索,利用中科院计算所119计算机继续探索氢弹途径,13室孙和生主任带领50多人,来到上海中科院华东计算所用J-105计算机,对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进行计算,取得完美结果。即将热核材料加热到高温,压缩到高密度,达到自持聚变反应,瞬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创造自持聚变反应,只能由原子弹来实现。一个新的氢弹理论方案诞生了,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邓稼先主任闻讯赶到上海。与大家通宵达旦地分析计算,组织理论部的技术人员,对方案提出了重要改进。1965年12月在二二一厂,由吴际霖主持,刘西尧、李觉等参加的院1966—1967年科研生产计划会议上,确认于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弹作为“扳机”来引爆“被扳机”氢弹原理方案合理、可行。二机部确定“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中央专委1965年底,批准了核武器研制两年规划。

1966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了二二一厂,鼓舞了221基地和核工业战线广大职工,大家决心赶在法国前爆炸我国第一颗氢弹。

1964年9月,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出合格的氘化锂-6等热核材料。朱光亚、陈能宽、龙文光、张兴铃等科学家经常深入102车间,在一些关键技术上进行决策和指导。热核材料成型组在宋家树和武胜等领导下,坚持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发扬学术民主,采取多路探索,宽容探索中的失败,调动了职工的首创精神。试制出合格的热核材料毛坯。车间各组攻克了机械加工、涂层、物理检验、探伤等技术难关,生产出合格的热核材料部件。

1966年5月9日,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原子弹试验成功,为氢弹理论设计获取了重要依据。12月28日,氢弹原理装置试验获得成功。1967年2月12日,在九院二二一厂召开的科研生产会议上,确定赶在法国前进行氢弹空爆试验。这时,设在西宁市的二二一厂技校少数学生卷入了西宁市



本文作者(左)与张爱萍将军合影

的武斗。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派专机把参加会议的人员接到北京,改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名义召开。经周总理批准,决定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2月理论部基本完成了氢弹的理论设计。设计部技术人员提出加大热核材料和铀材料尺寸的重要改进,使爆炸威力有较大提高。5月29日,毛主席批准二二一厂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6月5日,二二一厂承担研制的氢弹总装、联试完成。聂副总理受周总理委托,亲赴试验场领导这次试验。6月17日,徐克江机组驾驶的轰-六甲飞机,飞到靶心上空,准确打开弹舱抛出弹体,一颗33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爆炸成功。赶在法国前面,使我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也是研制周期最短,花用经费最少的国家。

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中近程“东风二号”导弹核武器“两弹结合”热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 (四)腥风血雨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了“一号令”。二二一基地加快了向三线转移,在转移搬迁中,自备热电厂一号电缆线发生短路爆炸、实验部七厂核心区机密资料“丢失”、二分厂229工号发生炸药件爆炸。即所谓的“三大案件”,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指派

赵启民、赵登程二人来查清案件。这本来是一般的  
 质量安全事故，“二赵”却在干部大会上说：“连续  
 发生的几起案件，是国内外阶级敌人蓄谋已久的  
 有计划的反革命破坏。我们是带着上方宝剑来的，  
 在二二一要大开杀戒，可以先斩后奏，也可以边斩  
 边奏。”在这场捕风捉影的“清队破案”中，不准通  
 信，不准职工探亲，也不准家属来基地探望。留学  
 人员成了特务，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朋友，成了反革  
 命集团。基地80%多的车间、科室以上干部，90%  
 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受到审查和迫害。到1971年  
 9月13日的近两年时间里，四千多名职工受到迫  
 害和审查，骇人听闻的威逼、打骂、折磨、使310多  
 人致伤、致残。40多名职工含恨自尽，5人以莫须  
 有的罪名惨遭枪杀。

### (五) 拨乱反正

1971年，“九一三”林彪阴谋暴露，折戟沉沙。  
 赵启民受到牵连被隔离审查免除一切职务，做了  
 降级处理。赵登程被认定为林彪死党，送上了法  
 庭。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于1972年9月12日—  
 1973年3月10日，1973年11月14日—1974年  
 2月14日，两次在北京召开了九院“批林整风”会  
 议，党委扩大会，对“二赵”进行清算，形成了《北京  
 会议纪要》。1974年1月1日九院一分为二，院迁  
 往四川，基地为二二一厂。

中央派出以梁步庭为组长，赵振清、刘书林为  
 副组长的中央联络组，1974年2月20日进二二  
 一厂。联络组顶住“四人帮”的压力，切断了厂内与  
 外界的“文化大革命”联系，走家串户，“拆墙、填  
 沟、解疙瘩”，让群众组织头头上台讲认识、进行自  
 我批评，为队伍团结奠定了基础。联络组对“二赵”  
 制造的冤假错案一一复查，两个多月就为受迫害  
 职工落实了政策。

二二一厂恢复了工厂的建制。贯彻国防科委  
 二次会议精神，解决了×××批生产中问题，顺利  
 交付部队。其后通过了产品定型，同意批量生产。  
 1975年核武器批生产任务圆满完成，实现了由  
 科研体制向批生产的历史性转变。1975年11月8  
 日，中央联络组在近万人的欢送声中返回北京。

国防科工委和总参先后批准，×××，×××  
 核弹头退役处理。通过近三年对核装置和引控系

统分解、检测、试验，取得二十多项科研成果，为今  
 后核武器贮存提供可靠依据。

### (六) 第二次创业

1984年10月24日，通过了部、省企业整顿  
 验收，被评为一级优秀企业，并宣布实行厂长负责  
 制。厂研制、生产的“×××”核弹头产品荣获国  
 家质量银质奖，“原子弹突破和武器化”、“氢弹突  
 破及武器化”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加大常规武器  
 弹头的开发力度，结合核弹头退役进行常规武器  
 战斗部起爆方式，静爆威力试验。

1986年，厂提出：“主产品创优”的年度工作  
 目标。对核武器生产的全过程，实行规范化、系统  
 化的质量控制。拟定了关键零部件的内控技术  
 指标，层层向下分解，实行质量目标的精细化管理。  
 核装置、引控系统，优质品率分别达到99.7%，  
 98.3%。核装置和引控系统总装联试一次成功。

1985年7月，上级要求二二一厂在短时间研  
 制、生产地中程导弹常规武器战斗部任务。我们  
 冒着结构设计、爆轰试验、无线电引信机短期能否  
 取得技术突破的巨大风险，确立了“安全第一、质  
 量第一、特事特办”的方针。在短短的10个月，在  
 40号文件下达后，在调整收缩造成的极为困难条  
 件下圆满完成了研制、试验、定型、生产交付。1991  
 年又胜利完成了后续批生产交付任务。从1987年  
 40号文件下达到1991年，厂累计实现军品销售  
 收入×亿多元，国家减少拨给厂维持费1亿多元，  
 军品销售利润×千万元。

### (七) 战略调整

中央正确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15年世界大  
 战打不起来。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遇，调整战略武  
 器发展方针，缩短战线，多研制，少生产。作为我国  
 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基地，在完成历史  
 使命后决定撤点销号。

1987年3月，二炮技装部栗副部长受张爱萍  
 委托，来到二二一厂考察。厂里带给中央军委主席  
 邓小平同志一封信。没过多久，栗副部长转告我  
 们，小平同志认真看了你们带去的资料和信，沉思

了一会儿说：“可惜是可惜。15年打不起仗来，就是要压缩，也只能这样办。”听到小平同志也发了话，我们一心一意按中央的部署搞好撤厂工作。8月，蒋心雄部长、李定凡副部长、刘书林顾问、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工委部门领导，来厂宣讲40号文件（国办发[87]40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批转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关于撤销核工业青海二二一厂的请示》）。蒋部长在处以上干部会上说：“由于世界和平和战争观点重大转变，我国国防建设指导方针，从临战时期的国防建设转变为平时时期的国防建设。”“随着国防建设战略方针的转移，我国核武器研制、生产任务布局也要进行调整。撤销二二一厂是中央经过调查研究，长期酝酿，反复论证，慎重作出的正确选择。”蒋部长着重指出：“要坚持边生产，边调整，逐步收缩转移的方针。为调整好做贡献。”

二二一厂撤点销号，是特事特办的国家行为，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撤厂工作经历了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方案与政策的制定、方案的实施三个阶段。中核总公司成立了以李定凡副总经理为组长、刘书林为顾问的调整协调小组。厂、矿成立了科研生产和撤厂工作两条线的领导班子，设立调整工作办公室，下设职工安置、核设施退役处理、基地移交三个领导小组，组建了包括驻厂武警四支队在内的治安联防指挥部，制定了撤厂期间思想政治工作大纲，人、财、物管理规定，经济责任制考评和包、保、核考核办法。撤厂方案历经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大分散模式，扛着旗帜下山建点的“大集中，小分散”安置，成建制的整体移交；最后形成带嫁妆“相对集中，合理分散”的安置模式。经10个省市20多个城市考察，最后确定职工集中安置在廊坊市（联营兴建企业）、淄博市、合肥市、西宁市的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1990年7月，本着职工自愿、工作需要、厂方推荐、与地方协商原则，确定职工安置去向。在中央批准12个部（委）总公司上报的《两个安置办法》后分散安置在全国27个省市532个县市展开，妥善安置近万名职工、离退休人员和家属共3万多人。

## （八）还一片净土

核设施退役处理，采用国际公认的经无害化

处理后，达到不加任何限制的永久性开放的“三级退役标准”。委托核工业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简称核工业中辐院）进行源项调查、方案拟订等工作。制定了国际上最严格的土壤中铀残留极限值和贫铀表面污染控制暂行管理限值。二二一厂负责组织实施。二七九厂、核工业中辐院等单位分片包干施工。核工业中辐院、中兵总204所、青海省环保局环境监测站负责监测。二二一厂运行30多年，厂安全防护处，定期对牲畜、大气、河水和土壤取样分析，没有对环境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厂直接从事放射性材料人员无一人得放射性职业病，也无一人因辐射死亡。每年冬天，厂办牧场宰杀牛羊，分给职工食用，有力证明牛羊是健康的。

高放废物，超过填埋坑掩埋标准的贫化铀、镭226等污染物，装桶水泥固化运往废物处理场，可燃性污染物，在焚烧炉内焚烧，灰烬残留物按限值进行填埋或装桶水泥固化处理。填埋坑经二次勘探、比较，经国家环保总局批准，选定在六厂区656爆轰试验场以西400米处。坑内填埋放射性工号铲下的墙皮，各爆轰试验场表层的土壤，使用过的手套、工作服等低放射性废物共6100多立方米。填埋坑上进行了植被，立有竣工纪念碑，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

核设施退役处理工程，历时5年，投入资金3000万元，1993年6月通过了国家验收，圆满完成了三级退役要求，整个工程质量优良，可交青海省安排利用。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对青海省省长田成平说：“世界核基地退役处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二二一厂。”

经青海省考察论证，并报上级批准，基地移交青海省海北州接收利用。1994年6月15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营二二一厂向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正式签订移交协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化剑为犁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

（王菁珩，从1961年月1月开始在二二一基地工作，历任车间副主任、主任，分厂副厂长，总厂副厂长、厂长。经历了二二一基地的建设和撤消的全过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 罗舜初 口述 罗小明 整理

1966年8月25日至9月2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在国防部南门外围困长达28个昼夜之久,要求国防科委交出曾任该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澄清问题,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发生的一件大事。尽管当时的国防科委党委竭尽全力做工作,试图化解矛盾,避免产生不良后果,但由于中央高层领导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陈伯达先后做出了内容不同的指示,最后国防科委成了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我作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党委副书记,被停职反省。

这一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由于陈伯达、张春桥当时控制了绝对的话语权,他们的说法广为传播。陈伯达津津乐道于他所谓的军令状,在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同学时说:“你们这么多同学要见赵如璋、罗舜初,我觉得他们没有理由不见你们,所以我就去看你们,还没有去,就立了个军令状,要赵如璋去,如同学伤害你,我赔偿你的性命。”张春桥更是公开点名批判我,指责我不听陈伯达的话,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拒不交出赵如璋。由此,不明真相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北航,无情地批斗我和赵如璋。

不管张春桥、陈伯达怎样巧舌如簧,他们所说的当然都不是事实真相。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件经过说出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 (一)

“文化大革命”之前,全国有11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归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直接领导管理,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是其中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北京新市委的委托,国防科委于6月8日派院校局副局长赵如璋等三十多人(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大女儿、国防科委院校局参谋李敏)组成工作组,进驻该院参加“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后增加到六十多人)进驻北航后,有一名同学贴出了一张题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对国防科委的工作和其他一些问题横加指责。许多师生对大字报中的歪曲不实之词深感不满。工作组遂对这张大字报开展了五六天的“反干扰”大辩论。结果多数师生不赞成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只有少数人仍坚持“无头黑线”的观点,处于比较孤立的境地。

工作组(后增加到六十多人)进驻北航后,有一名同学贴出了一张题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对国防科委的工作和其他一些问题横加指责。许多师生对大字报中的歪曲不实之词深感不满。工作组遂对这张大字报开展了五六天的“反干扰”大辩论。结果多数师生不赞成这张大字报的观点,只有少数人仍坚持“无头黑线”的观点,处于比较孤立的境地。

7月28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撤销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就在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秘密接见了北航持少数观点的学生代表,他给学生们打气说:“我看很多工作组不好,贴大字报把事情揭露清,同学们会跟你们跑的。工作组不愿意革命的罢他们的官,犯错误的可以留下检讨,不能让他们溜了,让他们做你们的学生,受教育。”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持少数观点的学生们造反的劲头更足了。

8月11日,已经奉命撤离北航的工作组全体人员,在赵如璋同志的带领下返回北航听取群众意见。8月14日,赵如璋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进行了检讨。他在检讨中说:“当一同学贴出了《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以后,引起了同学之间的争论。本来在运动中大家都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我们的错误在于把这个争论当成了一定时间的主要矛盾,主动地组织了这场大辩论,在万人大会上点了《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是一株大毒草,并指出了它是有意中伤,把矛头指向了军委、中央。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本

来这张大字报是不是大毒草,应当由广大革命群众自己来鉴别,我们不应该事先划定框框,定下调子,不应该组织同学之间、群众之间的大辩论。”赵如璋还说:“这场大辩论的错误,是我们造成的。参与辩论的同学和同志们是没有责任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是无可非议的,他们用心是好的,革命积极性是可贵的。错误的责任全部由我们负责。我们衷心希望革命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互相谅解,加强团结,共同对敌。”赵如璋当着全院师生员工的面郑重宣布:“在这里我们向大会上点过名的同学(指《一条无头黑线》大字报的作者)以及所有由于怀疑工作组和国防科委而受到批评的同学和同志赔礼道歉。凡是我们在大辩论总结时,给个别同学戴上的帽子一律摘除。”

对于赵如璋的这个检讨,多数师生员工感到满意,仍有少数同学感到不满意。针对少数同学提出的意见,赵如璋同志于8月19日第二次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检讨。在这次检讨中,赵如璋重点回顾了组织开展大辩论时的想法和当时对形势的认识,并就同学们对他在北航工作期间工作上和思想作风上的意见做了深刻的检讨。

赵如璋同志检讨之后,我也讲了话。我首先转达了聂荣臻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国防科委主任)对北航全院师生员工的问候,然后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针对派工作组等问题做检讨。我说:“工作组提出先辩论《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又点出它是一株大毒草,是经过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同意的,这是我们的错误。其实这张大字报是不是大毒草,完全应该由广大革命群众自己去辨别,我们根本不应该事先划定框框,定下调子,批准这场辩论。由于这个错误,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给群众运动造成了不良后果。”“由于工作组是国防科委派的,对《一条无头黑线》的辩论又是经过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同意的,工作组所犯的 error 主要由国防科委党委常委负责。”“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方向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对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对工作组还有什么意见,欢迎提出;对国防科委是允许怀疑的,错误欢迎批评,我们对群众的批评是欢迎的!”会后,在全院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和新选出的筹委会

同意的情况下,工作组第二次离开北航。

## (二)

对于赵如璋的两次检讨,仍有一部分人有意见,对有些问题没有解答表示不满。他们后来组成了北航“红旗战斗队”。

8月24日晚8时许,6名“红旗战斗队”队员来到赵如璋同志的住地,要求澄清问题。赵如璋表示同意澄清问题,并根据北京市委8月11日的通知精神,提出了几点建议:(1)可以澄清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希望通过筹委会,有一名筹委会委员参加。(2)参加澄清问题座谈会的同学,人数不要太多,最好七八人,最多不要超过十人。(3)希望同学们先提出需要澄清的问题,容我准备一下。(4)初步定于明天(8月25日)上午9时在军委接待室开座谈会澄清问题,如有会议再另商时间。这6位同学对此没有表示异议。

然而,8月25日上午9时,北航“红旗战斗队”派出的不是10个人,而是100多名队员。他们没去军委“文革”接待室,而是直接来到国防部南门警卫室,公然要求国防科委把赵如璋交给他们处理,声称不交出赵如璋,他们就在国防部门前静坐,直到交出为止。“红旗战斗队”为什么公然违反他们和赵如璋头天晚上已经商定好的关于澄清问题的协议,至今仍然无人披露其中的内幕。就在这个时候,北航“红卫兵”、“赤卫队”等群众组织也闻讯来了100多人,他们坚决不同意赵如璋向“红旗战斗队”单独澄清问题。观点截然对立的两派群众在国防部南门外互相对峙,随时可能发生激烈冲突,形势异常紧张。此时此刻,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难想象,如果国防科委在这个时候同意赵如璋出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百多名学生聚集在国防部大院门口,用高音喇叭喊口号,贴大字报,无休无止地纠缠谩骂正常执行警卫任务的解放军战士,是共和国成立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聂荣臻副主席当天接到报告后,气愤地对秘书说:国防部是什么地方,“北航红旗”怎么可以这样胡来!要告诉国防科委领导人,学生要求赵如璋回学院去澄清问题,可以去,但学生不能在旃坛寺(国防部所在

地)静坐,必须动员他们回学院去。

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闻讯后也打电话向我了解情况,她没有向国防科委提出任何指导性的意见,只是说了句“有情况要随时向林办报告”,就把电话挂了。

接到聂副主席的指示后,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立即派出院校局副局长裴济民等十多名同志组成接待组,并派国防科委党委常委、科委后勤部副部长王力华代表常委去看望双方,劝说两派同学先回学校去,和院筹委会商量同意后,赵如璋和工作组可以再次回校检查。但是,“红旗战斗队”坚决不同意,认为赵如璋再回到学校去,会造成群众斗群众,筹委会、“红卫兵”、“赤卫队”也不同意赵如璋和工作组再回去,认为学院正在进行“一斗二批三改”,如果工作组再回去,又要引起辩论工作组问题,转移了运动大方向,也不利于团结。面对这种情况,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只能不厌其烦地、耐心地向双方做说服工作,设法消除分歧,说服同学们“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但是,要想短时间内做通各派工作,谈何容易。

几天以后,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同志告诉我,毛泽东主席也听说了国防部门口发生的事情。毛主席说:搭起席棚,给他饭吃,给水喝,另开辟一个战场,让他闹几个月。(大意)

长征期间,我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我知道毛主席有时是正话反说,有时却又反话正说。这一回,该如何正确理解毛主席的真实意图呢?经反复考虑,我理解毛主席的意思是要国防科委尽快处理好这个事件。

事实上,从第一天开始,国防科委就为同学们准备了开水、稀饭、馒头。因为“红旗战斗队”人员流动大,一时人多,一时人少,很难掌握他们的确切人数,往往统计的时候人不多,临到开饭时突然增加许多人,供应的食品数量不足是在所难免的,但绝没有发生大热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的现象。至于要不要搭起席棚,我认为在国防部门口影响不好,不搭。重要的还是要尽快妥善解决问题。我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分别看望了“红旗战斗队”以及筹委会、“红卫兵”和“赤卫队”的代表,并和他们反复商量如何澄清问题。同学们坐

在地上,我也席地而坐,有人见状要给我一张报纸垫在下面,被我谢绝了。

我先是试图说服筹委会和“红卫兵”、“赤卫队”,同意赵如璋单独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但是他们坚决不同意,理由是“红旗战斗队”所要澄清的问题,各派间有不同看法,大家都有权了解澄清的过程,并一再坚决表示,“如单独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一切严重后果由国防科委负责”。

于是,我们又提出第二方案:赵如璋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筹委会、“红卫兵”、“赤卫队”只派少数代表参加。经劝说后,筹委会、“红卫兵”、“赤卫队”勉强同意,但“红旗战斗队”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学院其他战斗组织对赵如璋的检讨没意见,用不着他们参加。

接着,我们又提出了第三个方案: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时,筹委会常委参加。没想到除了筹委会同意外,“红旗战斗队”、“红卫兵”、“赤卫队”都不同意。

9月8日,周恩来总理看到中央文革小组报给毛主席的一期简报中对这一事件做了片面的报道,便立即将这期简报批转聂荣臻、我和赵如璋阅,并指示国防科委可以让赵如璋去澄清问题,甚至可以单独澄清问题,首先要说服多数,不要压制少数,澄清问题后双方要开会求得统一。

9月9日晚上,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防科委决定让赵如璋单独和“红旗战斗队”见面澄清问题。因为“红卫兵”和“赤卫队”坚决反对单独澄清问题,并阻拦了赵如璋到会,商量的通宵未果,澄清会没有开成。

9月12日,我和赵如璋与“红旗战斗队”代表见面,商量如何单独澄清问题。“红旗战斗队”方面的人进进出出,不时地向代表递条子、耳语,结果是“红旗战斗队”代表态度多变,刚刚同意了,马上又反悔。谈了整整一个晚上毫无结果。

此后,为了实现单独向“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国防科委一直努力劝说“红卫兵”、“赤卫队”不参加澄清会,他们勉强同意了,但仍坚持筹委会是学院文化革命的领导机构,必须派代表参加。至此,双方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国防科委觉得再做一做双方的工作,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就在国防科委为实现单独澄清问题而费尽



口舌地做说服工作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于9月19日给聂荣臻同志的秘书打电话说,北航有些学生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已经拖了很长时间未能解决。伯达同志最近提议,这样拖下去不好,可以让工作组去听取意见,让少数派学生把意见说完,工作组要认真做自我批评。

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了解情况。他要我把情况详细准备一下,去向张春桥汇报,研究一下究竟如何办好。随后,他又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打电话进行解释,并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劝学生们回校。

9月21日,王力给聂荣臻的秘书打电话,转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对北航问题,不管群众多少,找来了,领导上都要接见,对群众不要顶牛,顶牛最后总是没有好下场的。陈伯达同志下午约聂荣臻商谈北航问题。”

当天下午3时,聂荣臻约我来到钓鱼台陈伯达处开会。陈伯达不容聂荣臻和我解释,就强令国防科委把赵如璋交给“红旗战斗队”。他说:如果学生伤害赵如璋,我来偿命,我可以立下军令状。说罢,他真的拿起笔写了张军令状。等他写完之后,我向他详细汇报了赵如璋8月14日、19日两次检讨的情况以及我19日在北航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做的检讨,介绍了8月25日以来北航两派的意见分歧以及国防科委在这些天所做的工作,并特别说明,早在9月12日我就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和赵如璋一起与“红旗”代表见面商讨如何单独澄清的问题,怎么能说我们不见呢?在事实面前,陈伯达无言以对,只好当着聂荣臻和我的面将写好的军令状撕毁,继续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聂荣臻一再坚持,单独澄清问题的前提是“北航红旗”必须从国防部大院门口撤走,否则影响太坏。陈伯达最后决定,赵如璋和“红旗战斗队”代表当天晚上到全军文革接待站(三座门一号电影厅)单独澄清问题,并由他去劝说“红旗战斗队”离开国防部南门。

当天晚上,陈伯达来到北航“红旗战斗队”围困国防科委的大本营——国防部南门咫尺之间的航模体校。陈伯达公开表示支持“红旗战斗队”的行动,他说:“你们是少数的,少数是优秀的、先进的。”随后,“红旗战斗队”队员们全部转往全军

文革接待站。从8月25日上午到9月21日晚,整整闹腾了28天的国防部南门暂时恢复了平静。

### (三)

在全军文革接待站大门外,闻风而来的北航“红卫兵”和“赤卫队”的同学强烈要求参加澄清会议。国防科委派出工作人员一再劝说同学们回去,并恳切地要求筹委会不要让其他战斗队的同学到会,师生员工们对国防科委突然改变做法很有意见,大有被出卖了的感觉,说了许多带有情绪的话。国防科委工作人员满肚子的委屈只能自己强忍着,无处倾诉。

在接待站里,“红旗战斗队”和国防科委又发生了分歧。我们认为会议应由双方共同主持,“红旗战斗队”坚决不同意,一定要由他们单方面主持,双方争论了两个小时。这时,接到全军文革的指示,同意由“红旗战斗队”主持会议,于是我们照办。

北航“红旗战斗队”取得了会议主持权后,并不和赵如璋同志澄清具体事情,而是拿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一张“赵如璋的书面保证”,硬要赵如璋在保证书上签字。看到“保证书”上有“为单独澄清问题随叫随到”的字样,赵如璋感到有些为难,作为一个军人,不经批准,怎么能轻易保证随叫随到呢?看到赵如璋不签字,“红旗战斗队”便开始对赵如璋百般侮辱和谩骂,说赵如璋出尔反尔,是撒谎大王、大骗子。他们对赵如璋实行车轮战术,整整一个晚上不让赵如璋睡觉。

第二天晚上,赵如璋同志提出可以和同学们“三同”,他们竭力反对,说是大阴谋,又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不让赵如璋休息。9月23日早晨,为了要赵如璋签字,“红旗战斗队”在一个小时内对赵如璋发出了27次严重警告,说赵如璋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等等。这一天的下午1时,“红旗战斗队”宣布限制赵如璋的行动自由,还提出要罢赵如璋的官。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得知情况后,通知国防科委赵如璋可以签字,赵如璋这才在保证书上签了字。这次会前后持续了42个小时,赵如璋得不到一点休息,被搞得筋疲力尽。

第二天(9月24日),聂荣臻同志召开国防科委党委会,研究国防工业高等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方面的问题,特意请赵如璋列席。聂荣臻首先在会上说:“赵如璋同志你受委屈了。”并表示慰问。在研究北航问题时,聂荣臻说:“我怀疑‘红旗’里面有坏人,有‘牛鬼蛇神’,肯定有后台。”

9月27日下午2时半,赵如璋继续和“红旗战斗队”澄清问题。赵如璋要求“红旗战斗队”将需要澄清的问题和疑问都提出来,统一回答。但“红旗战斗队”不允许,只能是他们提出什么问题,赵如璋就正面回答什么问题,而且只能回答“是”或“不是”,不准讲明原因,申诉理由。当赵如璋摆事实、讲道理时,他们就立即停止赵如璋发言,甚至抗议谩骂,说赵如璋是“牛鬼蛇神”,是“大坏蛋”,是“反社会主义”等,并且乘赵如璋不备,一把夺走了赵如璋的笔记本。结果,他们在笔记本中发现了赵如璋记下的聂荣臻的那几句至关重要的话。这下子可不得了啦,怀疑“红旗战斗队”里面有坏人,有后台,不仅“红旗战斗队”要穷追不舍,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非常恼怒。

9月30日,江青通过聂荣臻同志的一位老部下传话,北航问题,国防科委越来越被动,陷得很深,情况正在起变化,是执行错误路线,还是执行正确路线。必须坚决支持少数派。学生要斗赵如璋,就由他们斗,戴什么帽子就是什么帽子,不要怕,运动后期再说。她还说:“科委不要把聂总推到第一线,硬跟错误领导,搞成敌我矛盾就不好了。”

事已至此,一门心思地考虑,如何才能更加有利于澄清问题,如何才能避免北航各派群众间矛盾进一步加剧的国防科委,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场由最高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他们所做的大量工作都被指斥为执行了“错误路线”。

9月30日,国防科委给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北京市委写报告,如实汇报了事件的前后经过,并以赵如璋在北航的两次检讨,和我代表国防科委党委会在北航的检讨,以及赵如璋8月24日关于与“红旗”单独澄清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最后签署的保证书作为报告的附件一并上报。报告提出建议:(1)既然“红旗战斗队”不让国防科

委主持澄清问题的会议,建议由北京市委派人参加并主持。(2)澄清问题的会议要强调摆事实、讲道理,要允许双方充分发表意见,意见不一致可以放一放。我签发了这个报告。

由于这个报告以翔实的材料说出了28昼夜事件的真相,并且提出“要允许双方充分发表意见”,这简直就是在和中央文革小组顶风对着干,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组接到报告后怒不可遏。10月1日晚上,我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就被当时在中央文革工作的一位军队领导同志蛮横地告知,国防科委的报告是错误的,必须收回。张春桥也凑过来气急败坏地指责我:你没有让赵如璋出去,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在那个年代,不听毛主席的话可是弥天的大罪。于是我便和张春桥激烈争辩起来。张春桥说我不听毛主席的话,我回应张春桥,国防科委从来没有接到过毛主席说赵如璋可以单独去向“北航红旗”澄清问题的指示。毛主席究竟说没说过要赵如璋出去单独澄清问题的话?如果说了,为什么要对国防科委故意封锁?如果没有说过,信口捏造毛主席的指示,那又该当何论呢?我和张春桥的争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10月2日),刘志坚给我和赵如璋写了一个便条,内容是:陈伯达给林总送去了一份军令状,请你们阅后立即退还交林办秘书带回。军令状是由陈伯达口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记录在一张纸上的,全文如下:“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落款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在军令状的下角还有一行字:“关锋记录 9月22日晚10点”。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9月21日下午陈伯达与聂荣臻和我谈话时在场的是王力而不是关锋。陈伯达当着聂荣臻和我的面写军令状和撕毁军令状时,关锋并不在现场。到了22日晚上,陈伯达明明知道赵如璋此时此刻已经在全军文革接待站和“北航红旗”见面澄清问题,他为什么还要口授军令状,并让关锋为他记录?这是其一。9月22日晚10点由关锋记录的这份追记的军令状,陈伯达早不拿出,晚不拿出,为什么偏偏要到我和张春桥辩论后的10月2日匆匆送到林彪处,这是其二。(在陈伯达晚年

最后的回忆自述中，对此也没有留下任何说明，这就为后人留下了又一个不解之谜。)陈伯达后来到处吹嘘，是因为他写了“军令状”，国防科委才被迫交出赵如璋的。如果真是这样，“北航红旗”围困国防科委就不是28昼夜，而是29个昼夜了，这样一个大破绽，居然没有被人发现。

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气焰越来越高，他们继续循着“一条无头黑线”的思路，不断往上追。赵如璋不得不向我请示。很多事情“红旗战斗队”根本不信任他这个小小的工作组长能做得主，他该如何答复“红旗战斗队”的追问？在国防科委，院校和文化革命工作分别由其他领导同志分管，我只是后来才介入的，但为了不把祸水引向聂荣臻，为了不让其他领导也遭到围攻，为了不使国防科委的正常工作受到影响，我考虑了一下对赵如璋说，不管学生们问到什么问题，你都回答只请示过我，都是我决定的，一定要保护聂总，保护其他领导同志。这样一来，我自然成了“红旗战斗队”攻击的对象。不久，每个字有一人高的大标语“撤罗舜初的职！罢罗舜初的官！”、“撤赵如璋的职！罢赵如璋的官！”贴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同时，“红旗战斗队”还提出了要国防科委搬到北航去办公的无理要求。

10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研究国防科委问题。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张春桥等一口咬定我对抗毛主席指示，坚决要把我打成“三反分子”，到会的军委副主席们坚决不同意。陈毅说，国防科委为了避免两派群众发生冲突，采取的措施是对的。罗舜初前后6次到学生中去，和学生一起席地而坐，商讨解决办法，怎么能说他拒不接见学生呢？主持会议的林彪此前曾派秘书将中央文革小组的两期简报送我和赵如璋传阅，他的态度和几位老师是一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林彪在这次会上说这个人(指我)过去很好嘛，现在搞得没有办法了，是比较勉强、有很惋惜的意思，根本没有对罗舜初不执行主席指示表示愤慨。林彪不久前刚刚说过“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张春桥则坚持说我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必须罢官。于是，林彪不得不退一步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

“先停职吧，这样主动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其回忆录中说：周恩来随即补充说明，不是罢官，只是停职反省；不是反党，也不是反革命，只是觉悟不高。)当天晚上8点半，在三座门全军文革接待站，刘志坚代表军委宣布了我停职反省的决定。

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国防科委和我成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

就在这天晚上，张春桥接见了福建省赴京学生代表，他对学生们说：“北航的学生要和工作组长赵如璋对话，在国防科委门口等了28天28夜(罗舜初)他不见。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他见学生，他还是不见。后来陈伯达让他住到学校去谈话，说如果学生打死你，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了军令状，他还是不敢去。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我见了罗舜初，和他辩论，我火了，对他说：‘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你也不听！你再不下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争你！’”张春桥的讲话立即传遍了全国各地。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在全国展开。被停职的我和赵如璋来到北京航空学院，在“红旗战斗队”的看管下实行“三同”。每天数以万计的学生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从全国各地涌到北京，来到北航，无情地批斗已经被中央文革小组“首长”点了名的我和赵如璋。面对思想单纯，并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年轻人，我和赵如璋只能忍辱负重，默默地承受着无休无止的羞辱和谩骂。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张春桥、陈伯达当时控制了绝对的话语权，以致时至今日，二十八昼夜事件的真相，已经渐渐地鲜为人知了。但不管张春桥、陈伯达怎样巧舌如簧，我始终认为，我所接触过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中绝大多数都是通情达理的；如果不是有人在背后别有用心地挑动教唆，以我们党多年来在群众运动和革命实践中积累的一整套成功的经验和政策，这个事件完全可以得到妥善圆满的解决。

(作者为国防科委原常务副主任)

(责任编辑 杨继继)



# 两次不准革命的经历

• 高扬

高扬 辽阳人,1909年生。1936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辽东省委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副部长、化工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等职。是中共十二大的人事准备工作十三人小组和中共十三大人事准备七人小组的成员。他敢挑重担,为人正直,敢讲真话,在工作中建树很多。2009年3月29日逝世,享年百岁。现摘发《世纪老人高扬》一书部分内容,以表对这位百岁老人的怀念。

## 第一次不准革命:讲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大跃进”后,全国出现了经济混乱,发生了缺粮恐慌。1959年7月,彭德怀同志根据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意见,毛主席大为震怒。确定彭黄张周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9月末开始,在全党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从9月末到1960年5月,我被中央工业工作部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中央工业部集中了13级以上干部三四十人对我进行三四十次严厉的批判斗争,有时中组部也来人参加。

我为什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8年8月9日。我带领部里十几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到河南禹县、鲁山等地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们动员本县及来自许昌以东各县几千男女青年农民到豫西山区禹县、鲁山据说是铁矿丰富的地区,开矿山,搬运所谓的铁矿石(含铁量多少,甚至是不是铁矿石。谁也说不清)、运煤(不是焦炭)。同时组织农民伐木烧炭,用土砖砌砖窑,或利用旧砖窑,放进煤和铁矿石,以木炭或木材点

火炼钢,等煤燃烧完或者灭火了,把熏得乌黑的所谓铁矿石扒出来就叫做铁。有的叫烧结铁,其实根本没有“烧结”,有的则不过土炉烟熏过的可疑的所谓铁矿石而已。那时河南省委正向中央报捷,并在报纸上宣布日产铁3万吨,叫做“放卫星”。我产生了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意图。我刚到禹县有许昌地委副书记李音相陪,禹县县委书记习文开始对我们热情相待。后来,地委、县委的态度从冷淡到抵触,甚至敌视了。我察觉了,但认为我们没有错,虽不便责备,但我们也不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中间,我给我部写了考察报告,也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王从吾写了报告,因为我是中监委委员,有责任报告我所察觉的各地党委弄虚作假、违背党纪的情况。大概当地的地委、县委也将我对那里大炼钢铁的态度报告了河南省委。接着由电话转来通知,李雪峰命令我率领分布在禹县、鲁山等地的工作组立即返京。不知李雪峰为何严厉批评我们,说我们要犯大错误了。我们集中到许昌,地委书记赵某某对我们盛情接待。我们回到郑州,只由我向省委书记吴芝圃和副书记杨蔚屏等口头汇报豫西大炼钢铁所见所闻,他们态度冷淡,没说一句好话。我们工作组灰溜溜地回到北京。李雪峰批评我犯了给河南省委泼冷水的错误,并说“你不要再下去了”,但他对河南省委的态度也很恼火,说河南省委把中央工作团“驱逐出境”,太无礼了。

1959年四五月间(或三四月),中央曾着手检查“大跃进”中虚夸、违反科学常识的现象。在六七月份,我又奉命带工作团去包头钢铁公司检查工作。此次带的人更多,在包钢听杨维和公司书记陈守中汇报。说到该公司设计和基建中违反科学技术原则,盲目搞科技改革和加快基建速度。杨维是我老战友(曾任冀西专署专员,建国后他转业到冶金部工作,曾被派到苏联某大钢铁企业学习过),

他们及包钢所属的设计院不同意冶金部来人指挥包钢的技术改革。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已经撤走。冶金部来人提出的改革大多是不懂技术的谬见。如包钢从黄河引水工程中，原苏联设计应用直径一米多的钢管（又称铸铁管），我们改用钢筋加固的水泥管埋入地下，管道共8公里长，万一水泥管断裂漏水，会造成高炉的重大事故，那可是祸事呀。还有其他技术改造不合理的问题，我已经记不得了。接着，我去了供给包钢铁矿石的白云鄂博矿山，我是和那时包头市委副书记高锦明一起去看的。那里也改了原设计，把3米厚度的水泥墙里用于加固的钢筋取消，说这是为了节约，而那个大粉碎机能粉碎直径90公分（甚至1米）的大铁矿石，其震动力大得惊人，水泥墙不用钢筋加固是吃不消的。矿石传送机往火车里装矿石，但支撑传送机的水泥柱里用于加固的钢筋也为了节约而取消了，如出现大的震动有引起水泥墙倒塌的危险。这项工程已依照修改方案建成完工了。白云鄂博位于包头以北数百公里，冬季很冷，而新建的职工宿舍过于简陋，没有取暖设备，冬季室温是摄氏零下8度左右。那里工人、技术人员大都是从鞍钢调去的。生活很艰苦，而工资却降低了，大家都有意见。还有包钢设计院领导反映其他草率修改设计的例证。我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在包头和工作组的处长们商量，向部里写了两份专题报告，副部长李立三转送给了中央。这也算是我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

根据上述材料对我共批判了几十次，办公楼里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发言和大字报都是强词夺理，讲的都是些歪道理。有些同志如田哨、宋乐山等特别同情我，到我家来，名为批判我，实为安慰我。

除上述那些以外，还追查了我与彭德怀、周小舟的关系。彭德怀在抗战时期是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驻在太行地区，我见过几次，抗美援朝时期，他从安东过往，我以辽东省政府主席和省委书记的身份，也接送过几次。“大跃进”中，我到长沙，一天去参观历史博物馆，看见许多陪同人员随彭德怀来了，我不想见他受拘束，所以急忙看完就走了。周小舟我只是在高层会议上见过，没有个人接触。那次到长沙，他和周惠（省委第二书记）请我和我部处长黄文等吃一次饭，没有议论“大跃进”问

题。这些经证明属实，才算是不再追查了。我公私分明，下去检查工作，没有送礼之事。查不出问题，就说我是“伪君子”，“小节好，大节不好”。在武汉参观汉阳的归元寺，叫同去的干部抽签（听说毛主席命他的孩子抽签，说以后就不懂得什么叫抽签了），不过抽着玩而已，这就说我迷信。还有一条最严重的，说我和部务委员刘祖春（部秘书长）、薛光军（基建处长）有反党小组活动，根据是我们议论过部主要领导和党中央的某些事。从组织原则说，系自由主义性质，部领导只有我们三人住在一起，接触多，其实没有不正常的关系。我叫我的秘书曹力把小皮箱中过去的手稿拿出给大家审查。其中有我在沈阳市委工作时的感想杂记本，对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作风有未指名的评论，被认为反党的根据。对包头之行，除了把我不赞成乱改设计的意见当做右倾思想批判外，还说我建议关心白云鄂博矿山职工生活，暴露了我知识分子的本性，怕艰苦，是革命思想的动摇。开始批判时，除据实说明真相外，我还引证党章的规定辩驳说，工作中个人的主张、见解，即使不正确也是允许的，不应该随意上纲上线，戴帽子，但是遭到大家更加严厉的斥责。以后我就不再争辩了，我怀着委屈情绪违心地做了一次次的检讨，我认为我没有错误，或者无大错误。在批斗我的八个月中，部的主要领导始终未出面，批斗会全都由一位副部长主持。每次检讨的书面材料都派专人送部的主要领导阅，前四次他都认为不行，对我严之又严。

遭到不实的批斗，而且是许多与我相处甚久，彼此了解的同志对我的无情斗争，我思想不通，心情恶劣，感到愤慨，感到人格受到侮辱。1960年，春天来了，位于复兴门外真武庙的中央工业部办公机关和宿舍大院内繁花似锦。被批斗的间隙，无聊中在院里徘徊，我颇有古人所谓“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的慨叹和伤感，不知自己将来落到什么境地。食宿、散步和参加批斗之余，我总是常常躺在床上木然地呆想，半天不动，一支接一支地吸纸烟。我妻害怕了，大概怕我寻短见吧。其实我虽然愤慨而悲哀，但却从来没有萌生自杀的念头。“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我是知道的，但我也知道司马迁忍腐刑之辱著《史记》的先例。邹鲁风就是这时自杀的。他是我在北京读大学时的同学，法学院“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抗日战争中任冀鲁豫区

某专署专员。当时,他由人民大学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久,因去河南考察,曾写报告不赞成人民公社的某些做法,北京市委要批判他,他想不通,到某公园服毒自杀了。

到了1960年6月或7月,在我做了第五次检讨之后,终于结束了批判,定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副部长职务,下放贵州工厂锻炼。中组部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话,由我部宣布中央决定。部里派人于7月23日送我及妻子、我的小儿子白惠尔、小女儿白丽达和我的外孙女贞达克去贵阳。到贵阳先住到贵阳钢铁厂油炸街招待所,孩子们分别上了小学和中学。几天后,贵州省委组织部通知我到距贵阳90公里的清镇钢厂去上班,任副厂长。清镇钢厂属贵阳钢铁公司。厂址距清镇县城几华里。该厂拟建两座25立方米(另称125立方米)的小高炉。我去时基建队已经炸平一座小山包,开始平整地基,但进展不快。已经到了一部分设备,但不配套,耐火砖到货一部分,品种规格不全。管理机构已经有了几十人,大都是部队营连排级转业干部,厂长蔡福堂,是第一军的团政委。这些人分住在钢厂附近“新农村”的农民家中。叫“新农村”,是因为各家都是建红枫湖水库时搬迁来的,房子是由水库拨款统一盖的。比附近村庄的房子好一些。我与厂办公室主任于某住居民楼二层的里外间。这种楼房极简陋,地板每块木板之间都露半寸宽的缝隙,隔墙也是这样,楼上楼下和同一层的这间那间都声息相通,烧火、做饭全楼烟气笼罩,呛得难以忍受。后来厂的职工宿舍楼盖完了,大家都搬进去,与居民分开了。但是新楼徒有其表,四层楼房没有上下水道,没有电灯,后来通了电,又因为没有变压器,总是灯光闪烁,后就断了电,我作为副厂长,还算能点上极小的煤油灯。楼内老鼠乱窜,环境卫生没法提了。不久,省里宣布清镇钢厂停建,蔡厂长率领一些干部去贵州北部织金等县帮助地方党“整社”,即整顿人民公社,我负责在清镇钢厂留守。留厂干部只剩下几十人,到鞍山等地培训工人回来了,随即又遣散了。我的“守摊”任务是种好厂区的可耕地,保管好到厂的小高炉的设备和耐火砖。散放的耐火砖距我们宿舍约三四里路,我带着留厂的二三十人把砖集中起来,活儿很累。我带头干,青年们来了积极性。那时粮食定量每人每月24斤,扣去1斤节约粮,只

剩23斤,粮里还有沙子和稻壳,又少菜无油,多数人吃不饱,不得已改吃两顿饭。这样子,哪能拼体力呢!耐火砖搬完收藏好了,盖苫防雨。小高炉其实是无用之物,配件不全,质量也差,只是就地用草和苇席盖了一下。这事办完,为了度荒,我又带几十名留守人员乘坐两三辆厂里的苏联造四吨卡车去距厂四五十里外的清镇县属的一个山区村庄住下,上山打橡子(或叫收捡橡子),即东北柞树那种灌木的坚果。收捡了几天,那里村支部书记说山是他们的,那些橡子也是他们的,便把我们打的橡子全给没收了。回头又组织职工在可耕地里种些粮食。还种了土豆。

我在清镇的一年时间里,没有正经事可做,没有知心朋友,精神上极为孤独无聊。没有事情的时候,常到厂区附近不常见人迹的野外散步,溜达得很远很远。碰上野蒜,我们家乡叫香根菜,用小树枝挖一些,回厂洗净。吃饭时蘸我妻带去的酱油吃。散步时看农村食堂,望田野溪水,一片荒凉破败景象。定量供给的饲料被养鸭人偷吃了,鸭子则死光了。国事日非,前途茫茫,心情是不好的。记得当时曾哼出不合韵律的一首小诗:“暗夜望北辰,秋原闻痛哭,狂唱《红旗歌》,心事无人语。”末句不谐今韵,我从不示人。

大约1961年6月份,我被调到贵阳汽车制造厂当副厂长。贵阳汽车制造厂,实际是生产汽缸套、活塞环等的汽车配件厂,位于贵阳西郊马王庙村,全厂职工1300人。设备简陋,管理落后,工人技术水平也较低,产品也是低级合格品。我分工管财务和技术检验。有日常业务,我又想通晓管理。我的习惯是做什么学什么,我就找汽车构造、汽车制造的常识和汽车零部件的检验的书来看,到车间看各种机床的操作,还想学车床操作。

这个汽车制造厂的各车间,按起码要求,实在不像样子,门窗破旧,满室灰尘,没有生产流水线,像是手工作坊。

到汽车制造厂我才和妻儿团聚。我们住到了该厂领导干部共住的简陋的小楼里,住二层的两间小屋,占了楼后平房一间小屋为厨房和餐室。贞达克上了街道办的小学,与厂党委书记的小女孩结伴同行。白惠尔仍住贵阳省立一中,是重点学校,白丽达仍住军区的八一小学,他们星期六可回家。



在贵阳汽车制造厂约一年，这期间同事们对我并不歧视，加上我又安了家，处境比在清钢好一些。这时“大跃进”恶果暴露无遗，全国盲目建设的气氛开始降温。我的情绪好多了。有当时我写的一首感怀七律为证：“照眼繁花烂漫春，行藏心事哪须论，艰难有恨负家国，去往无私眷子孙。北国衣冠传扰攘，南枝鸟鹊梦寒温。闻鸡听雨学书剑，顾兮风云未老身。”此诗中第五句“北国衣冠传扰攘”是指赫鲁晓夫搞乱苏联。第六句“南枝鸟鹊梦寒温”是写我们家庭经历、家属的沉沦之感和我宦海浮沉的荣辱感。随之而来的是即将为我平反的信息。

1961年冬或1962年二三月份，李立三请贵州省副省长吴实照顾我，向他提出了可否考虑将我安排任省副厅长，以免在下边工厂把身体搞垮了。吴实是老红军，抗战时期我们就相识。在一次传达周总理关于中苏关系报告时，他转达了李立三的嘱咐，并在金桥饭店热情地款待我。不久，中央工业部的田峭同志叫娜娜给我写信暗示，不久就要给我平反了。记得那时娜娜还先后寄来北京糕点和从苏联带回的糖果。1962年春节前后，西南局经委主任谭申平来贵阳，到汽车厂看望我，说可以调我到省政府哪个厅当副厅长，作为过渡，使生活得到照顾。我说这个厂人熟事熟，不想做临时性变动了。4月中旬贵州省委组织部通知我携眷回京另行分配工作，接着又通知我先个人回京谈工作分配。我立即匆匆回京，厂里给我买了硬席座，交通厅长亲自送上火车，嘱咐列车长注意照顾这位老同志。到北京站，中组部处长张长庚去接我。

在中组部平安里招待所住约50天左右，等待分配工作。中组部李楚离副部长召集原在中央工业部工作的华北局干部及分配在北京的其他原工业工作部的干部四五十人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他通读了1962年5月28日中央组织部对我的平反决定，并宣布撤销1960年给我的处分。李立三代表原中央工业工作部（那时已撤销，组成中共华



高扬(1909—2009)

北局)部委向我做检讨，赔礼道歉，我表示感谢党给我平反，声明在批斗中对我态度失当的同志，以后我一定会友好相处。这样就算平反了。

在待分配期间，我心情平静，闲中每天早起我走遍了平安里往北的大街小巷。有时转到什刹海。星期天在北京工作的王艺、娜娜和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白拜尔来了，就有半天的快乐。我们还乘坐华北局派来的汽车重游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及其他一些郊区名胜古迹，在长城等景区吃过野餐。7月中旬，中央决定我到化工部任部长。去部报到之后，就回贵阳交代工作和接家属，在那里顺便去了一次遵义，当时只有已经放假的白惠尔与我同行，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回程时顺便看了属化工部领导的全国最大的开阳磷矿，没有看黄果树瀑布，回贵阳请汽车制造厂同事们吃一顿告别饭，随即带上家属于7月22日回到北京，此后再未去过贵州。

## 第二次不准革命：“文革”被定为“三反分子”

我在化工部工作了整整四年，这是我在固定岗位上工作时间较长的一次（只有在中央工业工作部超过四年）。这也是我工作顺利、精神爽朗的时期。当时中央开始执行经济建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几年间全国化学工业出现了正常的发展局面。根据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

形势和中央的指示，前两年我致力于将“大跃进”中建设的小氮肥厂投产、大型氮肥厂提高产量，以满足国家增产粮食对化肥的需求。我记忆较深的是后两年，1965年，提出把化工建设的重点转到抓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这三大合成材料工业的发展和增加物质投入上来。同时努力改变技术干部分布不合理状况，准备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岗位调整，规划加强有机化工，加强内地企业和非部属的地方企业的技术力量。但是，前者还没有取得显著成绩，后者还没有提出调整方案，“文革”就开始了。

1966年7月底，我率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从罗马尼亚出访归来，一下飞机，化工部一位副部长名为迎接，实则是拉我到部里进行批斗。我拒绝立即回部，理由是访罗情况须向中央写书面报告。在玉泉山饭店住了一个星期后到部上班，部机关揭发我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又敲锣打鼓来我家贴大字报。在楼门口揪斗我，还叫我小儿子白惠尔和小女儿白丽达也站凳子上陪斗，街道居委会召集居民，甚至连幼儿园孩子们都来参加批斗。我妻吓得不知所措。急忙叫王艺打电话给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反映情况，那秘书冷冷地简单回答说：“知道啦。”8月13日国家经委宣布我停职审查。当天晚上，部机关冒雨召开干部大会，揪我与苏继光（政治部副主任）、江浩然（科研局局长）上台示众和进行揭发批斗。随后几天又押着我们在办公楼各层楼道中敲锣打鼓游斗。在北京化工学院召开的由北京部属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参加的万人大会，从8月23日至25日连续斗了我三天。在会上我每天“坐喷气式飞机”六个小时，脖子上挂了用铁丝坠着砖头涂写着“黑帮分子”、“走资派”的沉重的板牌，以致大会后坐骨神经痛了许久，行走困难，请房山张大夫用艾灸治疗才得以减轻症状，但右腿下肢麻木，多年不愈。第一天批斗后，拉到与会群众中示众，遭到中学生的拳打脚踢，跌倒了好几次。晚间与我一同被斗的张珍（副部长）、张亮（副部长）、苏继光和江浩然等被监禁在学院教学楼底层一个大房间中，睡在地板上，并受到学院学生的毒打，张珍被打得最重。

化工部常务副部长梁某某在我们被揭发和残酷批斗中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但他在1966年9月7日也被中央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部分

机关群众又揪斗了梁某某和与他站到一起的两位副部长。后来，中央派徐今强来任代理部长。化工部机关人员分成了两派，部机关大乱，中央又决定实行军管。

批斗我，说我犯了什么错误呢？主要是（一）大字报揭发我反毛泽东思想。原来我对部的一份上报文件稿删掉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字样，因为它多次用这句话，我删掉了其中多余的，并且说明了理由。还有我批阅天津化工研究院的报告，不赞成他们星期天也命令工作人员一律学“毛选”，并认为不宜硬性规定学习者都得写学习心得。（二）在我办公桌抽屉中找到了我为某单位题词试笔时，用墨笔写了“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昆曲《牡丹亭》中的曲词）和“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的七律诗（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有人贴大字报，说这是我作诗发泄对党的不满，心理阴暗。（三）张某某通过私人关系，从华北局档案中抄来我上述杂记本的部分文字用大字报公布了，于是有人说我对党仇恨。是漏网大右派。（四）说我是邓小平黑帮成员。（五）怀疑我是叛徒，把我拉到化工研究院，诡秘地审问一次，后来查明我从来未被捕过。徐今强来部主持工作，造反派把我当成“死老虎”，批斗和大字报逐渐减少。后来康世恩来主持化工部（叫石油化工部）工作，给我办过所谓小型学习班，即批斗一个多月，但那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1969年秋，在我参加基建总局学习活动时，局领导动员我报名去河南太康化工部“五七干校”。按中央文件，老弱病残是不下放“五七干校”的，我当时左腿下肢病和肺病未好，拒绝报名，但他们就在广播中指名下放。我在太康干校食堂管理饭票菜票和吃饭时在窗口卖饭菜；后来则调去看粮食仓库。不下田，工作算是轻松的。其间，我的两个女儿娜娜和丽达曾先后来探视我。娜娜从明港干校来，丽达从北京来。我们父女在困苦中相见的欣喜与离别的悲伤，至今记忆犹新。与我接触的队员彼此相处还可以。但党籍未恢复，看别人参加支部活动，心中不快（林彪叛逃事件是娜娜来信暗示方得知的）。到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整人”气氛才松动了些。

太康县是夏朝国君太康活动的地区，但夏遗迹已经渺不可寻。我们干校所在的地方农场工人

异常贫困。才到干校时,他们欢迎我们,已经9月下旬,十多岁的孩子们都是赤身露体。工人住在用秫秸盖的土房中,有木床,无蚊帐,无箱子,也无桌子,三餐是在室外蹲着吃,不过吃几块红薯和咸菜而已。中秋节日,我们住的马棚隔壁(用秫秸隔开的)十几个男女工人喝着酒,说笑叫喊,一个人说的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他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喝凉水。”大概这就是那里人节日的心声吧?!

我在干校读完三卷《资本论》,我先是同炊事班的人住马棚的隔壁,没有桌子;后来住进新盖的平房,四个人住一间,也没有桌子。看仓库不忙,但那是什么样的仓库呀,几间高大的仓房,堆满成袋小麦,得关上仓门,否则成群麻雀会涌进来啄麦粒,我常看见麻雀从窗上小洞飞进来,我一轰,它们从一两丈远的地方飞起,准确地、笔直地从窗洞飞出去,使我惊异这小动物身体构造的神妙。这里光线暗,也不能读书,我想不起来在那种生活条件下,我是怎么读完那三卷大书的。

1971年秋,周总理下令,在各“五七干校”的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一律回京,于是我也就回家了。那时候“四人帮”飞扬跋扈,但对我这类斗争对象却又顾不上“辖治”,所以我觉得宽松了。有暇读书,也有暇锻炼身体,早晨散步,从和平街北口我家顺北三环东路往西或往东走,常常走过牛王庙,有时走到农展馆,甚至东直门,用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也还偶有旧友来访,如关山复、李正亭、刘毅、刘祖春、胡开明、杜者衡、王铮、魏震五等。记忆犹新的是1974年春季,关山复、李正亭、魏震五和我(有娜娜相伴)到李正亭家集合,一块坐公共汽车去游卧佛寺,在樱桃沟小溪的源头处坐在溪中大石头上喝酒、野餐。那时樱桃沟是清静的,有四五个男女青年走来,看见我们那样子,说“这几个老头还挺‘暇逸’”,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是苦中作乐呢!

“文革”后期石化部(1975年1月至1978年3月由石油部和化工部合并为石化部)主要领导,明知没有查出我反党或其他错误,可就是不予“解放”。1976年10月“文革”已经结束,“解放”像我这样的人客观条件逐渐成熟。1977年冬,中组部派张长庚处长到我家说,中央想不等待给我做政治结论,就先分配我去吉林任省革委会副主任,问

我愿不愿意去。我说我已经是接近70岁的人了,来日无多,能为党再做点事也足以自慰。石化部政治部接到通知,派人给我送来党的关系介绍信,按固定格式,写为“高扬同志系中共正式党员”。看后我说:“什么时候你们给我恢复的党籍,我还不知道,此信你拿回去吧,省得将来再搞‘文革’,说我是混进党内来的。”第二天,刘子廉(那时已任部政治部副主任)到我家做些解释,我收了党的介绍信,于12月7日王艺送我和妻子乘火车去了长春。

1979年春。调我回北京组建新的农垦部。化工部(1978年3月5日石油化工又分成两个部了)部长孙敬文得知我的新任命后,给我打长途电话说,化工部已经给我做了“文革”审查的书面结论,想在电话中把结论稿念一念,我如同意,他们就上报中央了。我说:“这事等我回北京再说吧。”

我于4月中旬在农垦部正式上班。一天,孙敬文带着主持对我进行多年审查的龚镇来找我,拿出极简短的审查结论稿给我看。我说,我不要求像过去那样开万人大会来给我平反,但审查结论应该写明原来批判的根据是几条,又根据什么来逐条否定,像现在这样写,我不能签字。孙敬文很尴尬。结论改了两次,我都不同意,拖了好几个月。一天,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约我谈话,我估计是为给我做结论的事。果然,一见面,宋任穷就说起这件事。我说签字很简单,我书记、部长都做两年了,等于中央早给我做结论了。我就不满意有些爱“整人”的人,“整人”时把“定罪”的材料看得那么重,而平反时却又逃避责任,想轻描淡写,糊涂了事。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整”我的负责人的热衷夺权和怕失权的恶念,及他们使用的卑鄙伎俩,然后说,我向党控诉完毕了,不管结论怎么写,我不看都可以签字。“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引自《尚书·胤征》)。我不算“文革”灾难的“大苦主”,可总也算经受了—次大考验。考验的结果:一是证明我没有犯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错误;二是我没有抛弃革命信念;三是我没有真正承认过错误,应付批斗的假话则说了不少。这有交代历史的文字(存于档案中)可以为证。

(本文摘自《世纪老人高扬》一书)

(责任编辑 杨继伟)





愁于如何辩解,不卑不亢。那年初,中央2号文件,曾转载我部运动情况,居然说我检讨的很好,其实我尚未及开口。幸得胡耀邦同志主持大局,“清除”戛然而止。其后“整党”,我创作室书记对我说了声对不起。我这位密友在名位上一向患得失,终至癌结而终。

我不学乏术,缺乏理论,但对“人”字号越发想研究研究了。“人道主义”一词想系外来。Humanism这一字查遍英汉、汉英字典,既作人道主义,亦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何以一词三用,曾请教于翻译大师罗念生及杨宪益,均未得释。去岁又求教许渊冲教授,复信说:“谈到 Humanism 问题,哲学家译人本主义,社会科学家译人道主义,文学家译人文主义,因人而异。”此说甚精辟,惟仍未释三译渊源。我一知音青年学者张冠生助我搜寻不少资料,尤其是董乐山译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董乐山是我好友老友,“右派”老党员,我却未能在他生前请教。他也在对英语以及所有拉丁语系类似的 Humanism 追根溯源,笔下仍踌躇。董的译序写于1991年,后在1998年董又有新发现,著文题为《人文主义译名溯源》,录先贤吴宓语:“Humanism 宓初译曰人本主义。译为人文主义,皆胡先骕君造定之译文,而众从之者也。Humanitarianism 译为人道主义,则众之所同。”

董又顺带提到:“译为人文学科不知是否借用《易经》中的一句话:‘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所谓人文,用现代汉语解释,却是指礼教文化,在字面上与 Humanism 甚为吻合,但从内涵来讲,就难说了。”还有学者李之鼎在另文中指出林语堂较早提出“中国的人文主义”,“可能与专制人道主义搅在一起,是非莫辨”。

尊“人”之说,古今中外,谁说的早,说的透,无须争辩。我觉得 Humanism 的一语三解更显得其意义之宽广,或更可一语一蔽之,曰“以人为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我在故我思”还是“我思故我在”为两难辩证(Dilemma),或将延伸永世,但唯人主义想来是一种极高明的主义。

我原无能力无学问进行这样的学术论辩,原只想就我所思所感对“人”字号再作一次发言。已经够啰嗦了,但还想引经据典。

季羨林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谁要提‘人性’就是‘人性论’,而‘人性论’就是‘修正主义’,离反革命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1993. 8. 22)真是谈“人”色变啊!

马克思曰:“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巴金在他的《随想录》中写道:“人兽转化的道路必须堵死!十年‘文革’的血腥的回忆也应该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了。”(卷五《人道主义》篇)

但历年常有不欲使人清醒的权威人氏常想禁提“文革”及其他血腥的回忆。何等的血腥?!我不能忘记老舍、海默、吴晗、马连良、周信芳、言慧珠、冯喆、上官云珠等等等等被迫害致死;列举的还是少数文艺精英,各行各业又有多少冤魂屈鬼!众所周知的领导人物、邓、陶……直言抗权的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武斗文斗中的伤亡,就无须多说了,实在是古云罄竹难书。尤不堪回忆的,当时小报广刊的照片,瞿秋白的白骨横陈,逼他的妻子杨之华望着认罪!这是我党一代领袖啊!如认为这种“鞭尸”是泄愤,如今是什么愤?谁的愤?当鞭谁之尸?

近读张显扬著《趋势与选择——对历史唯物论的解读与批评》,杨继绳著《〈起点〉、〈转折〉序——站在新的三十年的门口》,实令人振奋,感到那一句还是顶一句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又不免想起自己提到的“唯人主义”。最近翻阅旧籍,得见王若水,曾遭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者大褒又大贬的大学者,在1995年国庆46周年的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结束语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实践的唯人主义”,最后又简作“唯人主义”,并称为这就是德、英文中的 Humanism。我豁然开朗:“唯人”才是马克思的真谛所在,“加秦始皇”云云是最最最的修正主义!!

能不呼唤人性归来?现在常说“现代化、现代人”,我认为:在人类未消灭战争之前,还是史前时代,还是兽性时期;只有世上消灭战争之日,才可称现代、现代人。世上最大的罪犯,是战争罪犯,是恐怖分子,是真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

关于中国的事,欣见近日思想论坛活跃,高见层出。我是十分赞同建树有中国特色的唯人主义的民主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才是正途,一语以蔽之“以人为本”。

社会和谐,人类和谐,自然和谐。有望!人还是值得活下去的。

2007年7月7日初稿。

2009年9月30日定稿。

(作者为著名戏剧家)

(责任编辑 致中)

# 共产党员雇工问题的三次讨论

● 张厚义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怎样认识和对待共产党员的雇工问题,有过三次讨论。回顾和总结这三次讨论,对于我们党进一步巩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巩固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第一次讨论

第一次讨论是围绕富农党员问题展开的。东北大部分农村于1948年完成土改,到1949年底,农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上升。其中,有上升户添车买马雇长工,买进或租进土地;同时,也有些农户因缺少劳动力或疾病灾害,生活水平下降,有的出卖或出租土地,或借粮借款当帮工。有些共产党员开始雇工。许多党员不了解是否允许雇工,特别是否允许党员雇工;有些党员听了党员不应剥削的党课后,出卖牲口,解雇长工。有些乡村干部不让上升户买马买车添独犁,怕他们单干;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强迫农民参加互助组。不少区县干部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农村究竟应是什么样子?等等。

面对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东北局于1949年12月召开有省市书记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就如何对待新富农,特别是如何对待成为富农的党员或富农入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人认为,共产党员不能有剥削行为,而必须走互助合作、共同致富的道路。也有人认为,既然国家政策允许富农存在,也应当允许新富农中的党员存在,党内党外的政策应当是一致的,否则,党外的农民看到不让党员致富,就会害怕,就会影响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会议讨论的结果,最后以东北局名义做出决定,对共产党员和

普通农民应区别对待,共产党员不允许有剥削行为,要带头走集体致富之路。对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情节严重的,要开除党籍。

座谈会后,东北局就有关对富农党员的处理意见,写报告向中央请示。刘少奇于1950年1月23日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并于当晚与安子文等人谈了他对东北农村出现新富农等问题的意见(1949年秋,刘访苏归来,途经哈尔滨时,曾对东北农村的新情况做过调查了解)。

中央组织部复信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据安子文整理的刘少奇谈话记录,大意是: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这种中农应该得到大量的发展。今天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中农就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生产,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要让他发展。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出,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认为



(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薄一波回忆:“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同志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重要借口。”

这次讨论,显然没有展开。这次讨论,在提法上是否允许党员雇工,富农入党,但是,其要害是不是立即采取实际步骤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趁热打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个直接关系到是坚持还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理论的重大问题,中央高层没有坐下来认真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而由毛泽东“不满形于颜色”,就草率地结束了这次讨论,为以后的党内“一言堂”埋下了隐患。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过程中的第二次讨论

1982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谈农业、农村问题。拟议中的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具体建议的第(4)项为“允许私人办企业雇工经营”。在提请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如何对待党员雇工问题。经过讨论,意见未能取得一致,不好做结论。大家同意,看不清的问题,可以放下再看一个时期,搞清楚再处理,这也是一种政策。会后请示邓小平,他说:“不急于限制,看3年再说。”

另据《陈云传》记载:会后,万里将送审稿送邓小平、陈云。陈云审阅后认为“很好,同意发出”。同时,对农村雇工问题提了两点意见:“一、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两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二、对党员雇工要慎重。党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中纪委也有个意见准备报告书记处。因此,这个文件是否不作规定,由书记处再讨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充分讨论。小平同志在八大党章报告上讲:‘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现在形势虽然比那时有很大发展,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还应当坚持。看这个问题的利弊,不仅要从现在

看,而且要从若干年后来看。”当天,他就这一问题致信邓小平。邓看后,批示:“请书记处再议,文件晚几天发也可以。”

198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关于农村雇工问题,中央“已有原则规定,应继续依照执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办理登记发证工作,加强管理。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

这样,怎样认识和对待共产党员雇工的问题,就成了这个阶段私营经济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1984年初,由笔者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雇工经营研究课题组,也把共产党员雇工问题作为一个专题。经过调查研究,可以看出当年共产党员雇工的一些特点:

1. 现任或原任干部职务(主要是大队书记、大队长等大队干部和社队企业负责人)的党员多。他们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领导经验,社会关系广泛,在取得贷款、原材料和寻找销路等方面,有诸多优势。
2. 承包社队企业的类型居多(以后逐步成为“转制型”私营企业,“近水楼台先得月”。
3. 从事工商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盈利较高的行业多。
4. 从他们入党的时间看,多数是先入党后办企业,其中多半是“文革”前入党的。少数是先办企业后入党,有的是被动员加入党组织的。

那么,广大群众的反映如何呢?“目前,群众对多数党员雇主没什么恶感”。但引起群众不满的情况也有:一是利用职权,假公济私,群众称之为“小官僚资本”;二是收入过高,群众称他们的



无锡民营企业座谈会

钱来路不正；三是凭借职权入“干股”，不劳而获。

198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纪委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的说明时，就《规定》中提出的共产党员不准雇工剥削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从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看，雇工有多种情况，十分复杂，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对党员雇工问题做出合理的规定。

2月28日，邓小平同薄一波谈话，就上述党员雇工问题提出两点意见：（一）农村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将来经济发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个命令就可以收回来。（二）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究是要搞社会主义的。

10月22日，在中顾委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看一看，不要动”，指出：“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针对雇工经营户规模扩大的情况，1984年11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目前，有的雇工达20人，有些同志就着急了。我说，不用着急，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必改变现行的政策，过几年再说。”

经过全国上下的调查研究，中央领导逐步形成了对私营经济的基本政策。1985年2月12日，赵紫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对个体经济和私人企业，中国基本上不采取再搞一次国有化的政策。私人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它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将来对它不需要采取国有化政策。有一些私人企业，不会改变我们国家性质。

11月24日，邓小平同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谈到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中有三种情况：（一）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二）带头个人致富；（三）依仗特权谋私致富，其中有的是雇工经营者，得到上边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资源、大量贷款。对此，邓小平指出：对第三种，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贷款也应有区别政策。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这几年所采取的各项办法是对头的，是为了保护前两种发展，如果不保护就会乱，

这必须认真注意。但对后一种要管一下，是管一下的时候了。不能说总的形势不好，如果不采取这一套政策办法，试问农村出路何在？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

12月20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杜润生在报告中说，目前农村中出现了很多雇工现象，一般是请帮工和助手，典型的雇佣劳动性质的很少。有些“大户”是人为垒起来的，以牺牲公众的发展机会为前提；支持大户的方式，并不是党的政策，也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更不能作为考察经济发展趋势的事实依据。现在农村党员富裕起来的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带领群众致富；一种是自己勤劳致富；第三种靠以权谋私致富。对前两种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和鼓励；对后一种人主要通过税收来加以限制，对个别目无法纪的要加以制裁。

根据以上讨论，形成了1986年中央1号文件。文件提出：“要鼓励各类专业户勤劳致富，但不可人为地‘垒大户’”，强调“农村整党正根据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通知逐步展开。在整党中，对于积极带领群众一道致富的党员，要予以表扬；对于个人勤劳致富的党员，要予以保护；对于少数以权谋私，采取不法手段牟取暴利的党员干部，要分别情况，严肃处理”。

那么，如何认识和对待共产党员的雇工问题呢？经过广泛调查和深入讨论、研究，1986年5月8日，赵紫阳在听取了关于农村整党情况汇报后，就农村党员雇工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说：农村中的党员雇工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要在本次农村整党期间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现在对农村雇工问题的认识，各方面争议很大。因此，要实践、试验，要研究、讨论，不可能马上拿出办法来。如果在这次整党中就对有雇工问题的党员不予登记，势必会引起大的震动。所以，这次农村整党不再涉及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员雇工问题。这次农村整党的指示、文件，要避开雇工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现在还说不清楚；同时，这个问题并不是广大群众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看主要有两条：第一，

一定要保护和发挥农民企业家的作用,这一批人是很可贵的。第二,我们完全可以采取经济的、法律的形式,对私人经济中消极的东西加以限制。现在,要同时做两件事:一是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探讨,百家争鸣;二是开始进行试点。这个问题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在实践中进行试验、创造、发现,才能搞清楚。当然,这中间有一定风险,但是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大的突破。即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现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要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如何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闯出一条新路来。这样做,很有可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道路。

1987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5号文件,指出:“个体经营者为了补充自己劳力的不足,按照规定,可以雇请一二个帮手,有技术的可以带三五个学徒。对于某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文件还说:“共产党员要带头兴办集体企业,积极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当时,正面临思想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中央领导人事变更的新情况,尽管中央政治局年初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是,农村不搞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但是,各地在宣传、落实中央5号文件,特别是私人企业政策部分,仍然产生了一些误解,引起创业者的思想波动。为此,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组成的试验区工作班子,于3月初编写了《关于私人企业政策的宣传提纲》,供各地作内部参考。

《宣传提纲》最后一部分是“防止重犯历史错误”,指出:“文件规定党员要带头兴办集体企业,绝不是指兴办吃大锅饭的那种集体企业。”“各地情况不同,党员带头兴办的企业类型,不必过于一致。对于已经办了私人企业的党员,中央文件



温州私营企业的工人们

没有讲反对,更没有讲不准。严禁以任何方式整这些党员,以防止在农民中引起不良的反应。”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等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1988年4月,全国人大以通过修改宪法的形式,进一步确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合法权益及合法发展。根据《宪法》

规定,6月,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从此,私营经济在国家法律保护和规定的范围内得到发展。

1978年后的10年,是政治环境极为宽松、学术气氛极为活跃的岁月,至今令人向往、留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引下,党内外畅所欲言,据理力争,各种意见都能心平气和地充分表达,最后都能心悦诚服地服从于实践,统一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极其谨慎地认识和对待如此繁难的共产党员雇工问题,制定了私营经济的政策、法律,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后的第三次讨论

从1988年下半年起,经济环境明显由宽松变为偏紧。1989年《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辞”里写道:“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尽管政府开始治理整顿,过热的经济开始降温,但是由此造成的社会心态失衡并没有很快地消退。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社



会环境也陡然变化。在宣传舆论方面,讲私营经济的“弊”多了,讲“利”则少了。报纸上有文章说,“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都是靠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得来的”;“发展私营经济就是搞私有化”;“私营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基础”;“私营企业主是制造动乱的中产阶级”,等等。

1989年8月28日,中央发出通知,其中专门就共产党员雇工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强调在政治方向上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指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已经是党员的私营企业主,除应模范地遵守国家政策法规,严格履行党员义务,尊重工人的合法权益外,“在企业的收入分配方面,领取作为经营管理者应得的收入,而把企业税后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生产发展基金,增加社会财富,发展公共事业”;“做不到这些的,不能再当党员”。

几乎在同时,国家税务局下发通知,要求个体工商户在20天内自查并如实报告,各地工商和税务干部要全面出击清查,重点是个体大户、承包户和个体经营中的重点行业。于是,一个全国性的打击偷税漏税行动开始了。

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农村,工作队员和乡镇干部公开宣传:集体经济是“苗”,个体私营经济是“草”,杂草不除,苗就长不起来;“苏联解体的教训,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搞多了。我们就是要把他们整得倾家荡产,干不下去”。有的党委负责人给党员企业主提出“要党还是要厂”的两难选择。特别是在税收大检查中,一些地方出现了过激行为,错抓了代表人物,群众称他们是“上半年戴花,下半年戴枷”。

1989年9月25日,“傻子”年广九再次被逮捕。“傻子”等私营经济界的代表人物,像山顶上的“消息树”:“傻子不倒,我们就平安;傻子挨打,我们就收摊。”这种情况,给创业者们造成了“再来一次”的错觉,他们本来就疑虑重重,如今则成了惊弓之鸟。为了不被打入“另册”,戴高帽,被批斗,他们忍痛割爱。于是,私营经济取得合法地位后,第一次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新情况。如将自己创办的企业无偿奉送给集体,戴上“红帽子”;有

意歇业或停业;用高价买外国护照;“八下七不上”(用减少雇工人数来改变企业性质),等等。

1991年7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本地情况贯彻执行。通知指出,“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和发展”;工商联的主要工作对象是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工商联的领导,支持工商联的工作,“在工作中要注意掌握政策,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地类比和等同,更不是要像50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商联要对他们进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通过工作,在他们中逐渐培养起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分子”。这份重要文件,告诉我们,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和过去的工商业者没有任何的渊源和继承关系。因此,对他们采取“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八字方针,从而终止了实行多年的“团结、教育、改造”的六字政策。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将我国改革开放和私营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私营经济走出徘徊,发展速度加快。1993年同1997年比较,私营企业的户数由23.8万户增长到96.1万户,增长了3倍多;从业人员从372.6万人增加到1349.3万人,增长了2.6倍。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代表人士登上了社会政治舞台。1993年春天的“两会”,他们之中就有全国人大代表8人,政协委员23人。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所占比重逐年提高。据中央统战部主持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1993年占13.1%,1995年占17.1%,1997年占19.8%。争论的主题由姓“社”姓“资”,转向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和共产党员雇工问题。

争论双方旗帜鲜明。绝大多数人遵守内部讨论的纪律,同时也不便评论中央的决定。他们观点鲜明,基本一致,大意是:要促进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必须解决两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一个是私有财产必须得到国家法律保护,有“恒产”则

有“恒心”；二是私营企业主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中国公民，在政治上应该一视同仁，取消“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的规定。1996年春节后，胡绳约我们几个人座谈，他说，不能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如果那样，农村人民公社姓什么？家庭出身和党的性质没有必然联系，彭湃就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者之一。

在北京，也有少数人坚决反对上述见解。1995年到1997年初，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的几份“万言书”，主要论点是：“私营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否定少数人见解后，第一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明确了私营经济的重要经济地位。此后的争论，重点转入共产党员雇工问题。直到2001年上半年，北京的两家代表性刊物还连篇累牍地发表《工人阶级政党岂能吸收资本家？》、《绝不能把私营企业主拉进中国共产党》、《共产党要驾驭资产阶级》等等。

为了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建设的经验，江泽民于2001年7月1日发表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讲话第一次提出判断一个人政治上先进与否，不能把有无财产和有多少财产作为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

讲话再次明确了党的性质和党员的社会成分的关系。指出党的性质的决定因素，是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和行动路线，而不能单纯地根据党员的社会成分来判断。

讲话再次强调，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这篇吸纳最新研究成果的讲话，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7月下旬，中央统战部召开学习讲话座谈会。大多数与会者是来自各地的代表人士。当会议进入自由发言阶段，会场气氛进入高潮，话筒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他们群情激昂，扬眉吐气，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对于“七一讲话”，少数人坚决反对。7月20日，邓力群等17人发表公开信，坦言：“我们认为，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建党学说、共产党基本性质，严重违反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还有公开信说，这是“引狼入室”，是中共建党80年来“带有方向性的转折”。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如期召开。大会接受了“七一讲话”关于党的建设论述，并且将党章做了相应的修改。新的总书记胡锦涛说，十六大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新阶段的“政治宣言”、“行动指南”和“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2007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即私营企业投资者）为1396.5万人，他们拥有注册资金总额93873.1亿元，雇用工人5856.6万人，经营着551.3万家各类企业。也正是这一年年底，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所占比重为33.5%，其中87.7%是2001年以前入党的。这些都表明，共产党员雇工问题从政策上解决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得到明确，他们将在新时期新阶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与实践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继）

#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 • 帅好

先引数据：

1959、1960、1961 三年的时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 2 079 吨，其中出口 139.86 吨（《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 63、70 页），1 939 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 2 260 万斤，其中高粱 1 085 万斤，小麦 1 175 万斤。换算合计 1.13 万吨。（《仁怀县志》，第 553 页）

众所周知，这三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 1 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 “灾荒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 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 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 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 2 倍以上 4 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 4 倍以上 8 倍以下罚金”。（《贵州省志·粮食志》，第 55 页）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周梦

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第 75-76 页）

仁怀学者徐文仲告诉我：茅台民间有个谚语叫“端午踩曲，重阳下沙”，这个谚语，把酿酒的过程说清楚了。曲，以麦子为原料的菌母，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下沙，过去都是从重阳节这一天开始，以后分期提取与麦曲混匀后酿酒。故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 年后的几年，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 三年期间，仁怀大事记

当地文件记载——

截至 1959 年 7 月 16 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 8 384 名，其中浮肿 5 335 人，占总人口 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 9% 和 9.8%。（《大事记》第 148 页）

8 月 4 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参见《大事记》第 149 页）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

10 月 17 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 月 1 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 11 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



而死亡。(《县志》第49页)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参见《大事记》第159页,《县志》第49—50页)

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

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莽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参见《大事记》第173—174页)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参见《大事记》第178页)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

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口粮三个标准:每人每天8.1两、8.3两、8.4两。(16两制)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疖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以上1961年数据,参见《大事记》第179—185页,《县志》第50—51页)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 仁怀的粮食都到哪里了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参见《县志》第564、565页)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59、1960、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参见《县志》第579页)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

到 2 242 万斤 ;此外 ,该县各种饲料用粮 271 万斤 ,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 :企事业单位运输用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 ,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好禽畜 ,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 ,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 :拉车的运输马 ,每头每日为 5 斤 ;驮物资的马每日 4 斤 ;牛每日 3 斤 ;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 1 斤 ,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 ;鸡鸭每日每只 2 两。奶牛每头 5 斤。另外 ,1960、1961 年 ,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 ,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参见《县志》第 554—555 页、291 页)

到此 ,我不用再感慨“难以置信” ,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待遇 ,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

## 全省各地支援粮食 ,生产茅台

1960 年 ,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 ,厂领导向上级呼吁 ,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区县调粮数据为 :

遵义 11 万斤、毕节 29 万斤、铜仁 10 万斤、黔东南 12 万斤、贵阳 7 万斤、湄潭 1 万斤、习水 10 万斤、铜梓 10 万斤、正安 1 万斤、赤水 4 万斤、务川 1 万斤、息烽 1 万斤、仁怀 20 万斤 ,共计 117 万斤。

这样还不够 ,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 70 万斤 ,才保证当年生产出 912 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记录 ,直到 1975 年才被超过。(参见《县志》第 552—553 页)

从上述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 :

被紧急调粮 10 万斤的贵州铜仁 ,1960 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 年再度成为全国 15 个旱区之一。其中 ,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 5.1 万人(含外逃)。而且 ,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 ,均在 1959 年的 12 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参见思南县委编《思南 600 年大事集》1961 年条款 ,《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版 ,第

418 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 ,1959 年 11 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 ,到 1960 年 4 月共死亡 12.2 万人 ,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 20% 左右。死绝户 2 938 户 ,离家逃荒 4 737 人 ,孤儿 4 735 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 1 324 人 ,关押死亡 200 余人 ,打伤致残 175 人。(《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第 111—112 页)

分别调出 10 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 ,其中 ,铜梓截至 1960 年底人口负增长 121.32% ,全县人口在 1959 至 1960 年一年间减少 41 734 人。习水县 ,这三年减少人口 42 624 人 ,死绝 499 户以上。(《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 1997 版 ,第 185 页 ;《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版 ,第 124 页)

调出 29 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 ,三年减少人口 53 990 人。(《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版 ,第 96 页)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 ,1961 年 1 月 10 日县委报告 ,“非正常死亡”5.5 万人。在饥荒结束后 ,金沙县另有遗孤 3191 人需要安排 ,1 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 ,到 1965 年 10 月 ,全县缺衣户 4 902 户、缺被子 2 463 户、缺房子 1303 户、缺粮食 19 124 户、缺钱买粮 4 587 户。(参见《金沙县民政志》,黔新出版社 1999 版 ,第 40—48 页 ;《金沙县志》第 23 页以及人口统计部分核算)

## 茅台为何大跃进 ?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 ,民间如此饥饿 ,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 ?

原因 ,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 ,有如下一个细节 ,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 年秋天 ,《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 ,78 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 :“1958 年 ,中央召开成都会议 ,有天晚饭后 ,我同毛主席散步 ,主席叫我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 ,要保证质量的事 ,你们写了没有 ?”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 :“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 ,当然要写 ,要名垂青史。”

毛泽东 1958 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 1 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以上参见《周林纪念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版,第 150 页、87 页、59 页)

1959 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

台酒是皇上。”(参见“酒厂志”第 138 页)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 1959、1960 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 820 吨、912 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作者单位为《当代贵州》杂志社)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胡国华 傅上伦 冯东书 戴国强	15.50	5.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张树德	69.80	8.00
文化的江山——重读中国史(上下)	刘 刚 李冬君	58.00	9.00
1978 大记忆	苏 峰	35.00	7.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7.00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	杨天石	60.00	8.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风鸣	29.00	7.00
让民主造福中国——俞可平访谈录	闫 建编	35.00	6.00
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章东磐著	32.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著	46.00	8.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苗采青等	59.80	9.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	30.00	7.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虽然我们不再因为思考与表达成为“右派”,但那段历史我们仍不敢忘记。作者因提出“神化与特权”问题,开始了长达 21 年的“右派”生涯——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 年的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经历——我的 1957》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1957 年的反右斗争,作者和丈夫共同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在 1960 年的大饥荒中,丈夫被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的大半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受尽各种凌辱委屈,经受了—一个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苏共亡党十年祭》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问史求信集》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直言》尝忆 50 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毛泽东多次谈及,共产党员应有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者除头颅犹在,其余皆已身历。自谓因祸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胆气犹壮。今年 80 有余,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自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眷恋?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休忘左祸殃,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李锐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 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

• 金凤

著名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长女、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傅冬同志(原名傅冬菊)因病于2007年7月2日去世,至今已两年多了。上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我和傅冬同志同为人民日报记者。朝夕相处,她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眼前。

1951年,傅冬同志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我清楚记得,她梳着两条长辫子,上身穿一件白布衬衫,下穿灰布裤子,脚上是白袜黑布鞋,衣着十分朴素。我听说,她从小学业优异,毕业于南开中学和西南联大,积极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47年在天津入党。我先后在上海交大、北平清华大学学习,也热情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7年在上海入党。她在西南联大西语系毕业,我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她是我的学姐,两人有许多共同语言。

1951年夏天,抗美援朝运动已在全国蓬勃开展。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同志派我和傅冬同志去北京市东城区,调查总结一下一个市区如何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

当时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我和傅冬住在东城区政府一个十分简陋的招待所。一间小平房,两张木板单人床,两张三屉桌,两把椅子,一个脸盆等,这些是住房的全部陈设。我们两人冒着酷暑,深入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和居民区,召开座谈会,或单独访问,了解各阶层人民对抗美援朝的意见。我们成天奔走在炎炎烈日下,衣衫都被汗水浸湿,回到小平房,没有洗澡设备,只能用脸盆装水擦擦身子。没有电风扇,只能手执纸扇,挥汗工作。苍蝇、蚊子很多,我们两人身上起了许多红疙瘩,招待所才给我们挂了蚊帐,发了蚊香,我们觉得很不错了。吃饭在区委食堂,主要是粗粮,一星期吃一次细粮。我们不以为苦。无论如何,傅冬出身豪门,号称傅大小姐,大学毕业后又在天津大公报工作,待遇不错。我问她,过得了这种苦

日子吗?她笑笑解释,她从小在山西长大,家中生活一向简朴。抗战时到重庆、昆明上中学、大学,和许多同学一样过苦日子,她父亲给她的生活费和一般学生一样。解放后先分到北平解放报,后到云南办报。从北平到云南昆明,除坐一段火车,大部分徒步行军,的确吃了许多苦,她坚持下来了。因此,对于采访中碰上的艰苦,她已习以为常了。

在东城区调查一个多月,两人很谈得来。我早就听说,作为傅作义将军的长女和爱女,傅冬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为解放战争做了许多贡献。出于记者职业的好奇,我请她谈谈当时的情况。

她笑笑说:“没啥好谈的,我只是奉命工作吧。”我坚持道:“不会这么简单吧。你不妨讲几件有代表意义的事。现在,全国解放了,许多事无须保密了吧。”

傅冬点点头。我们坐在小院,暑热已退,凉风阵阵。她款款而谈,我凝神细听,十分闲适。

她谈到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指挥几百万大军,向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扬言“三个月拿下共军”,气焰十分嚣张。当时,国民党有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解放区只有一百多万“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党中央急需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和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傅作义将军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经常去南京开会,自然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

傅冬这时在天津大公报副刊工作,常回北平看望父亲。她是和晋察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直接联系的。刘仁同志此时要她从傅作义将军那里取得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

傅冬知道在她父亲的寝室,有一个陈旧的保险柜。傅作义将军最重要的材料,都锁在这个保

险柜里。傅将军开保险柜时，并不避开女儿。傅冬已经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傅将军的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晚上放在他枕头底下。怎样才能拿到这把钥匙呢？

傅冬有一个五岁的小弟弟，是她父亲的至爱。傅冬买了几块当时还很少见的巧克力，送给小弟弟，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这把钥匙交给她。小弟弟平素很听大姐姐的话，满口答应大姐姐的要求。傅将军下班回家，小弟弟爬到父亲怀里，要父亲讲故事，乘机拿走父亲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傅冬。

傅作义将军上班开会去了，傅冬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她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她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小弟弟照办了，傅冬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且和他牵手拉勾，让小弟弟保证永远保护这个秘密。

胶卷很快送到刘仁同志手中，转报党中央。这是解放战争初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刘仁同志通过和傅冬联系的同志送回一句话：“老家的人谢谢你。”这是对傅冬的最高奖赏。

听完这段话，我对傅冬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傅冬温婉地笑笑说：“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弟弟。他再疲劳，小弟弟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他对小弟弟绝对不会有戒备。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我笑笑说：“这可只有你这样的身份，才能有条件做这样的工作。”傅冬同志笑笑，又讲了傅作义将军偷袭石家庄的事。

当时，党中央驻扎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主力部队都在外线作战，中央驻地只有一个警卫团及一些地方部队。傅作义派了两个军奇袭石家庄，准备直取共产党的首脑机关。

傅冬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紧急报告刘仁同



傅冬(1924—2007)

志，刘仁同志急报党中央。中央急调一部分主力部队回防石家庄，同时通过新华社发表文章，及时揭露了这一阴谋。偷袭不成，傅作义将军只得下令撤军。他很恼火有人走漏了这一消息。自然不会想到他的爱女会做这件事。我对傅冬说：“这事真危险啊，幸亏你及时报告党中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傅冬谦虚地说：“后来知道，同时有几位同志也将这事紧急报告中央，中央立即采取措施，转危为安。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份职责。”

夜已深了，小院中凉风习习，暑意全消。傅冬同志又讲了一件她亲身经历的大事。

1948年，蒋介石军队节节败退，全面崩溃势所难免。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企图策动中国地方势力直接和美国联系，美国乘机可以将中国分而治之。美方人士首先找到傅作义将军，说有要事面谈。他们知道傅将军的翻译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分子，要求傅将军另找一名可靠的翻译。傅作义将军找了西南联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的大女儿傅冬菊当他的翻译。

美方人士开门见山讲到蒋介石统治地区官僚贪污腐败，经济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蒋介石统治区已岌岌可危，美方建议傅作义将军在华北地区拥兵自立，美国可以直接向傅将军提供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美国代表说，他们也准备向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西北的马鸿逵、马步芳等地方势力提出相同建议，以“挽救中国不至于落入共产党之手”如此等等。傅作义将军听了美方这番“宏论”，不禁大吃一惊。但他沉着冷静，只是听着，一言不发。美方要他做出回答，他说，此事过于重大，他必须和幕僚们仔细商量，才能做出回答。

美国人走后，傅作义将军对傅冬说：“这不是要分裂中国，让中国再回到各地割据的局面吗？”傅冬气愤地说：“这是美国的重大阴谋，父亲千万不能落入美国的圈套！”

傅冬赶紧将这一事件报告刘仁同志,刘仁同志立即电报党中央。

不到两天,延安广播电台播出新华社重要文章,揭露美国正在策动各地方势力拥兵自重,抛开蒋介石而和美国直接联系,美方企图将中国分而治之的重大阴谋。蒋介石听到了大吃一惊,他对美国又气又恨,却又奈何不得,只得赶紧向各地“灭火”。他打电话给傅作义,力劝傅将军将他统帅的几十万部队,从塘沽口海路南撤到长江以南。他许诺将请傅将军担任江南总指挥,统帅长江以南国军合力剿灭共产党部队。

傅作义将军听了,心知肚明,只要他亲手创建和指挥的部队一过长江,便将被中央军一口吞掉,他将双手空空,落得和他的老长官冯玉祥将军一样的下场。因此他迟迟按兵不动。最后,共产党的第四野战军提前入关,抢占了塘沽口。傅作义将军自然也不能南撤了。

听完了这番经历,我称赞道:“傅冬,你真做了一件旁人绝对做不了的事。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不知将给解放全中国增加多少困难!你这翻译当得太重要了。”傅冬笑笑:“我也没想到,在大学的英文,会派上这样大的用场。”

傅冬又谈了她为和平解放北平所做的工作。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势如破竹。中央军委决定,一部分四野部队秘密入关,进行平津战役。刘仁同志派干部秘密到天津会见傅冬,要求她做好她父亲的工作。不久,刘仁同志又派人到天津,指示傅冬立即回北平和傅作义将军住在一起,以便随时可以做她父亲的工作,同时向地下党组织及时报告傅将军的情况和心态变化等等。

当时,24岁的傅冬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回到北平她父亲身边,积极做傅将军的工作。她明确劝告父亲,不要再跟蒋介石走了。傅将军问女儿:“是聂荣臻派你来的?还是毛泽东派你来的?”傅冬事先已经得到党组织的指示,明确告诉傅将军,她是“毛主席派来的”。傅将军又问她:“你是共产党吗?”傅冬说:“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傅作义将军虽有和谈之心,但顾虑重重,犹豫不定,难下真正的决心。傅冬和他谈过多次,分析利害得失,指出和谈前途,还把解放区出版的小册子和报刊放到父亲办公桌的抽屉里。她发

现,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傅将军翻阅了。她问父亲,观感如何?傅将军回答“颇有道理”,但不愿深谈。因为火烧眉毛的是他究竟是战还是降?战则必输,降则有损他一世英名。傅冬耐心劝他:“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傅将军低头不语,女儿的话,似乎真正触动了他的心灵。如果故宫、天坛毁在他手中,他怎能对得起后代子孙,对得起国人?!

傅冬将傅作义将军每天的言谈、神态、情绪变化等等及时报告地下党组织,地下党通过秘密电台向平津前线司令部报告,为司令部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后来,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高度评价了北平地下党和傅冬同志的作用:“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对我们做出正确判断、下定正确决心、进行正确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他十分感谢北平地下党和傅冬同志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的重大贡献。傅冬和我的谈话分几次进行,我听了很感动,心想,有机会一定要写出来。不料,一拖下来几十年。

当年,我和傅冬同志在东城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两人合写了调查报告,又各自写了一篇人物专访。记得傅冬写了一篇《徐大妈觉醒了》,发表在抗美援朝专刊。文章贴近老百姓生活,反映了北京大杂院居民的生活和心态变化,受到读者好评。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傅冬同志和我依然互相往来。一次,我问她,她最近回家看过傅将军吗?她说,回去过,发现她父亲心神不定,有心事的样子。她关心地问,有什么心事吗?傅作义将军(时任水利部部长)叹了口气,告诉她有这样一件事。原来,一解放,傅作义将军就把他家不动产包括一座花园全捐给国家了,花园后来成了幼儿园,他很高兴。只是,还有从天津开向上海的两艘货轮,没有交出去。因为,有一些旧部属解放后生活困难,总来找他。他不得不靠这两艘货轮的收入,接济他们。只是,这几天他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妥。傅冬劝父亲:“应当将这两艘货轮交出去。旧时的一些部下生活有困难,应当劝



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学会节俭度日,向老百姓看齐。”傅作义将军听了点头答应。他告诉傅冬,他这就给李富春副总理写信,交出两艘货轮,了却一桩心事。傅冬笑笑对父亲说:“俗话说,无官一身轻。我看,无财也一身轻嘛。”父女两人高兴地大笑起来。我听了这事,对傅冬说:“看起来,你父亲依然很信任你,有事总找你商量。只是,我不明白,你父亲怎么会拥有两艘货轮呢?”傅冬说:“当年蒋介石一贯排斥异己,歧视并打击地方部队。名义上都是所谓国军,却常常连军饷也不发,军火、装备也不管。我父亲不得不自筹粮饷,货轮便是自筹收入的一部分。全靠自筹粮饷,我父亲的部队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才不致被中央军统统吃掉。”我点点头:“原来如此,你父亲现在交出货轮,说明他还是深明大义的。”傅冬急急说:“我家生活一向简朴。父亲说,现在靠他工资,他一家生活绰绰有余。就是他一些部下和他们家属,解放前生活阔气惯了,过不惯现在的生活,才向父亲叫苦。”我说:“好了,现在断了他们的财源,他们总得学会勤俭度日了。”一向布衣布裤的傅冬笑了起来:“可不是嘛!”

1958年,人民日报记者站和新华社分社合并,傅冬调到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傅冬也受到很大冲击。她给周总理写信,总理下令保护,她才逃过浩劫。

“文革”结束,傅冬同志又回到人民日报记者部,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她告诉我,她想收集材料,为她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我举双手赞成:“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作者了。我希望你抓紧时间写出来。”

1984年,傅冬同志调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编辑部副主任。90年代她回到北京,身体一直不好。我曾到崇文门她住的地方去看她。记得当时还是秋天,我穿了一件薄毛衣,她却穿了件小棉袄,她说她怕冷。她见到我很高兴,忙着问一些老同志的情况。我问她,傅作义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困难太大,写不下去。”我说:“你先写个草稿也好,留给后人作为宝贵资料。”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劲吗?”我很不以为然:“傅将军的一生是很值得写的,是军事

史、政治史的宝贵材料……”她打断我的话:“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我知道她不愿谈这事,便也算了。不料,这竟是和她的最后一面。

一位富有才华、忠忠耿耿、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傅冬同志,就这样悄悄走了。我回顾茫然,冒着酷暑写这点纪念文字。

以上是2007年夏天写的,由于一些特殊原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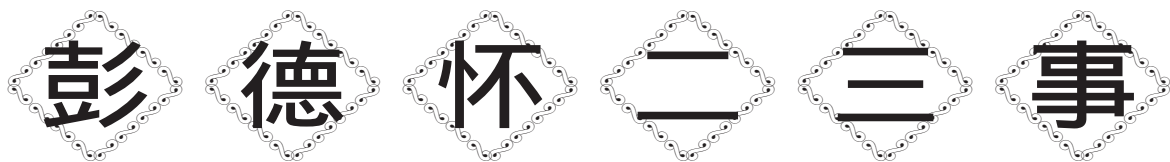
2009年8月,我看到电视剧《北平的战与和》,剧中以傅作义将军作为主人翁,也出现了傅冬菊同志。有些事,和我直接从傅冬同志那里听来的和她逝世后悼词中所写的,有一些出入。这也难免,电视剧允许虚构。我写的保证是事实。正逢国庆六十周年大庆,交出这篇文章,也可以从一个小侧面反映建国事业的来之不易。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书屋 2010年第1期目录

书屋讲坛	二十世纪好像大杂烩 ——重读百年中国人的国家观	顾 土
	论社会自治	袁传旭
	重建道德靠什么	许博渊
灯下随笔	闲话贵族情结	雷池月
	文学·政治·诺奖	哈 米
	法、俄革命琐谈	周 拓
编读往来	秦始皇统一六国,何错之有?	李业成
	庶人痛斥秦始皇,甚合吾心	王志超
	就秦始皇事,致蔡放波公	蔡淑萍
域外传真	特里尔马克思故居散记(外一篇)	冯天瑜
	斯大林为何憎恶自己的格鲁吉亚同乡?	彭华 编译
	甘地与情欲	杨曙晨 胡丽丽
人物春秋	罗隆基:从书生论政到庙堂问政	秦立海
	胡适对“全盘西化”的自我更正及其他	邵 纯
	中山陵和“奉安大典”的另类表达	陈漱渝
	悲凉秋声,如潮似水	
	——旧式文人李涵秋的心中历程	张永久
	岁岁年年满树花——忆陈乐民老师	赵 梅
	我所认识的聂绀弩、吴祖光、丁聪和丁玲	徐 珣
书屋品茗	《纸上的声音》题记(外一篇)	林贤治
	当代旧体诗词	李荫远
	读书札记二则	刘法绥
	李慈铭的日记与诗赋	那秋生
裁书刀下	韩侂胄决不是奸臣	余习忠
	《史记》对伍子胥形象的塑造	何 亮
	关于“伪阅读”与小报	于鹏远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6.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791300 85486812 传真:0731-8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 ——兼怀王焰同志

● 宋 群

王焰是一位早年投奔延安干革命的老同志。五十年代初期调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的秘书兼任办公室主任，直到庐山会议彭老总被罢官，他也被贬到解放军报社一个编辑处里当主编。“文革”中被批斗，劳改，受尽折磨。粉碎“四人帮”后，彭老总得以平反，他被任命为“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的组长。以后的十多年里，他翻阅了无数档案资料，走遍当年彭老总足迹所至的全国九个省市，寻访了数以百计的老干部和农村群众，用确凿详尽的事实，来为彭老总辩诬。他自己亲笔书写或主持编辑了《彭德怀传》、《彭德怀自述》、《彭德怀军事文选》、《彭德怀年谱》、《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等等，几十本书，粗略统计有200多万字。直到2000年8月5日，在吃晚饭时，猝然倒下，病逝于脑溢血。

在编写彭德怀传记过程中，我们同住在军报大院，闲暇时也常常在一起聊天，顺便讲一些彭老总的趣闻轶事，有些事与王焰有关，并且从中既可以看出彭老总的为人，也可以看出王焰的为人。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件事是1952年11月，王焰刚调到彭老总身边不到两个月，第一次出差到辽东沿海视察。返程那天，他们一行来到大连火车站，准备登车北上。车厢门一打开，彭老总一眼看到，两位熟悉的女乘务员正在门口笑吟吟地迎接他们。彭老总登时怒容满面，回过头来质问王焰：“怎么又是公务车？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你要坐普通客车走吗？”不待王焰解释，彭老总怒气冲冲地冲着他大声斥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同群众一起乘车？我的命令不执行，撤你的职！”周围的空气凝固了，人们都感到十分尴尬。送行的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和市长韩光，为了缓和气氛，说：“开车时间到了，换车

厢来不及了，彭总先上车，以后注意就是了。”彭老总这才悻悻地上了车。到达鞍山下车视察，终于按他的意思换乘硬座客车，事情才算过去。

彭总发火，其实是委屈了王焰。王焰刚刚调来，对保卫首长的制度并不熟悉。从北京出发时是乘的这节公务车（有软卧及会议室）。回程的时候，彭老总坚持要坐硬座，理由是，群众能坐我们为什么不能坐！王焰为此同随行的警卫处长商量。警卫处长说，制度规定，首长行动要保密，普通客车人员复杂，万一安全出了问题怎么办？王焰一听，制度有规定，公务车也已调在大连，就答应不变了。哪想却惹恼了彭老总，发这么大脾气，还几乎闹到被撤职的地步。以后，每当遇到此类情况，他总是先同有关人员打招呼，不能特殊，免得找不愉快。就这样，习惯力量再加上某些人的某种思路，还是引发了彭老总的几次恼怒。不过这和王焰无关了。王焰并不是从中吸取了个人不挨批的教训，而切实地一再地感受到彭老总的为人。那种劳动人民本色不变的精神，始终牢记在王焰的心中。

另一件事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总落难，“反党集团头子”的称谓已被写入决议，狂风暴雨的批判暂告一段落，会议结束，大家准备下山。这时，招待处来说，有一批上等的云雾茶，是庐山特产，问彭总要不要买几斤带回去？来电话的人还特意说，这种茶叶街上是买不到的。王焰接电话后向彭总报告，问要不要买点？彭总一听，又是忍不住恼怒起来：“街上买不到，为什么不拿到街上去卖？尽搞这些鬼名堂，市场怎能不紧张！”彭总不但表示坚决不买，并且要王焰立即打电话给招待处负责会务的人，要他们今后不要再给开会的人搞什么土特产，“这是一种很坏

的风气！”王焰迟疑了一下，悄声地对彭总说：“彭总，在这个时候，不要再管这件事情了吧！”彭总听了，想了想，不禁放声大笑，说：“刚才还在说我的坏脾气，看来一辈子也改不过来了！”

1959年庐山会议后，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斗争结束，国防部长卸任了，秘书和兼任的办公室主任也自然解职。王焰帮助彭总几次草拟和修改检查稿，整理文件。一切都结束了，他向彭总告别：“彭总，我要走了，以后需要我的时候，我再来！”这情节，“文革”中不知怎么被造反派查到了，并且被当作一发重磅炮弹在批斗王焰会上抛出，质问王焰：“你这是什么话，你准备什么时候再来？你还准备彭德怀复辟吗！”令批判者想不到的是，在批判的喧嚣声中，却在人们心底深深埋藏下了当时无法表达的对王焰的印象：善良，他是如此善良！

人们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谁都无法逃脱历史的局限。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些违心的话，甚至做了一些违心的事，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善恶还是有差别的。有的人对待逆境是勇敢的抗争。著名作家萧乾为自己列出的底线是：不能讲真话，至少不要讲假话。国学大师季羨林的底线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抗争不了，也不会去趋炎附势地坑害别人。讲到王焰，我们不能不想到另外一种情况、另外一种人。庐山会议上和后来北京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老总看到当时的形势，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就是“要什么给什么”，什么帽子都可以，怎么检讨都行。但是，有两条他则表示至死也不认账。一条是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北京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追问他“军事俱乐部”的纲领、目的和名单。愤怒的彭德怀在会上大声地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嘛！”为什么他坚决不承认有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彭德怀在后来的“自述”中说：“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毁灭自己，保证军队！这是何等高尚的气魄！

彭德怀坚决不承认的另一条“罪状”，是所谓的“里通外国”。庐山会议上揭发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主要根据，是他在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诸国期间，曾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受过赫鲁晓夫的接见。个别人拐弯抹角地暗示：“彭德怀前不久访问东欧各国，上山后急于发难，是不是有什么背景？”这一揭发，正合斗争需要。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彭德怀这次出国访问，“是否取了点经？”毛泽东这次拣起来的可不是用来打人的一块小石头，而是置彭德怀于死地的炮弹。对这件事，彭德怀详细交代了他出访期间与赫鲁晓夫礼节性会见的经过，并且具体地提供了会见的时间、地点以及陪同人员，翻译人员名单。他说：“我根本不懂外国语，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别人翻译。要里通外国，我怎么去密谈？”为这件事，他还诚恳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郑重声明（里通外国问题）“如发现确凿事实，可以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1974年11月，彭德怀病危弥留之际，舌头已经僵硬，还喃喃自语：“我没有里通外国……我是清白的……”由此可见，这条“罪状”在彭德怀心目中的分量。可是，如今，当人们翻阅资料时，才知道这“罪状”最初的出处，就是一位曾与王焰一起跟随彭总出国访问的老同志提供的。出国刚回来，这位老同志还曾连篇累牍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颂彭老总出访如何成功等等。也许揭发时他只讲了彭老总与赫鲁晓夫有过接触，并没有上纲上线到“里通外国”。可是，在那种气氛下，你为何提供这样的所谓“揭发材料”？这还用得着深入探讨和分析吗？

（责任编辑 吴思）

##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 一个母亲的忏悔

• 沙漠

我的爱子黄小振,1947年出生于重庆,小学毕业。国家一级编剧、青岛市戏剧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青岛市政协常委、青岛市拔尖人才……

他只活了49年,能在苦难中挺立,成为优秀剧作家,是个奇迹。

小振从小生活在文艺圈子里,受着家庭影响,酷爱文学艺术,尤爱话剧,父母都从事话剧,在娘胎里便跟随妈妈翻滚在重庆的话剧舞台上,受的胎教是‘话剧’。小小年纪他便有个心愿,长大了干话剧!

1956年,我们夫妻由北京调到青岛组建青岛话剧团,小振和姐姐随之来到青岛。

我们五口之家(婆母也接来了)生活在这美丽的海滨城市,活跃在话剧舞台上,我主演《桃花扇》引起轰动,中敬执导《双婚记》受到热烈欢迎。事业顺心,人际关系良好。家庭和睦亲密,这美好时光使我们陶醉。

骤然,乌云翻滚,黑色的“1957”和风细雨的“整风”变成了狂风暴雨的‘反右。我们夫妻双双落马。

我的罪状是“反对民主集中制”:我说,“青岛选人民代表,选民对候选人一无了解,只划圈圈,这是形式民主。”中敬批评话剧团家长式领导,一言堂,作风不民主,党群关系不正常。他犯了“反对党的领导”——第一大罪。

天塌了。父母都成了右派分子。

丈夫黄中敬被划为极右,去全市右派集中地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妻子张坤权是“五类”(等级)在本单位监督改造——刷厕所、洗服装、做道具、搬布景、演群众……

两个孩子生活无人照料、备受歧视,一个11岁,一个13岁。幸福之家,几近破裂。婆母回天津日夜为我们担忧,猝死。

失悔没有及早送走孩子!我们已被划为右派分子,怎敢让亲友接纳一双右派的子女,谁不怕

受连累?

我随话剧团巡回演出监督改造,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一年。

不久就是灾荒年月,忍饥挨饿,大人尚能忍受,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怎么得了?中敬半个月一次回家休假时想方设法给儿女做一顿饱饭吃。懂事的孩子看到爸爸舍不得吃,哭着说:爸爸,您不吃,我们吃不下,您那么瘦(三个月的强劳动,竟使中敬这个180斤的壮汉子瘦了60斤)。中敬告慰我:“孩子可以放心。振儿曾在路上捡到一皮包,追着追上丢包人,人家打开包,见里面钱和粮票原封不动,很感动,拿出一斤粮票酬谢(那时一两粮也珍贵),小振谢绝跑开了,这事是路上有人见了来说的。振儿在这些方面特别信得过。”

时隔不久,勒令搬家,搬进久已废弃的小伙房,潮湿,黑暗,白天需点灯。

担心女孩子不安全,好不容易把女儿送到外地去了。

振儿已从小学毕业,刚迈进中学大门,一天,忽然从后面传来:爹妈是演员、导演……是右派……右派的儿子……使自尊心极强的他受到莫大的打击。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他选择了逃学。

从此振儿的世界变了,他的命运起了大的变化,没有温暖、没有爱,孤苦伶仃,他成了流浪儿。

我随剧团改造,远在南方,忽被告知,黄小振拧了公共厕所的灯泡,拿到自由市场去换干粮吃了,黄小振拿了邻居晒的两件旧的棉毛衫裤到自由市场去换干粮吃了,黄小振逃学,夜不归宿。

我们的新家在宿舍的大门口,前面是“自由市场”,那是特殊的年代——大饥荒!每到天色昏暗,这里便成了“黑市”,除了小商小贩外,有着许多只在黑暗中活动的人群,口里小声喃喃:要粮票不要?三元一斤,要馒头不要,三元一个,“把子肉”一元五一块……破旧衣物,炊事用具……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在这里换高价食品。这里吸引

着饥饿的人群,诱惑着少年孩子!

振儿独自生活在这里,饥肠辘辘,每日面对黑市的叫卖,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如何抗拒这强烈的诱惑!

我随剧团归来,被眼前的景象击倒,残破的门虚掩着,大白天伸手不见五指,定神,依稀看到门边有一拉线开关,一拉,亮了,在昏暗的照明下,室内空荡荡却凌乱异常,一大两小三张床,被褥全不见,床上、地上,横七竖八堆放着杂物,书籍纸张随处散落,狼藉一片。空气中弥漫着异味,令人作呕。我呆立不动,惊诧、迷茫,这是我的家!良久,跌坐在椅子上。我没有哭!家已破,人呢,我的儿子呢?半晌,来人,是平素少有往来的舞美组的“右属”(她丈夫是右派,有“历史问题”,进了监狱)。她告我,她的儿子和街道办事处书记的儿子都出了问题,“他们住在你这里,说是‘小振一人住,害怕,我们陪他’。我还嘱咐:‘他小,家长都不在,你们好好照顾他。’谁知后来这三个孩子都不见了……”

饥饿的儿子啊!你回来吧,妈妈不怪你,纵使有天大错,妈妈承担。

我知道无处可寻找,但我依然寻呀找啊!火车站、长途车站、轮船码头,找了个遍,那里有许多流浪儿蜷缩在一起熟睡,有的脸上盖着报纸,身上披着麻袋片,看不清,我便掀开盖在脸上细细查找辨认,少不了把在梦乡中的他们惊醒,惊恐警觉的眼神、怒目而视的敌意、张嘴便是粗话,嬉笑着嘲弄:“又是找儿子的吧?”“我是不是你儿子?”“给我饱饭吃我给你当儿子,嘻嘻。”……这些是哪家的儿郎?或许他们的母亲也在寻找儿子?振儿也会是这模样?天!

踉踉跄跄回到家中,心乱如麻,夜难成眠。下决心再不找了,受不了这刺激!但一到夜半三更,思儿心切,我又去继续寻找……

漫无目标去寻找,垂头丧气归来,这天,疲惫已极,倒头便睡,忘了关门关灯。夜半,忽听屋里有哭声,惊问,谁?什么人?猛然间,见一蓬头垢面的少年站在床前,吓得翻身坐了起来。“妈,妈,是我,我刚才看见您了,您在找我!我跟在您后面,不敢进来,怕您生气。”他呜呜地哭着跪下了。日思夜想的儿子回来了,我慌了神,脑子一片空白。“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从晕眩中醒了过来,

气、急、恨(唯独没有爱、怜),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一把揪起,用尽力气朝着那肮脏,泪流满面的小脸上猛掴一巴掌,狂怒着:“滚!”他哀叫了一声妈妈,哭着跑了,这一声哀叫的“妈妈”刻在了我心上。

我疯了,不知自己说了什么,干了什么!

我好悔!一巴掌把回来认错的儿子打跑了!他还那么小。

这一掌,我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

盼到中敬休假回来,我哭诉了一切,商讨以后怎么办?中敬想到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书的中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挽救青少年失足的唯一途径是交给政府,有党和政府关怀教育才能有光明前途……

我们得知振儿的下落,立马亲自把他送交派出所,请求收容管教。公安部门明告“不够条件”,拒收。经我们反复写申请报告,最终获得批准。这一过程,我没有参与,连送衣物我也没去,我没有勇气见儿子,怕自己动摇,我是母亲!

他还那么小,他能有多大问题呢?人家不要,不收,我们死乞白赖恳求……

我又随团出发了,振儿送到哪里去了,我不清楚,只在离济南不远的偏僻小城,我们始终未去探望,右派身份,多有不便。1962年我俩先后“摘帽”,中敬改编《红岩》,取得成功。剧团在济南演出,休假日我们去看望振儿。一位姓张的领导,看了介绍信,得悉我们是黄小振的父母,连连道:“欢迎欢迎,好容易盼到了你们来,很想见见你们,请坐。”他让人去找黄小振。

小振进来见了我们,意外惊喜,却没有特别激动,有礼貌地叫了声爸爸妈妈,深深一躬,保持距离。中敬指一指带来的书籍和吃食说,这是带给你的。他一见到《红岩》、《欧阳海之歌》,两眼发光,兴奋不已。连说谢谢爸妈,又鞠了一躬,但见到难得买到的点心、糖果反应并不强烈。老张说,你们好好谈谈,我就回来,他和其他人离开了办公室。

我们拉振儿坐下,细端详,他长高了不少,虽瘦,但挺健康。精神状态不错,和他交谈,明显感到长大了。我们和他谈自己的和团里的情况,摘帽、改编《红岩》、演出反映……他拘谨地汇报自己在这里的一切……吃饭时间到了,老张进来请

我们吃饭,我们谢绝了。他把我们带的东西交小振,嘱咐:《红岩》不许传给别人看,只你自己看,包好书皮,尽量不在人前看,读完,交我替你保管好。小振连连道:是!欣喜地说爸爸妈妈再见,又鞠躬道谢:谢谢爸爸妈妈送这么好的书!(他似乎知道这书的价值)说完,连蹦带跳抱着东西,开开心心走了。老张说:“你们看,他见书,多亲!这《红岩》在我们这里是禁书,因为写了‘越狱’,允许小振看,是对他的特殊信任。”

待室内只我们三人时,他一脸诚恳,道:“我想见见你们,是因为我希望有机会亲自听你们谈谈,送儿子到这里来的真实思想,究竟为什么?你们的儿子,本质好,年龄小,出了一点毛病,怎么非送到这里来?”他的谈话如此坦诚使我们意外,他分明在批评我们!“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做父母的怎么会如此狠心,把孩子往这里送,这里是什么地方?大染缸!形形色色做坏事的少年罪犯有多少!你们不怕孩子在大染缸里受污染?……”他一口气说了许多。

“这里是大染缸!”闻所未闻,我不理解,正待发问,他看了看表,说得更快,“时间不多,长话短说,我特别想问的是你们怎么没考虑孩子的前途,将来怎么办?这污点会影响一辈子!你们是大知识分子,是过来人,比我懂得多。我谈这些,出格,有失原则,作为公安人员、党员、领导,尤其不允许。我非常关心小振,这里图书馆的书,他差不多都读了,他那么聪明,单纯……我深怕这污点会,会影响他……为他担心、惋惜。这些掏心窝的话,憋了很久了,信任你们才无保留地说了……”吃饭的人们回来了,他戛然而止,意犹未尽,起身握手道别,我们反复致谢。

他发自肺腑,“出格”的话,大大震撼了我们。中敬道:“这个看似普通的人,敢说实话、真话,或许我们有错。”

我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被“改造”得人性扭曲,分不清是非,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在断送孩子的前途,却浑然不觉。只看到在这里儿子表现好,便以为前途光明,充满了希望,哪里想到日后的巨大打击,无尽的苦痛。

半年后忽然接到通知:振儿提前回来,中敬出差不在家,我因排戏,不能到车站去接,傍晚时分在路口迎他,远远见他大步走来,我已止不住

满眶喜泪,15岁的少年长大了,平顶头,清秀,背着背包,提着手提包,穿了一件蓝色的小棉猴,干干净净,挺精神。到家,脱去外衣,一眼看见满身的补丁,不由得哎了一声,倒吸着冷气,问:这是你补的?他点头。天!泪再次涌出。振儿怕我难受,蹲在我面前说:“妈,我饿了,您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妈妈,吃饭吧。”

晚饭后,没有多谈,见他旅途劳顿,让他洗洗先睡了,他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边,这是我们全家的习惯,他还保持着。待他睡熟后,我把衣服拿到一边,数了数,衣、裤的补丁,大大小小72个,细针密线,针脚整齐,称得上精致,补丁色彩协调(他从哪里找到这些小布头的?)大的拳头大小,小的只方寸大,他是用心,费工制成的,令人惊叹!无法相信这出自十四五岁的男孩儿的手。他在家从未动过针线,何时学会缝纫?竟缝得如此出色!

看着熟睡的儿子,想起他一声声“妈妈”!不禁想起我刻在心上的,被我打跑时那哀叫的一声“妈妈”!再看看这72个补丁,痛定思痛,泪泉涌,湿衣襟。

振儿闭门不出,苦读书,见人既不低头回避,自卑不堪,也不故作轻松,若无其事,他有礼貌地,微笑着回应关心他的人群。爸妈工作忙,他抢着料理家务,什么都会,成了家里的好帮手。

儿子心灵受到的伤害,我们知之不多,抚爱更少。他从不提,怕痛,紧闭心扉。我们不问,爱护他、尊重他,却没有去帮他启开心扉,用慈母的爱为他疗伤,帮助他好好好息,告诉他,那是妈的错,原谅妈妈。我却没有这样做!

没有,没有做,错失良机!作为母亲,又一次严重失误。

我们为如何解决他的上学问题努力,以他目前学业的真正程度,该如何插班……上学是个很麻烦的问题。

这时,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党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一贯听话的我们,毫不迟疑,积极响应号召,为黄小振报了名。敲锣打鼓,佩戴红花,把振儿送到农村。他被分配在非常贫困的莱西县的一个村。那时他17岁。



振儿在农村安家落户八年。他除了春节回家,始终坚守岗位,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别的知青家长常常想方设法捎馒头干粮和炸鱼,炒酱,有时还有少许糕点、糖果。唯独小振没有,我曾动过心,中敬说,贫下中农吃得了的苦,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理由吃不了?搞特殊化!说服了我。

小振年年评为五好社员。他除了勤劳动,只和书本相伴。为了加强记忆,常常把读过的作品、名著,细细讲给社员听,连外国名著他也改编成中国故事如《基度山伯爵》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讲得风趣生动,他为缺少文化生活的人群带来快乐,也使自己快乐。讲故事使他受益良多,许多文学作品和中外名著因而留给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为日后他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知青”返城了。振儿返城已是25岁的大青年。

街道办事处忙着为返城的闲散劳动力安排临时工作——打小工。振儿当了两年多临时工,干得卖力,反映良好。又过了许久,迎来“就业”高潮,“社会青年”(不是学生又没有工作的青年)一片忙碌,佳音频传。但我们家没有动静!等吧,等着吧。安排就业工作已接近尾声,依然无望。

终于,等来了消息,街道办事处的宋书记开门见山对我说:我们尽力了,但小振分不出去。他把多份退档材料放在我眼前。我屏住呼吸,问:“为什么?”“当然是政审关。”“是父母的还是他本人的?”“都有关系,今年偏重在本人。”“父母早已摘帽,他本人,你了解,他……当年小,13岁,我们主动送去的……”

“我都了解,但用人单位,信奉‘左比右好’,只看档案,政治有无问题,是否有污点。谁去研究分析具体情况?唉!小振的就业这么难!没人要!谁也不要!”这是个好人,他说的是真话。

我傻了!懵了!我的优秀的儿子,没人要!谁也不要!强忍着满腔苦水,晃晃悠悠来到离家不远的第三公园,躲在无人过往的旮旯,大放悲声!

正哭得伤心,耳边响起:“你们真狠心,把孩子往这里送!这污点影响一辈子!”清楚记起,说话出格,敢说实话的公安人员,那个特别关心小振的领导——老张,是他说的,他还说:“你们不考虑他的前途?”

——完全验证了他的正确。愧对老张当年的

无情批评。我深感疚罪,无地自容,是父母毁了儿子的前途,咎由自取。哭吧,哭吧!哭倒长城,也换不来儿子的前途,也解决不了当前小振的就业。为振儿我哭干了泪。

后来一位多年挨整的老革命相助,求爷爷告奶奶,小振被安排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分配在最累最苦最脏的磨砂车间。他埋头苦干。完成任务又快又好。

车间有文化的人不多,他主动利用午休时间帮助车间办墙报、黑板报,写好人好事……文笔生动,工人们喜欢看,说黄师傅是秀才。逐渐被厂领导赏识。从车间调到工会,开始和文字打交道。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学习创作,他写工人,唱工人,他还活跃在文化宫的舞台上。

在工作和业余活动频繁的同时他刻苦学习,考上了“青岛教育学院”,成绩年年名列前茅。

他忙碌异常,人际关系良好,他快乐、兴奋地生活、工作着。

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同等学力(不算当时正在读的“青岛教育学院”,他的学历是小学毕业)报考全国文学艺术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难以想象,他只读了小学,他怎会有这勇气?他夜以继日地、玩命地读书,死记硬背大量的相关学习资料,去了北京,上了考场。

传来可靠消息,振儿在高考中发挥得出乎意外的好,一片叫好声。众考官都打出高分,称他状元,挺轰动。初试二试顺利通过,三试是他的强项,理应不会有问题。没有最后定夺,心悬着。当我们得知“中戏”今年的主考官竟是我的老战友,同在华北文工三团的吴庚鉴,欣喜不已,而我们三团的老团长李超已是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有这样两重关系,赶快去北京,去打个招呼!小振成绩好,什么话也无需说,便会是上上大吉。而我却犹豫,对中敬说:“此时此刻我若去北京,即便不是走后门,也‘无私有弊’啊!党三令五申不要走后门,要杜绝不正之风。我们‘过问’,‘打个招呼’,也属不光彩,不光明磊落!小振凭真才实学考取,堂堂正正,这多好!”转念又想,或许我们该去北京。“‘打个招呼’,也不是不正之风吧?”

我犹疑不定,按兵不动!连一封求助信都没写过——我们真的是很“听话”的。

天有不测风云!命运180度大逆转!黄小振

榜上无名！意外的失败，几乎击垮了振儿，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不是说这次高考，不看政审？那问题出在哪里？分明已近定局，怎么瞬间成泡影！

这意外，不可理解！无法接受！

后来得知主考官庚鉴也呼遗憾。他当时太忙了，待他知道这事时，晚了，帮不上忙了，这个十分有原则的人也说：“怎么不说一声呢？这算不得走后门啊！”

我谴责自己、后悔“按兵不动”。没有在儿子需要拉一把的时刻，为儿子尽力。这拉一拉，关乎儿子的前途啊！

就这样，我打碎了振儿的求学梦！他多么渴望上正规大学，而这是最后的机会（超龄）！正待高飞的鸟折翅重重摔伤！

又一次断送振儿的前途。我吞咽这苦果。

振儿在困惑中挺住了，他咬牙！什么也没说。他不服输，努力拼搏。

白天在工厂开展工人的文化工作，下班后依然活跃在业余文艺队伍，夜晚孜孜不倦地阅读，刻苦地学习写作。在这同时，他完成“青岛教育学院”的学业，成绩是最优秀的。

他写、他演、他唱……主演话剧《于无声处》而后又主演电视剧《残局》，他还自编自导自演别具一格的相声，包袱抖得响，观众非常喜爱，他的作品发表于国家级大型刊物——《剧本》月刊。他被市文联的“伯乐”相中，破格由集体所有制的小厂，转入青岛市文联，从事文化艺术工作。

他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从此改变了命运。那已是1985年了。

向往在话剧创作的大道上迈步前进，他终于如愿。

1986年，他初次写的多幕话剧《四十不惑》发表于《剧本》月刊，大获好评。随即由中央实验话剧院在北京演出（改名《惑》），引起轰动。全国三十多家有影响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名家的评论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荣获四年一度的第四届“全国优秀剧本奖”。

面对鲜花、掌声，振儿是低调的。他没有被捧晕。内心的喜悦使他对自己更加自信，为自己没有受正规学习，能取得成功，由衷感谢文学著作带给自己的恩惠。他想，不是当年“落榜”的挫折，

可能成功会来得早些，或许会更上一层楼。一晃10年过去了，他已近不惑之年，他需要更加奋发。

由于专业上的贡献，他连任青岛市政协委员、常委。被评为青岛市“拔尖人才”，任青岛市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

振儿娶妻生子，夫妻恩爱，美丽的妻子非常崇拜他，儿子聪明伶俐，家庭美满，我和中敬都已离休，全家人沐浴在浓浓的亲情中，尽享天伦之乐。

正当全家过着难得的祥和日子，老伴病了，病中，父子促膝谈心：

爸爸：“振，你写的《四十不惑》很好。爸爸没有为你喝彩叫好，你不怪吧？”

振儿：“您的严要求和‘响鼓重捶’‘泼点冷水’我都能接受，您用心良苦。”

爸爸：爸爸很抱歉，没有给你具体帮助、指导。”

振儿：“您给予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够我受用一辈子。”

爸爸：“写作风险大，我曾担心你经不住风浪！后来又怕你抵挡不了‘商潮’的诱惑！现在我放心了，你是我的儿子！我相信你行！”

振儿：“您放心，爸，我是您的儿子，我血管里流淌的是您的血液……有您的榜样，我会努力写出更好的剧本。”

他为爸爸揩去眼角的泪，自己也不禁潸然泪下。

怎么能想得到这次父子的倾心交谈，竟是永诀！他多么在意爸爸此时此刻的鼓励鞭策。他也牢记对爸爸的承诺。

老伴被诊断为“肺脑”。只一周，他，他驾鹤西去！

天翻地覆！

为化解我的悲痛，大洋彼岸的老母、弟、妹邀我去美国探亲。

两年后，94岁高龄老母仙逝，哭别了娘，我回来了。

振儿已人到中年，更趋沉稳。在政协会上发言犀利、铿锵，敢说话、敢批评，留给人们深刻印象。

一次,政协开会讨论市领导作的报告,在小组会上一位常委发言,说报告如何如何好,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领会精神……又一委员也作了相似的发言。小振耐不住了,说:“赞报告精彩,谈体会、感受……这些可以在别的场合去谈。我想,委员们在这里开会,更重要的是,谈意见、谈不足,提建议,要起到监督作用,不能只赞好,泛泛谈感受说套话。”哑场。在场的市领导说:这是诤言,不怕得罪人,敢说话。政府需要监督,需要意见。

振儿人是真实的,笔也是真实的。除话剧之外,写影视作品,也写儿童作品……他应邀写的农教片《金色的多来米》思维新、视觉独特,在全国30多部参赛片中得了一等奖第一名,这奖不大,他很看重。

不久他约了两位写小说的朋友合作写三十多集的《金色海湾》,是当时青岛电视台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很受好评,影响广泛。

怎料厄运又悄悄袭来——振儿病了,癌!肺细胞癌。医生宣判“晚期的晚期”,“不治”,“半年”!

我似走到了人生尽头,几近崩溃!脑海里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爱子被夺走!

病中的小振除了消瘦、咳嗽,并没其它症状,他特别珍爱倾注了自己最后心血的作品《没有扶栏的台阶》,他对下岗工人充满了敬意,这些顽强的人群,不等待救助,没有扶栏,挺立着。还写了他(她)们的爱情、面对艰难的欢笑。我告诉他,许多人读了,大赞……他快乐地笑着(病中难得这样笑),说:“我写得动心、动情,含着泪写成的。妈妈,我有潜力,给我时间,我会写出好本子,我需要时间!时间!”他已知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他始终没有住院治疗,甚至不卧床。一日,市领导得悉小振病重,开完会,市委书记、市长、人大政协领导来探望他。他们见到骨瘦如柴没有卧床的小振,齐惊呼,怎么不住院?围着他问病情,怪他为什么不汇报……市长马上批示:安排住院或到外地治疗、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治疗。

晚了!回天无力。

前后半年!振儿走了。他走得艰难,走得无奈!

“告别会”很隆重,送者甚众。哀乐低回,肃穆庄严。人们唏嘘着:“英年早逝,才华洋溢的小振走了。”嚎啕着:小振,小振,你不该走得这么早啊!你还不到49岁!

小振静卧在鲜花丛中,仪容庄重、安详。清瘦了许多,许多,却依然英俊潇洒,只嘴微张着,似有未说完的话。

离我只咫尺的振儿,微张着嘴,他要说什么呢?

骤然,一蓬头垢面的少年出现在我眼前。心一颤,明白了!他要说的是:“妈妈,您真不要我了?为什么非送我到那个地方去?”

这折磨了他一生的“结”,至死未解开啊!

这是他心中深藏的痛,这隐痛,我知道,怕伤他,我小心翼翼。多少次,我想说一声,对不起,儿子,真的对不起啊!但始终未曾。最后那个母亲节,母子相拥而泣时刻,几度张口,我还是咽了回去,担心重病中的他,会痛上加痛。

振儿带着他的痛,隐痛、至痛,要走了。

振儿,在这永别时刻,妈妈要请求你的原谅!我要真诚地忏悔说一声对不起!我明白这已无济于事,但我还要说,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亲爱的振儿!请求原谅!原谅爱你的妈妈。妈妈要对你说“改造”的痛苦、羞辱,你的父母最懂得、最明白,我们是过来人!见证人!我们怎么能把你——亲生儿子,我们的独子,爱子,一个少不更事的,做了错事的小孩,主动送去“改造”!让你在心灵上经受着更甚于我们的羞辱和苦痛!

振儿,你是被你的父母亲自推入“改造”深渊的。并非被迫强制。

爱你的父母,为什么伤害自己的孩子!?那么残酷!那么狠心!……

虎毒不食子!虎狼尚有父爱、母爱,有人性的人呢?我呢?我们呢?

我们——你的父母,做了什么?干了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而自己竟不察觉!荒诞地、愚蠢地,以为出于“爱”!

天底下有这样的爱吗???

苍天啊!

振儿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东南野战军和粟裕的战略决战建议

·  
庄  
重

1948年3月,我军攻克洛阳,歼灭敌青年军206师之后,我作为一名新华社特派记者,随大军西进至新安时,接到一份电报,说有重要任务,要我速来总社。

经数日行军,我于4月初到达河北涉县西戌新华社总社。

## 廖承志的谈话

社长廖承志同志和我初次相见,他像对待挚友一样张开双臂拥抱我,拍拍我的两肩说:“你辛苦了!”他拉我靠着一张大桌子坐下,“我们初次见面,随便谈,可以多谈一会。中午,在我这里吃饭。”

饭后,廖承志才和我谈工作问题。他说,为了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大后方,党中央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陈毅,副司令员和副政委粟裕;下辖两个兵团,粟裕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华野各纵队很早就有新华社支社,廖承志同志对我说:粟司令提名调你和季音同志,加上李扬同志,组建第一兵团分社,你继续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分社电台和其他人员以后由部队负责调配;粟裕同志说第一兵团分社由他直接领导,你们如何开展工作也由他安排。总社意见:东南野战军的番号及其行动都严格保密,有电台也禁止使用,因为一使用电台,敌人就会很快侦察到我军的行踪,对我不利。保守军事机密第一。新闻稿如何传递,另想安全办法。廖又说,你们渡江以后,处境一定极端困难,即使长期不发稿,总社也体谅你们,不会责怪你们。廖社长的一番话,既使我感到责任重大,又感到热呼呼的温暖。为了保密,廖承志讲话,要求我不做记录,但我一直牢记在心。

## 毛泽东:“第二个战略跃进”

在西戌停留一天,我就启程去濮阳。途经邯郸、成安、魏县、大名、南乐,抵达濮阳城郊第一兵团部所在地孙王庄。

与我的老伙伴李扬、季音等见面和传达廖承志社长指示以后,我便去见粟裕司令员,向他报告请示工作。我大约有半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了。粟热情地接待我,与我谈战局和东南野战军的组建过程以及今后作战任务。

原来,党中央为了改变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战略部署,于1948年1月27日决定,组建东南野战军,以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并兼任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叶飞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金明任第二副政委,张震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兵团辖第一、四、六纵队。党中央确定,粟裕率领第一兵团渡过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的作战任务,以吸引中原敌军二三十个旅回防江南;在湖北宜昌、监利之间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在洪湖、沔阳(今仙桃)之间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与敌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建立根据地,以牵制敌人。渡江时间可在今年2月或5月或秋季。毛主席称之为“第二个战略跃进”。

任务重,时间紧迫,粟裕集合和率领了3个纵队北渡黄河,于3月16日全部集中到濮阳休整。

## 粟裕关于战略决战的建议

自接到中央军委关于限期渡江南进的命令以后,粟裕根据当年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2500里且战且走,结果伤亡过半的经验,一直从全局战略上,对敌我军队实力特别是中原地区敌我作战态势,进行对比分析。经过一个多月分析和思考,对南线战略决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见。粟裕认为,我渡江南下部队只有3个纵队,加上随军南下干部近10万人,敌在江南的兵力足以对付我军。彼时我军最多以团为单位分散作战,无重武器,很难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我军遭敌人尾追堵截,甚至围攻,战斗频繁,又是无后方作战,兵员、粮食、弹药得不到补充,伤病员无法治疗和安置,势必要选择几个地方,每个地方留下一个团,开辟游击根据地,安置伤病员。这样且战且走一年半载,行程数千公里,可能还没到达闽浙赣边,我10万人就减员过半,更难以吸引中原之敌回防江南。而1948年初,敌在南线的兵力共有100个旅。在中原战场,敌有34个整编师共79个旅,其中33个旅对大别山区我军(中野)进行全面包围。敌军貌似强大,但“3线16点”即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济南、徐州、海州、连云港、两淮、南通、宿县、蚌埠、开封、郑州、洛阳、合肥、信阳、南阳、襄樊、汉口都置重兵防守,强敌兵力分散,也就变为弱敌了。我一、四、六纵队可暂不渡江。在中原战场,华野有6个主力纵队,中野有4个主力纵队,共10个纵队,约20万人,敌军约25万人。豫皖苏边淮北平原,有利于我军快速行动。敌军虽有许多重武器,如果我将铁路公路破坏,则敌军行动困难。我华野和中野密切配合作战,有其他兄弟纵队和地方部队打援阻援,又有千百万老区人民支援,我军可以充分发挥步行力强的优点,实行远程奔袭,分进合击,聚歼敌人,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将中原之敌主力大部或全部歼灭于长江以北,尔后我百万雄师渡江南进,可以很快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

粟裕把这些思考“成熟”的意见先后告诉参谋长张震和华野司令员陈毅,征求意见,陈毅、张震

都表示赞成。于是,粟裕将这个战略决战的构想写成他个人的建议,于4月17日用电报发给中野刘伯承、邓小平,18日正式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报告。

## 党中央采纳粟裕战略决战的建议

党中央十分重视粟裕“4·18”报告,三天后,毛主席电复,要陈毅、粟裕同赴党中央开会,进一步商量行动。4月26日,陈、粟到达河北阜平城南庄参加党中央的会议。党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出席听取粟裕的汇报,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和采纳粟裕战略决战的建议,当即做出决定:

第一、四、六纵队暂不过江,归还华野战军第一兵团建制,在徐汴南北,配合中野打几个歼灭战,然后南进。东南野战军的番号暂停使用。

陈毅调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任职(后应粟裕请求,陈毅在华野仍任原职不变)。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和代政委,全权领导华野。

毛主席提出:华野要在近期全歼敌整编第五军,即邱清泉兵团。

由华东野战军派出一个纵队(称渡江先遣纵队)渡江,深入江南各省分散打游击,并发动群众,为日后大军渡江作准备。

5月5日,中央下达了中原地区华野部队的近期作战任务:力争4至8个月内,歼灭敌整编第五军,消灭敌军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粟裕立下“军令状”,保证如期完成这一作战任务。

5月12日,陈、粟陪同朱德总司令到濮阳视察第一兵团。5月14日,第一兵团在濮阳东关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欢迎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传达党中央的上述几项决定,提出华野歼敌整编第五军,要采取“钓大鱼”的办法。因当时尚无收录机,粟裕指定我坐在朱总司令的身边做记录,我得以就近饱览这位老师的风采。会后,朱总司令与第一兵团干部合影留念。粟裕要我将记录稿抄好,送请朱总司令亲自审阅,尔后印成小册子发给华野干部学习。1983年,这篇讲话全文,以《目前形势和军事建设问题》为题,编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德文选》。

## 粟裕指挥大军大打歼灭战

1948年5月23日,粟裕和参谋长张震做出歼灭整编第五军(邱清泉兵团)的作战部署,然后率领第一、四、六纵队,两广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从张秋镇和范县之间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的定陶、成武地区,求歼敌整编第五军。为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粟裕决定围城打援,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先攻打国民党河南省会开封,后歼援敌。华野陈(士榘)唐(亮)兵团之第三、八两纵队在中野一部配合下,于6月17日至21日激战四昼夜,攻克开封,全歼守敌3.8万人。两天后,三、八纵队撤出开封,准备歼灭援敌。6月27日,华野又将驰援开封之敌区寿年兵团包围于河南睢县、杞县地区,激战至7月8日,歼敌5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区寿年和整编第75师师长沈澄年。

开封、睢杞两个战役合称豫东战役,我军连续作战20个昼夜,共歼敌9万多人。

豫东大捷后,粟裕率领外线作战兵团转入山东内线,与山东兵团会师,举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济南战役。9月16日晚,济南战役发起,激战8个昼夜,至9月24日傍晚胜利结束,我军占领济南,实现“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全歼国民党军1个绥靖区司令部、1个省保安司

令部、1个整编军司令部、2个整编师师部、10个旅、1个团、4个保安旅、1个总队,共毙、伤、俘敌8.4万余人,起义2万余人,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人,缴获各种炮890多门、机枪5200多挺,各种枪支4.8万多支,坦克、装甲车20多辆,汽车238辆,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40多天后,伟大的淮海战役开始了!敌军出动80万人,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加上地方武装共计60万,大战66天,我军共歼灭敌军55.5万多人,击毙敌兵团司令黄百韬、邱清泉,生俘徐州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总指挥杜聿明、兵团司令黄维等一批重要将领。敌在长江以北的几个主力兵团丧失殆尽。

从1948年6月17日开封战役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我军用了6个多月时间,打了豫东、济南、淮海三大战役,总共歼敌75.5万多人。血与火的实践证明,为党中央采纳的粟裕关于第一兵团暂不过江,与中原野战军集中全力,大打几个歼灭战,力争将敌之主力尽歼于长江以北的战略决战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摧毁了蒋家王朝反动统治的根基,亿万人民高奏凯歌,迎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2009年7月5日写成)

(责任编辑 杨继绳)

SIEMENS

SW 声望听力  
好听力·好生活

#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聩耳鸣的烦恼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A/B

电话:010-84608877 400-610-0896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9030029号



# 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

● 张家康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也就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开始在党内滋生和蔓延。毛泽东断然决定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党、政、军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展的第一场针对自身的反腐倡廉的运动。

## 批转东北局的报告

东北是中共最先夺取政权的地区,刚刚走上执政地位的党的一些干部,在物质和金钱的诱惑下,已经开始纷纷败下阵来。在沈阳市就有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的赃款竟达5亿人民币(指旧币。1955年3月1日发行新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同时,新政权中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官僚衙门的习气也十分盛行。最典型的实例是,东北铁路系统压着上亿元的材料,竟无人过问。

这里必须涉及一个敏感的历史人物,那就是东北局书记高岗。1951年8月31日,他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不久,东北局又正式作出《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规定》。高岗还在东北局党员干部会议上做报告,第一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概念。

1951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高岗报告给全国各地,毛泽东亲拟电报: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

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紧接着,《人民日报》依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公开提出:“全国各地都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展开一个坚决反对贪污的斗争,来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

这时,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泽东在阅读这些报告后,更加确定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在他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告的批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说:“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在阅读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的报告后,他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报告中列举的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前任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犯罪的事实,更是触目惊心。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粮4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1.4亿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苛刻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以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200亿元(以上均为旧币)。他们还勾结私商,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

刘青山、张子善的事情揭露后，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他们。毛泽东完全同意对刘青山、张子善的逮捕法办，并指示《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他还及时将薄一波、刘澜涛的报告批转全国，并在批语中说：“华北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决定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后，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的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

中共中央决定下发后，北京市委和贸易部党组就分别向中央提交了党政工作人员中贪污现象及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毛泽东阅读了这两份报告，当即批转各地，并以十分严厉的语气作出批示，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市委和贸易部党组的报告样式，在一个月内向中央报告当地反对贪污斗争的情况，批语中再次强调：“发动党内外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由此正式开始。

### 三反不反 党就会变质

中央各部委被发动起来，财政部、贸易部、水

利部、轻工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反映，初步估计贪污人数将占机关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他们贪污的方式五花八门，如：出卖财经情报，盗卖国家资财，以权谋私，敲诈勒索，受贿赂，吃回扣，报假账吃空额等等，更有一些单位造假预算，搞两套账、虚报开支、损大公肥小公，以及借口“改善生活”挪用公款等。

毛泽东在答复福建省委办公厅的询问时，以极为严肃地表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甚至说：“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根据土改、镇反的经验，毛泽东原以为通过急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再结合整党整风，三反斗争“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可是，随着贪污案件的增多，他颠覆了自己的计划，三反运动是一个月的时间不能完成的，因为他注意到，这些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已远远地超过了原先的估计。他气愤地说：“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对于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丑恶的现象，他已是深恶痛绝，多次在会上指出：

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说党不会变质，只有进行三反这一条下才有可能。如不进行三反，一样可以腐化。……过去看联共党史，看见开除大批党员，当时了解不深刻，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党才能健康。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震惊全国。他们都是久经血与火的生死考验的老党员、老革命。可是，进城掌了权后，便居功自傲起来，贪图享乐，追求金钱和物质，切切实实地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刘、张一案极具典型的警示和教育意义，毛泽东尤为重视。1951年12月29日下午，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曾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这样的意见，考虑到刘青山、张子善的历史经历，可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毛泽东听后深沉地

说：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亲自抓“三反”斗争，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必须向中央提供“三反”报告，以便让中央作出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1951年年底，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立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薄一波和安子文作动员，要求中央所属各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务必把群众发动起来，开展揭发检举和坦白交代，于1952年1月1日前必须向中央交出合格报告，如若不然，“不论部长、厅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指出，不管什么人，“手上不干净的，一律撤职，撤职后不给饭吃。”薄一波还当场宣布对三名领导干部“撤职查办”的决定。当日会散后，各单位连夜开会，元旦的那天，各部部长、副部长，参加完团拜会就立即回去布置运动，谢绝了所有的娱乐活动。

毛泽东对中央直属机关的动员非常满意，元旦刚过，他便在一份报告中向中央局及分局等党的各级领导推荐，指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而在具体部署上，他要求尽快进入实际的斗争中去，把学习文件的时间缩短到四五天，在十天之内就要把斗争开展起来，并及时将情况报告上来，否则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妨碍运动的，都要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同时委托薄一波与各地负责同志电话联系，“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

毛泽东不主张在三反的发动阶段，给群众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民主者必办。他指出运动的重点是那

些管钱管物的单位，“无论党政军在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迫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都脱离群众，闹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

时至一月中旬，三反斗争的进展，还是不能让他满意，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还没有完全揭露出来，毛泽东着急了，立即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运动之所以发展不平衡，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党内有人担心，揭露出那么多的贪污分子，会不会使基层组织瘫痪，对此，毛泽东却毫不担心，他说：“不要怕，有人接替。垮了是好的，资产阶级堡垒不垮，我们共产党就要垮。牺牲贪污分子和牺牲党与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 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从1952年1月中旬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所谓“老虎”就是当时对贪污犯的通称。当时给“大老虎”定了六条标准：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造成很大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万元以上且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各级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等。

毛泽东同意六条标准。1月23日，他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提请全党全军全国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第二天，他又指示：每个省、每个城市及大军区单位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了败仗。2月4日，他又在《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指出：“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做预算定指标，多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这正反映出毛泽东的焦虑的心情，这种心情正来源于他对新生的国家政权的担忧。

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在送呈的报告上说：“一般财经管理干部中，有些单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贪污，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似乎“洪洞县里无好人”了，这样的估计，当然是夸大其辞的。可是，毛泽东非但不批评，反而明确批示：“这种认识是合乎事实的。”他认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工作量尤为繁重，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亲自落实。秘书叶子龙考虑到毛泽东的劳累，有意减少他的工作量，特意给值班秘书打招呼：“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2月9日，工作人员还将毛泽东请到小礼堂，看了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以让他的紧张劳累的身心，得以松弛和恢复。

“打虎”斗争已如毛泽东所期待的，被各级组织提到议事日程。首先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让到会的主要负责人自报公议，订出“打虎”指标，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如果哪位负责人说本单位没有“老虎”，那么，他就得签字具结，作出保证，然后，上级机关再专门派人复查，以此提醒各级领导勿要麻痹松懈，更不可存侥幸心理，使“三反”运动走过场。

华北军区在运动中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把“打虎”专业化，在五天的时间内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中老虎18只（5000万元以上）。他们的贪污款额总计为65亿。华北军区在送呈的报告中称，这些只是初步的材料，估计“将来挤干净时，有些小老虎必是中老虎，有些中老虎必是大老虎”，并且断言“有一批大老虎尚未捉到”，仍要组织力量，突击追查。毛泽东对华北军区的做法，予以肯定，立即批示全国学习其经验：“华北军区过去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最近五天突飞猛进，捉虎甚多，令人振奋。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

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于是，全国的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打虎队”，由这些积极性极高的队员们专门负责搜寻、清查、批判“老虎”。

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那些用钱不多的机关，如宣传、教育机关和民众团体，就没有大老虎。打虎斗争包括所有领域和单位，没有任何单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显示，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占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8个贪污，其中1个村干部贪污公粮1万斤以上，已够上小老虎。毛泽东抓住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斗争引向高潮，他说：“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毛泽东还向全国党政军党委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

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 清查真假老虎严禁逼供信

在全国性的“打虎”斗争中，由于定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自然使各单位争当先进，惟恐落后批评。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赶，也就免不了逼供信，于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许多假“老虎”，无形中伤害了好人，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偏差。这里仅举两则比较典型的实例。

著名漫画家沈同衡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大会接着小会，白天连着黑夜，人人检讨过关，一些人终于熬不过去，只得主动“坦白”，以求“过关”，沈同衡所交代的金额，使他成为上海市文联的“大老虎”，可是，令打虎队头疼的是这么大的贪污金额，竟超过了上海市美协的年度经费总额。揪出“老虎”时是格外高兴，如今定案处理又缺乏证据，真正的成了“骑虎难下”。

打虎队正一筹莫展时，意外地发现沈同衡的

一幅《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漫画,此画发表于抗战胜利前的重庆某报,当时中共七大已经召开。画的内容是一座七层宝塔,一人正一层一层地向上攀登。此画明明是歌颂中共七大后,中国的未来将一步一层楼,有着光明的前景。可是,“骑虎难下”的人,硬是说这副画是反动的,是歌颂国民党的。于是,沈同衡从经济“老虎”过渡到政治“老虎”,停职反省、隔离审查,继而调离上海市文联。

另一典型则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青。他的大姐毛泽建自小就过继给毛顺生,成为毛泽东的妹妹。1937年10月,毛泽青去延安找毛泽东,自此参加革命,并化名毛万才,无人知晓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参加革命后,他一直做经济工作。1951年5月,调任东北军区某陆军医院会计股长,后又改任供应股长。

毛泽青一家数口,全凭他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家境比较艰难。“三反”运动的那年,同事们发现他突然“阔”起来了,身上披着毛大衣,腕上也戴上手表,家中又添置一床毛毯。如此招人显眼,自然成为运动的怀疑对象。打虎队的人找他谈话:你收入不多,妻子又没有工作,哪里来这么多的钱显摆?是不是利用工作之便,从中……他很快便被怀疑有贪污行为,立即被隔离审查。此时再也不能隐瞒了,只得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并如实交代:自己的原先姓名是毛泽青,自己是毛主席的堂弟。主席见自己收入底、家境差,才从自己的稿费中汇来300万元(旧币),让添置日用品。毛泽青的冤屈这才得以澄清。

毛泽东已经关注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一面强调进度和指标,一面又在不断地调整政策。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还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当时,鉴于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们贪污的金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考虑到

扩大教育面,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处分。在对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时,毛泽东也主张更宽大一些,在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的处分外,他还特意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正式颁发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这个规定本着“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明确提出要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贪污分子:

凡贪污未达100万元者,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保证永不再犯,不作贪污分子对待,也可以免于处分和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超过100万元而未达1000万元者,只要情节不恶劣,彻底承认错误,可免于刑事处罚;凡贪污超过1000万元而未达1亿元的贪污分子,可依其情节轻重,坦白认罪态度,退赃及检举主动情况,分别予以适当的处分,或免刑予以适当行政处分,应尽可能追缴贪污款物。凡贪污1亿元以上,一般视其情节而给予不同的刑事处罚,追缴贪污款物;他们之中如有主动坦白退出赃款赃物,有检举立功表现,也可免刑,改为行政处分。

“三反”运动已进入后期定案阶段,毛泽东重视落实政策,纠正运动中的错案,指示:

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是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定案,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三反”已经过去快60年了,回首新中国初建时期的那段斗争经历,它对于树立正气,抵制歪风邪气,在共产党内部防腐拒变,树立共产党的威望,奠定新中国的基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无论给以什么样的积极肯定,都是不过分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1978 年上访记

• 冯冠扬

1978 年春天，我在山西农村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报告”的消息之后，敏感地意识到我有出头之日了，二十多年的罪也受到头了。

1957 年 6 月 22 日，我在河北宣化工作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因而被打成右派，时年 20 岁。后来因为我父亲解放前给陈立夫领导的“导淮委员会”当会计主任，因此定我为官僚家庭出身。1958 年 2 月 2 日被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 8 年徒刑，送龙凤山采石场劳动改造。1966 年 2 月刑满释放后，仍戴有现行反革命帽子，被送到山西省阳曲县的一个小山村里监督劳动改造。1976 年经村里的贫下中农审议批准给我摘掉帽子，但仍留在农村里劳动就业，只是不受管制了，比戴帽时有些“自由”了。

判刑后，因为有很多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严重与事实不符，有些更是“莫须有”罪名，所以我向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后被中院合议庭驳回，维持一审判决。在劳改队里我也几次

提出申诉，换来的是“你再不服判决无理取闹，给你加刑”！

粉碎“四人帮”后，我曾多次用双挂号信函向宣化区革命委员会寄去申诉材料，大喊冤枉，要求对我的案件进行复查，但每次寄出的申诉材料，都如同泥牛入海，没有一点消息。公社里的邮寄员在办理挂号邮件时说：“你办这些事靠写信根本不行，必须亲自去河北才能解决问题。”这时有些和我一起下放到农村改造的“四类分子”，有的跑到太原去落实政策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离开山西农村外出上访。

## 去太原

我当右派那年才 20 岁，还没有结婚。劳改 8 年，在农村被管制 12 年，这时我已是 40 岁的人了，但仍然是无牵无挂的光棍一条。收拾了几件替换的衣服，拿了一条毯子，随身带了 80 多块钱，把窑洞的门一锁，钥匙交给房东，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告诉他我去太原落实政策。

还有点事需要说明，当时父亲在山西省商业厅工作，所以 1966 年我刑满释放之后，仍戴有“现行反革命”帽子，劳改队派人把我送到太原，交给当地派出所管制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太原市疏散人口，把我连同其他“四类分子”统统疏散到农村，我被送到阳曲县东凌井公社河村大队花沟小队，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在那里呆了 12 年。

到太原后我住在当教员的妹妹家中，父亲在文革期间去世了，母亲随妹妹一起生活。我先到山西省革委会信访处，上访的人真多，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等了半天接待人员答复我说：“我们不管你的事，只管山西省内的案子，你的事得回河



党政机关认真接待群众上访



北省解决。”我碰了一个钉子回来,又到太原市公安局庙前派出所,是他们把我疏散到农村去的,“右派”摘帽了,应该叫我返回太原。派出所的所长答复我说:“我们是执行单位,是河北省给你戴的帽子,我们按‘四类分子’对待你。你只有回河北才能解决问题。”这位所长的一番话给我指点迷津——只有回河北去,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母亲和妹妹都坚决不同意我回河北上访。母亲说:“你戴了十几年‘帽子’,弟妹们也受很多株连,这回好不容易把‘帽子’摘了,就安生的过日子吧!你不服气闹上访,再给你戴上帽子,我们全家人就不认你了!”妹妹也在一旁劝我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反右运动中受委屈的人多了,不只是你一个,你就老实安分点吧!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你,缺什么东西上这来拿。”多么令人伤心难过的劝阻,这一代人被历次运动吓破了胆,他们认为你越不老实,越不服,越要对你实行专政,直到你服了为止。那时我有一个弟弟在太原一家大饭店里工作,有一些上访的人生没有着落,到饭店里帮助收拾碗筷干些杂活,捡些客人吃剩下的饭菜填饱肚子。他们有时也和饭店的职工谈谈上访的经历,比如坐火车、坐汽车都不买票,向售票员说声我是上访的,售票员就不管了。还有些人到过北京上访,说了很多北京的情况,因此弟弟主张我到石家庄上访。他懂得政策,决不会因为我一上访再戴上帽子。他给我些钱和全国粮票,并给我买了一些路上吃的烧饼,送我到太原火车站。我没有买车票,虽然身上有钱,但前途未卜,不知道上访的路有多长,能少花尽量少花。

## 去石家庄

从车站后边,我拎着小包走进了站台,一会儿过来一列从西安到石家庄的列车,我随着人群登上了车厢。人不多,找个空位坐下,列车行驶了一会,车长开始查票。当查到我时,我说:“我是上访的,没有买票。”并随手掏出了我的上访材料,他扫了一眼装在衣兜里说:“一会到8号车厢去找我!”随后又忙着查票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找到8号车厢车长办公室,他正在专心地看我的申诉材料,看见我来了,把材料还给我说:

“我们是凭票坐车!”“我到石家庄上访,没钱买票”。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是凭票坐车!”然后说:“你上访的材料太简单了!”我为了便于坐车出行,简单地写了一个申诉书,上面写着:“冯冠扬,男,40岁,因‘现行反革命罪’冤案到河北省革委会落实政策,1978年5月13日。”“我有详细的申诉材料”,说着从身上掏出了我的申诉书,车长也没有看,就办自己的事了。我又站了一会,他也不管我了,然后我回到座位上,坐到石家庄车站。

到石家庄已是夜里11点多钟了,我没有跟随旅客出站。为逃避出站时查票,我从车站旁的一个小门出了石家庄站。车站上的人很多,一些人躺在候车室里睡觉。我也找了个空地,铺上毛毯躺在上面,但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洗洗脸,漱漱口,坐头班车到河北省革委会信访处排队等候。信访处的接待人员看了我的申诉材料说:“凡经过法院判决的案子,归口到省高等法院去解决。”随后发给我一个路条,上面印着坐几路车到省高院的路线图。我按着路条上的走法到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信访处”。填好了表,交上了申诉材料,在外面等着接待人员的传唤。等到11点40左右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男接待员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这时其他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回家了,在路过他门口时别人问他:“怎么还不下班呢?”他说:“处理完这个案子就走!”他草草地看了我的申诉材料说:“你的案子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不会有什么出入,法院判案是严肃的,即便有些差错,也与大局无关,不会影响判刑。现在群众给你摘了帽了,不受管制了,你回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不要到处上访,对你没有好处!”几句话把我给打发走了。

出来上访时我的情绪很高,希望自己的冤案能够平反,这下给我当头一棒,受了很大的挫折。这时我想起母亲和妹妹的劝阻,不要我出外上访,这下碰了个钉子,怎么办呢?是回山西农村老实地劳动干活,还是到北京继续上访?我考虑了很久,一不做二不休,已经走上了上访之路,决定再去北京上访。

## 去北京

没有心思在石家庄逗留,下午赶到了火车

站,仍没有买票,从昨天出站的小门里混进了站台,坐在树荫下等待去北京的火车。不大一会儿,开来一列成都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停在站台旁,乘客下完车之后,列车员把在门口,对乘客逐一检票上车。我没有车票,列车员肯定不让上车。等乘客全部上完车后,火车马上就要进京了,列车员开始打扫车厢外面的卫生,有的喷水,有的擦玻璃。列车在石家庄站停车15分钟,车上的乘客下车买食品、冰棍,在乘客上上下下之际,列车员也不管了,我拎着包乘机上了火车,找个空坐下来。不大一会儿火车开动了,特快列车上不查票,2小时中间不停就到了北京。

坐在车上我自己考虑,如果能给我落实政策,那是求之不得的事,一旦像在河北高院那样碰个钉子,我就不回山西农村了。过去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全家人都受株连,不去农村不行;现在帽子摘了,上哪儿不愁找碗饭吃。

火车在北京站停稳后,我没有从检查口出站,因为无票乘车,肯定会找些难堪。在火车快进北京站时我就看好了出路,从火车站南边绕到崇文门,再走一段路就到了站前的广场了。那时北京站前进京上访的人真多,有男有女。有穿得干干净净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有穿着旧军装胸前戴满军功章的转业军人,有一身农民打扮的老者,有衣着褴褛的“叫花子”,有邈邈的残疾人,也有衣着入时的青年男女……他们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向中央各个部门申诉自己的冤情。据说华国锋主席从北京站坐火车到朝鲜访问,看见车站上这些各式各样的人,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随从人员告诉华主席说:“他们是上访人员。”华国锋说:“这些人从全国各地来京上访,必定有很大的冤情,通知信访部门要很好地给他们落实政策!”

很快我在北京站上找到了一个同病相怜的上访者,他是河南某县商业局的干部,因为右派问题劳教了几年,后来又下放到农村,转来转去现在连户口都没有了。他来北京上访一个多月,各个信访部门的接待站都去过,知道从北京站坐几路车,怎么走法,是个“上访油子”。最后公安部信访处答应他,只要回河南愿意去哪个县都给他落户。他不愿回去,在北京呆个时期再说,反正一个人吃饱,全家人都不饿。说着天黑了,他要找个

地方吃饭去。我从提包中拿出几个烧饼,叫他敞开肚子吃,不要客气。他一边吃一边说:“还是咱们难友好,讲义气。”

吃完饭我俩又聊了一会,各自说说上访的原因。到晚上十点多钟,他带我到车站二楼的候车室里,躺在没人坐的椅子上睡了一觉。

天亮了,北京站里有洗漱的地方,有开水喝。我俩又吃了两个烧饼,他领我到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去上访。从北京站坐上20路汽车,上车后他主动向售票员打招呼:“我们是上访的。”售票员也不再要我们买票。到天安门广场下车往东走了一会,就到了正义路1号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院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争先恐后的领登记表,趴在一溜长桌子上填写,填好之后交到工作人员手里,等待工作人员挨序叫号。我想这么多人什么时候才轮到叫我。陪我同来的那位“老右”,碰到一个河南老乡,他乡遇故知,俩人谈得来劲哩。他和我约好办完事一起回车站,怕我初来乍到的认不得路。

等了一会,小门开了,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同志把我叫进了她的办公室,屋里地方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我俩面对面的坐着,她认真地看着我的上访材料,随后她问我:“你是什么成分?”“我是城市平民,可判决书上硬说我是官僚家庭出身。”“你父亲在旧社会干过什么事?最高职务是什么?”“我父亲是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学生,解放前当过导淮委员会的会计主任,解放后在山西省商业厅干部学校教书。”这位女同志听了我的回答“哼”了一声,从她哼的一声中,我听到了希望,感到我的问题能得到解决。我父亲解放前的官职,充其量是个处级干部,根本算不上什么官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人划成不同的阶级成分。同一个人,阶级成分不同,问题的性质就大不一样。有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则变成了敌我矛盾。我的阶级成分变了,案件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

那位女同志认真地看完了我的申诉材料之后对我说:“我们只对省高院,一般不对地方法院,考虑到你在石家庄和宣化之间来回跑很不方便,我给宣化法院写一封信,叫他们对你的案件进行复查。”这时我一颗紧绷的心总算落到肚子里了,我从农村出来上访就是希望复查我的案

件。

女同志把信写好之后,又到旁边的办公室里盖了一个公章,然后装到信封里用糨糊粘好,交到我的手里,我向她鞠了一个躬表示感谢。

我离开了办公室,不放心信上的内容,要是写些对我不利的話,是不能交给宣化法院的。趁着糨糊还没干,我把信拆开看了看。上面写着:“宣化区人民法院:冯冠扬来我院上访,希你院对他的案件进行全面复查。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章),1978年5月15日。”我放心了,然后小心地将信封粘好,装在贴身的口袋里,找到了河南的那位“老右”,一起回到了北京站。

北京站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它有几个特点:一是不要介绍信,不用登记,不收费就可住宿;二是地铁、公交车非常方便,可通往北京各地;三是洗漱、饮水方便;四是二楼上有餐厅,上访人员可以捡剩饭剩菜吃。所以上访人员无论到哪里都是“蹲车站”。

我上访进行得很顺利。回北京站后河南“老右”说不吃烧饼了,他要带我去车站二楼餐厅吃饺子。他叫我找个地方坐下,然后他就到餐厅里到处找,看见别人吃剩下的饺子就倒到一个盘子里,一会就端了满满一盘饺子来和我一起吃。他一边吃一边说:“捡人家吃剩下的饺子也不算错,不然服务员端回去也是倒,我们吃了省得她们去倒,还节省粮食。”我说:“我可不好意思去捡。”他说:“你还不到时候,拖你半年时间不解决,身上的钱花光了,看你怎么办?”吃完饭,他像东道主似的带我到王府井、天安门广场逛了逛,晚上仍然由他去“捡”饺子吃。

第二天,河南“老右”说:“游泳池那里还有一个邓小平办公厅接待站,负责接待上访人员。”又由他领我去“邓办”。“邓办”门口有两个持枪的解放军站岗,非常威严,但不阻拦上访人员。进了二门就是“邓办信访处”,信访处办公室的门关着,由几位穿着军装的接待人员站在窗口,只接上访人员交来的申诉材料,不听本人的陈述,交了材料就叫离开窗口,再接待第二个上访者。我交了早已准备好的上访材料,有点不放心地问:“这就行了?”接待人员说:“行了,我们负责督办。”后来我回宣化落实政策时,“邓办”真的把我的上访材料转到宣化,督促办理我的案件。

向“邓办”交了我的上访材料之后,又在北京逗留了两天,20多年没有来北京了,来一趟也不容易,反正现在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花钱,这回也算来北京旅游一趟。

## 回宣化

我拿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批文”,急于回宣化落实政策,不愿在北京逗留了,准备从永定门坐车回宣化。临走时河南“老右”说:“别看你来得快,走得快,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地方给办不办还是另外一回事,第二次、第三次上访的人有的是,上头批了,底下顶着不给办还得回来。”

我仍然没有买车票,最高人民法院的信函好像通行证一样。坐永定门车站到张家口的火车,晚上到了宣化,在车站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走进了阔别20年的宣化。

我到了宣化区人民法院,院长接待了我。他看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信后对我说:“我们这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刚刚筹建,人员还没有配齐,暂时还不能开展工作。你先回家吧!等到时候我们找你。”真应了河南“老右”的话了,“上面批了,底下办不办还是另一回事。”我说:“我没有家,回哪儿去?”“你从哪来的,还回哪儿去,等我们叫你再回来。”他要我走,我不走,俩人僵在那里。我要求再回看守所,他说:“看守所不是旅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又僵在那里,双方都不说话,后来进来一个老干部,听见我们的对话,为打破僵局说:“你过去的很多同事,现在都当了厂长、经理,你去找他们想想办法。”我知道再去看守所是不可能的事,就照那位老干部的提示,去找过去的老同事想办法。

经过这些年的反思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一些老同事都认识到当年对我的处理太重了,太过头了,还有些人这些年失去了联系,以为我死了,这次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真是感慨万千啊!

在一位老同事的帮助下,我在煤运公司当了一名临时工,每天一元八角工资,有食堂吃饭,有宿舍居住,直到1979年春天才给我摘掉右派帽子,冤案平反,恢复工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 2009 年第 11 期署名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读后令人震惊。难以按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看法函告，并请在《炎黄春秋》予以澄清。

众所周知，1969 年 10 月 17 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强行从北京送到河南开封秘密关押，26 天后在开封市北土街 10 号含冤逝世。而这篇文章从小标题到文内叙述却一再说，当时把刘少奇同志送到了洛阳，“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史实。不论叫匪夷所思，还是称重大失实，仅凭此硬伤，就可对整篇文章严重质疑。用作者自己的一句话回敬正合适：“真伪不言自明”！

国家主席之死，无疑属于党史、国史上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而刘少奇之死，尤为特殊。贵刊对此不仅不认真审查，甚至未稍加核实，轻则可谓失察，说学风文风极不严肃，也不算过分吧？

此文还说：“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实事求是地做医疗工作”是什么意思？很含糊。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要说刘少奇生病还能像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是不可能的。顾文自己也说，为刘看病的医务人员“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据刘少奇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 1967 年春以后（顾文讲他是 1968 年初才调回），经常要多次打电话到中南海门诊部，才能派来医生。即使在刘少奇病中，卧室中都挂着“打倒”大标语。当年的记录中就有，医务人员要求摘掉标语，但被监管方拒绝。1968 年 3 月以后，刘少奇病情严重，出现明显的精神失常症状。

顾文描述“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病态”。4 月 2 日一位医生竟在病历上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病历中出现这样的文字，正反映了当时政治高压下少奇同志所处的医疗环境，同时也恰好反证了病历记录并非像顾文所说的“无懈可击”。5 月 19 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还说，刘“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置身这样的环境，不敢想象少奇同志是什么样子，却可以想见医务人员的两难和艰辛。这也印证了“实事求是的医疗工作”是一种什么状况，确实“真实可信”（顾文的话）！

作者对《驰骋中原》中的一段话很有意见，特别加以反驳。我们没看过《驰》书，仅就顾文的批评再批评。为方便读者，让我们挑两文中的几句，拆开来简明对照：

引《驰》书：“从 1967 年以来，少奇同志……生活无人照顾……”顾文讲，工作人员“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公事公办”。——还是让我们看看当年 12 月 20 日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刘处生活有明显变化。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改为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有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能减就减，还准备进一步缩减刘每天服用的安眠药，茶叶也不用了。”再如，1968 年 4 月 12 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近几天来，刘吃饭减少，有时只把菜和汤吃了，饭一点不吃，尿了床既不换衬裤，又不晒被褥。”“已有两个月没有理发。”“公事公办”嘛，不知与《驰》书说的“无人照顾”是不是一码事？

引《驰》书：“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68 年 7 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

诊。”这里，先摘刘少奇子女文章中的一段，也是根据当年的记录而概括：“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肺炎，并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与《驰》书讲的大体一致。对照顾文，“1968年6月初他（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之后，“护理”、“上报”、“指示”、“会诊”、特护、抢救。与《驰》书“病情加重，请求上级，组织会诊”的话没大出入。——真要细究，恐怕顾文表述不无纰漏：“受凉小病”，“疗效较差”，“感冒”月余，“病情渐重”，三天后才“诊断为肺炎”，抢救中又病危！说“得不到及时治疗”，似不为谎言。

再看一段《驰》书：“监护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几个月。”顾文点出这句话，却没有说究竟捆没捆？为什么捆？只是指责《驰》书作者“没有进过中南海”，“没有看到过”“抢救工作”，“根据什么写这样一段文字”？——这种反驳法儿，可有点成问题。正是在顾文中，说到“周总理指示留下”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无巧不成书，在他特别点到“双眼明亮”的那张相片上，恰恰就赫然露出少奇同志被捆在铁床架上！不过，不是普通“绳子”，而是纱布拧成的粗绳！

顾文中还着重评论了一句敏感话。抢救刘少奇时中办负责人说：“现在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顾讲，他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指示，“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意思是他不知道，似有疑问，但又不否认有此话。既然如此，本文也不便啰嗦，仅多一句嘴：说这话的可不是“下边”人，张三李四、有名有姓，时间地点、记录在案！

仅仅以上这点儿，足以说清问题了。

少奇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各种迫害，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从没见过哪个人在哪篇文章中，把迫害虐待的责任归罪于医务人员。除了顾文，也没见过哪里曾把医疗迫害单列出来。相反，我们倒是不只一次亲见，王光美及子女感谢少奇同志临终前身边的护士——曹兵、纪秀云，

并通过她们向所有当年的医护人员致意！真的很难理解，顾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

作者以重要知情人、现场负责人的身份来讲述，想当然“可信度高”；再加上信誓旦旦，更必然引人注目。然而，当事人往往易偏，凭记忆常常有误。不是吗？仅写“每天吃六个鸡蛋”，不说只给“萝卜、白菜一菜一汤”，总不大全面吧？明摆着：当年是谁亲自派人把刘少奇送到开封？今天，几次三番、言之凿凿，白纸黑字、错写洛阳。若非当事人，没那么自信，恐怕也不会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文终，他写道：“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是正说？还是反话？看过全文再审视这一句，反正都感到讽刺意味！

《炎黄春秋》登载此文，确实够有胆量！够耸人听闻！但忘了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对明显违背常理、常识的作品，我们理当慎重，起码应找有关单位或个人稍加核实，仅仅以“文责自负”来搪塞，丢分毁誉的，可是自己。

我们知道，贵刊对文革深恶痛绝，而少奇同志又蒙冤最大，受害最烈。今天，我们既要力避对害人者横加追杀，又不能为文革整人者辩护张目；同时，至少还得小心，别给受害一方添堵加伤，不对挨整的逝者再予玷污。否则，谈何正义？进一步联想，少奇同志是今天改革的先驱，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付出了生命。从道义上、道德上，我们对多奉上一层尊重，也就给我们多留下一分自重。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还是贵刊！

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古人、死人、伟人都已无所谓，而对今人、活人、凡人，可真大有所谓！

《炎黄春秋》敢发顾文，当然就敢对其中有错、有伤、有缺之处加以更正和补充，不在话下！相信贵刊有勇气将我们的信全文刊发。

此致

敬礼！

黄家生

2009年11月24日

（附言声明：写此信，纯属被迫！文革中迫害少奇同志的责任，不能归罪于医务、监管人员个人；本文复述记录，谴责惨剧，绝无追究这些同志之意。）

# 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

• 李 超

刘少奇怎么死的？是在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这是客观的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一再肯定的，也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或抹煞的。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明确指出：“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的是“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1980年5月17日，邓小平同志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也指出，刘少奇遭受的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然而，不久前《炎黄春秋》却发表了一篇题为《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的文章（以下简称《抢救》）而且有多家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对刘少奇遭到残酷人身迫害的基本事实避而不谈，却大谈什么“抢救”刘少奇，从根本上误导了历史事实。

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传》对刘少奇逝世的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〇年九月的统计，因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达二万二千多起，有二万八千多人被判刑。刘少奇的家人更是首当其冲。他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正式逮捕，十一月转往秦城监狱，关押了将近十二年。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一九六七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受到造反派批斗毒打，并被长期关在“牛棚”。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一九六七年初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八年，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得病，出狱不久就死亡。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四个尚未独立生活的子女，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赶出中南海，三个已经上学的分别住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最小的女儿当时只有六岁，还没有入学，只好随保姆搬出另住。十八岁的女儿平平和十六岁的儿子源源后来也遭逮捕关押。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十月十六日同时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号

召进一步开展针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这篇社论采用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刘少奇有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北京和各地的报刊紧接着发表大量所谓“大批判文章”，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刘少奇这时仍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祿居住处。精神上的沉重折磨和生活状况的骤然改变，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一九六八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三月以后病情加重。到四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旬，刘少奇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病情日益严重。这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一些医疗机械，就地救治。经过抢救，刘少奇到七月二十四日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这次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病情一直不稳定，支气管炎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十月九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中南海门诊部写的《刘少奇病情报告》说：“从七月上旬患严重支气管肺炎以来，一直不断有反复，三个多月较大反复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时刘少奇已重病缠身，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很弱。尽管如此，负责看管刘少奇的人员还是奉命不让他收听广播。七月五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又一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



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紧张治疗，病情才暂时稳定下来。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动态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

这件事从决定到执行非常仓促。十月十七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担架，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型飞机，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由于刘少奇病情沉重，身上还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所以派了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刘少奇原来的卫士长随同前往。

当晚九点三十分，飞机抵达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安置在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北楼一层一个套间的里屋，现场还布置了严密的看守措施。

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

十一月十日，刘少奇的病再度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十二日凌晨一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在六时三十分紧急通知医护人员抢救。六时四十二分医护人员赶到，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六时四十五分，将满七十一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去世的情况被逐级上报，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出人员赶到开封处理后事。十一月十三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运往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专案组人员在登记“火葬申请表”时，“死者姓名”填了“刘卫黄”。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骨灰盒里，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

尽管这一叙述非常严谨，对具体细节的表述也很简略，但与《抢救》所叙述的情况截然不同。两者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在“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下，刘少奇的健康状

况迅速恶化。原来他的体质还是不坏的，直到他逝世时，还不满71岁，而且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也都不是不治之症，如果及时给以有效的治疗，怎么会越来越严重。

二、从1968年初刘少奇发病到7月间，也就是时隔半年之后，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7月5日“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认为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建设住院治疗，而这一建议竟“没有得到批准”。这哪里是《抢救》作者所说“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

三、1969年7月刘少奇发病后，虽然一时脱离危险，但没有根本好转。1969年7月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只能卧床。10月9日以后已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刘少奇的病情报告也说：“可能随时发生死亡。”在这种情况下，10月17日晚，还要把身上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已是危在旦夕的刘少奇，硬是用担架抬上飞机，运往开封。刘少奇到开封后病情更加恶化，而从北京护送来的医生、护士未等病情稳定就撤了回去，五天之后，刘少奇就去世了。

四、《抢救》作者说什么对刘少奇的医护“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的”，还说什么刘少奇病情恶化“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这种结论是否符合实际，我相信医疗专家，甚至是普通的老百姓都会作出正确的判断。刘少奇因脑血管发生病变，行走困难神志不清后，医生竟在病历中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刘少奇去世时，头发竟有一尺多长，对刘少奇的护理是怎样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抢救》的作者在文革中是康生的保健医生，不知作者对刘少奇和康生是不是采取同样的态度。

总之，《抢救》一文回避或掩盖了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这一基本的事实。当然，有些医务工作者，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医护工作也是事实。但是，当时的当权者，除个别例外，基本上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极左路线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凡是经过文革的同志，对这段历史都记忆犹新。但是现在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同志，可能就不大了解当时的情况，再加上近几年揭露批判“文革”错误的文章越来越少，因此，更有责任把当年所发生的一切，给年青一代讲清楚，我们要世代永远牢记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

(责任编辑 杨继绳)

#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 黄 钟

##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收音机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了么？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

也亏纳粹当局想得出来。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纳粹当局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许多广播节目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不都能够收听到广播了么？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当局强行这么做，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是戈培尔并不因此改弦易辙，在他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

可是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

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美国著名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

被希特勒轻蔑地称为“小蛆虫”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台了。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戈培尔指使部属：“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这样炮制和筛选出来的消息除了可以误导德国人之外，还有什么用呢？

而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1940年11月11日，罗斯福的停战日演说在德国被严禁播放。夏伊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的讲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这

是民主的一个弱点,我想;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可现在就在第三帝国的新闻报道而言,只有纳粹党一家在王婆卖瓜了,她想怎么夸就怎么夸。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过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不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诚实的政客?但第三帝国可能跟美国英国有所不同,罗斯福的一句话可能招来一万句的反驳,而戈培尔和纳粹党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可以唱反调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戈培尔依旧把德国人民当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戈培尔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大局出发——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在准备将字旗换成白旗,戈培尔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说自己“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那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这位跛子还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对听众们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这自然是戈培尔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

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这可真是一语道破了第三帝国的天机。

至于戈培尔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并不重要。那些掌声里有多少是逢场作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戈培尔视他们为白痴,其实,对戈培尔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

在极权政治的世界里,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哪家报纸公开披露第三帝国的阴暗面,那就是为反对德国的敌人提供宣传资料。当然,人们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同样地,面对境外的批评,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于是,第三帝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却在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

当时的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了一样。1935年,美国大学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头看到,商店门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谁在犹太人商店里买东西,谁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饭店或者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那人可能会暗示他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辩白说,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或者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



复了德国的自尊,或者说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等等。如果这位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就很容易引导了美国也有私刑,或者大西洋彼岸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地方,似乎一夜之间,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

痼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他“征服”成啥样呢?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

还别说,戈培尔的忽悠还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实际上,这位护士小姐之所以会这么看,并非只是戈培尔宣传的力量使然。这位妇女难以接触到纳粹当局反感的各种信息,就是因为有强权的存在。当年《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不仅文攻心,而且还武攻

身。

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也取消了。纳粹对付异己分子有的是办法,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词地声称:“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感受不到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伤害,但他们要在第三帝国活下去,就得心里清楚,马王爷几只眼。而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一来,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忠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却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对于不少人来说,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呗。不让写现实,我就写点历史;不让写真实生活,我就写田园牧歌……只要不肉麻给纳粹统治唱赞歌就行。第三帝国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

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斯塔尔出马，就是例子。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该片在柏林乌发剧场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

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

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而戈培尔战前许可引进的好莱坞影片却门庭若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之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也会有票房业绩不俗，戈培尔和投

资商都皆大欢喜的大片。

同样地，纳粹德国也不是像《民族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一统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报业，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麦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相对于英美国家，德国人的政治自由只是个多少的问题。而到了第三帝国，连这一点，都俱往矣。《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著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歿。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第三帝国的宣传部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密令的内容无非是用谎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跟他的教化和宣传部并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报刊被读者不喜闻，不乐见。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可是，大人物嘴里的那些漂亮话，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哄哄没有头脑的人，怎么能够当真呢？如果不要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

为了让纳粹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韦尔克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不仅如此，新闻媒体还成为纳粹震慑德国人的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国的末日迫近，戈培尔还把新闻报道当成一种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一种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心理战的手段。

因为战火连年，德国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的措施”镇压。他要求临时法庭立即审讯“首恶分子”。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地判处了一男两女死刑。

因为戈培尔认为其中一个女的案情要轻一些，决定饶她不死。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

换言之，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

（本文原来资料来源 32 条注解，若读者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作者系中国改革杂志社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鹰）

（上接 87 页）有警卫军官。

第七，牛辉林说“老人带她回湖南老家结婚度假（婚假是中组部长安子文在老人家中当着聂元梓的面给陆平打电话要的）”。肯定的说，没有一个南征北战几十年的高级老干部回农村老家结婚度假的。这事只要问一下两个人的单位就清楚了。牛文写了很多有声有色的细节，好像他在身边看到了一样，其实都是虚构的。

第八，我从来没有说过吴概之是彭（德怀）黄（克诚）分子大黑帮。

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前方都是在彭总率领下与敌人战斗的，黄克诚不仅是我的领导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在战争中，无医无药，我的生命处于危在旦夕时，是他派军区吴部长给我开刀挽救了

我。我怎么能说他和彭总都是大黑帮呢，而且我还与他夫人唐棣华同志一起工作，她是区委书记，我是区委副书记，他俩都是我感恩不尽的领导人，有人这样的造谣诬蔑使我十分的痛心。

第九，“5·25”大字报不是我个人写的，牛辉林说的“不知当时在北大做秘密调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轶欧给了他什么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后来亲自批示的‘5·25’大字报”。没有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也会产生，毛主席决定对“5·25”大字报的批示广播，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决定的，与曹轶欧无关。没有曹轶欧和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同样会被批示广播的。

2009年4月21日



# 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

• 聂元梓

贵刊 2009 年第 1 期刊登的牛辉林《夜半抄家记》一文严重失实,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及名誉诽谤,仅举几例如下:

第一,牛文说:“……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 8 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北京大学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接见时,指示由我负责组建并用巴黎公社选举方式产生,领导校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并不是一级政权组织。

北大不存在以我为首的左派团队。1966 年“5·25”大字报是哲学系尚未到农村参加四清的几位教员和干部,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根据北大长期在左倾思想领导下,历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派、反右倾、社教运动……)中,群众的积怨而写的大字报。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写大字报的这几个人并不是一个什么组织,曾有人说:“当时我们都下去参加四清了,如果在校我们也会签名的,那就不是七人大字报了。”

江青、康生在北大群众大会上是讲过“张承先工作组走后,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话,但北大文革委员会不是“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成立的”,而是在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同志亲自领导下,于 9 月 9 日选举产生了 42 名正式委员和 10 个候补委员组成的。(见《北京大学纪事》第 651 页)

第二,我没有叫姜同光给牛辉林打过电话,让他派北大红卫兵到我家撵吴概之子女为首的在我家闹事的红卫兵。

我知道吴概之的儿子与两个学生一天上午到我家来过,当时我不在家,回家后是保姆彩兰告诉我的。王梦兰也证明。此后,我再不知道也没

有见过吴概之子女带领一伙红卫兵来我家闹事。我的儿子放学回家吃晚饭,也没有见到这伙人。那就用不着让牛辉林用大汽车把他们拉走了。

第三,陈葆华不是我的秘书。她没有陪我到牛辉林的“北大红卫兵总部”办公室(当时是叫红卫兵联络站),当然没有我对他那长篇谈话。

其实牛辉林抄吴概之家的全部情况,陈葆华早已向我汇报过了。她跟着去就是看管牛辉林不要出大问题的。当时吴概之由儿媳(穿着军衣)搀扶着应对牛辉林抄家的行动。文件柜已经由他的单位查封,但牛辉林还要启封检查是陈葆华阻止的,红电话机已由单位停机,根本没有我叫“陈葆华同志让你半夜拉吴概之到中组部门前的大街上批斗”的事。

第四,牛辉林说我让北大派人把吴氏兄妹俩送到中南海去交给总理和“康老”教育。我没有中央的电话也没有这种资格叫总理来管理吴概之的子女。康生我从来不称他“康老”。

第五,牛辉林的文章把我写成一个品质恶劣的小偷,不仅偷走了吴概之的古董古玩等珍贵物品,连笔、墨、纸、砚都偷。吴概之的亲朋好友肯定都知道他没有这些东西。他从来不写大字更不玩古董古玩。1968 年军队抄家证明我家没有抄出一件珍贵的物品。牛辉林还说,刘亚楼将军送给吴概之儿子结婚的贵重礼物“一只女手表”我从吴概之手中拿走,故意摔坏后交还。纯属子虚乌有。

第六,牛辉林还说:“……成了整肃对象的聂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计调离北大”,又说聂元梓“认识吴概之老人后,便把调离北大给老人做秘书作为嫁给老人的条件。”把我说得那么低三下四。这是牛辉林毫无根据的猜想。

吴概之没有秘书,家中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司机、一个厨师。没有警卫人员更没(下转 86 页)



# 风雨人生 家族文化

——三千元起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家史传记

## 出书范围

### 一、个人出书：

1. 传记作品：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回忆录、自传。
2. 个人文集：诗、文、小说、散文、随笔、书信、日记、文章合集。
3. 学术著作：思想理论著作、专业学术著作、旧文结集。

### 二、公共纪念文集：

1. 怀旧文集：历史人物纪念集、历史事件回忆录。
2. 纪念画册：先烈纪念簿、同学校友录；知青像册。

### 三、家庭、家族出书：

1. 先辈文集：诗文遗稿、纪念图片、亲友回忆等。
2. 家谱传记：家族年谱、家史档案、先贤传记等。
3. 家族画册：书法绘画、文物收藏、家庭照片等。

### 四、民间故事、地方史志：

1. 民间传说、民俗故事，地方曲艺、说唱话本等。
2. 地方史志、行业年鉴，企业历史、工艺传承等。

##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参考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辑校对→寄送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设计制作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出版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 出版说明

一般标准：大32开本，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

基本价格：200页出版50本两千元，300页50本三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计。

特别说明：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只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出版发行的我们设计制作样书后联系出版社办理。

##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组稿代理：**《个人出书网》《老人出书网》《家族出书网》自开办以来，深受各地离退休老干部、老教授与民间作者的欢迎，每月编辑出版个人文集、家谱传记50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文稿，我们计划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商合作。

**项目合作：**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传播与线下出版业务，愿与相同志趣的公司或个人合作开发相关项目，请来人考察相商。

出版服务专员热线：010—68920114 68920182

登陆网址：  
 (个人出书网) (www.grcsw.com)  
 (老人出书网) (www.lrcsw.com)  
 (家族出书网) (www.jzcsw.net)  
 (时代文化网) (www.sdwhw.net)

公司名称：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传真：68920708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街五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  
 博越商务楼6507室； 邮编：100089

免费咨询电话  
400 633 2311



# 欢迎订阅2010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

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欲购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购。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10年第**1**期

**中国核武器基地揭密**

**国防部门前的二十八昼夜**

**高扬：两次不准革命的经历**

**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

**傅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

**1978年上访记**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